

姚從吾先生年譜

門生 王德毅恭編

凡 例

- 一、先師姚從吾先生逝世後，同門諸友紛紛以編先生年譜的責任屬之德毅，毅雖不敏，又何敢辭！然竊以爲給現代人編年譜，寧失於繁，毋失於略，俾藉名人以存史，如丁文江所編的梁任公年譜長編，拙編的王國維年譜等均是。先生一生最愛護我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致力於國史研究的工作，五十年如一日，著述宏富，創獲特多，久爲中外史學界所公認。兼之先生先後執教國內著名大學如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河南大學及台灣大學幾四十年，凡所交遊及所取友，多屬端方之士，且有不少人以學問事功顯於世者，其間析疑論學，授業解惑，尤多可稱，似不可不繫之於編。夫編年譜的困難有三：所有材料均能編年繫月，著入年譜，此其一；與譜主相關人士的敘述無不適得其分，此其二；「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此其三。所以現在所擬編的先生年譜，搜求考訂，頗費日力。兩年前，毅曾寫成年表一篇，略述先生學行，年月粗具，綱目明白，現在就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擴大。
- 二、本年譜紀年，以民國紀元爲主，辛亥革命成功以前，書民國紀元前若干年，下注干支，並分繫清代紀元及西曆。
- 三、本年譜於先生年歲之計算，不用中國傳統的計歲方法，改採目前通行的辦法，以生之次年爲一歲。
- 四、本年譜本臨文不諱之例，雖作者師長亦均稱名。惟於 蔣總統則稱蔣公中正，以示尊敬國家元首之意。
- 五、本年譜所徵引材料，均散見於報紙雜誌及專書，所述史事，亦間有聞諸先生者。至先生私人函牘及讀書劄記等，選其中有關學術討論及足以表彰先生獎掖後進，愛護學生和關心國事之盛德忠誠者，亦分別繫之譜中，至涉及私事或評及他人者則從略。先生晚年勤於記日記，惟至今未寓目，故不徵及。
- 六、本年譜的敘事，重在說明先生治學的歷程，著述的經過，指導學生做研究工作的方法，提倡國史研究的心志，使後生晚學知所矜式，明所取鏡。
- 七、本年譜倉卒草成，疏略之處，必不能免，敬希海內外師友及博雅君子多賜教正；如蒙惠借珍藏有關先生文獻影印或鈔錄，俾將來訂增時有所依憑，尤爲德感。
- 八、本年譜在創草期間，蒙李安先生及至友陶英惠、蕭啓慶二兄幫忙，謹此申謝。

## 譜 年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甲午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 先生生

九月初九日（十月七日），先生生於河南省襄城縣城內南街。先生姓姚，原名士鰲，字占卿，一字存吾，曾刻印章文曰：「從吾所好」，取自論語，因號從吾，後即以號行。先生世居河南襄縣（襄城縣），為邑望族，明正德嘉靖間，有諱汝臯者，進士甲科起家，歷兵部員外郎、布政司參議，其子繼可（一五三四——一六〇八），字光父，號又軒，官至陝西巡撫，工部尚書。（李維楨著大泌山房集卷一〇九有其神道碑，焦茲編國朝獻徵錄卷五〇有其墓志。）子孫繩繩相繼，名德輩出，先生為其嫡裔。

是歲，張相文（字蔚西，號沅谷居士，泗陽人。）二十九歲。

蔡元培（字鶴卿，又字子民，紹興人。）二十六歲。

蔣夢麟（字兆賢，號孟鄰，餘姚人。）八歲。

胡適（字希疆，一字適之，自號藏暉室主人，績溪人。）三歲。

民國前十六年丙申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 二歲

二月十三日（三月二十六日），友人傅斯年生。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傅樂成撰傅孟真先生年譜）。

民國前十一年辛丑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 七歲

先生始入私塾讀書。

民國前三年己酉宣統元年（一九〇九） 十五歲

先生改入襄城縣高等小學堂讀書。在私塾數年，舊學必已樹相當根基。

民國前二年庚戌宣統二年（一九一〇） 十六歲

先生自小學卒業，升入許州中學堂。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 十八歲

是歲暑假，先生曾報考新軍學兵，已被錄取，並通知到郟城報到，以祖母安排，致延誤報到時間，事遂中輟，即返鄉，繼續學業。

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 十九歲

河南省政府將開封中學、私立中州公學、許州中學三校合併，改稱為河南省立第二中學，先生成為該校學生之一員。

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 二十歲

春，先生自河南省立第二中學卒業。

夏，考入北京中華大學預科。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 二十二歲

在中華大學預科刻苦攻讀，成績優異。其時，國文教師喜愛桐城派文章，教學生作桐城派古文，有一天，先生看到自己作文被揭貼在優良成績欄內，非常高興。（唐允：姚從吾先生的史學研究與教育生活，幼獅六卷三期）自是先生學殖根底益見堅厚。

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九） 二十三歲

夏，自中華大學預科畢業，旋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文科史學門。當時同學有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張愼生、田培林等，一時俊彥羣集，互相砥礪，頗收切磋琢磨之益。（同前）在校師事張相文、陳漢章、朱希祖等名教授，先生的識解，益見開朗洪肆。

案：張星烺撰張沌谷居士年譜云：「秋，國會解散，蔡先生聘請為北京大學國史館編纂，兼北大講師，授中國地理沿革史。高材生有廣西藤縣蘇甲榮（字演存），襄城姚士鰲（字存吾），鹽城蕭鳴籟（字化賓）等。」足見先生在北大就讀時成績優異。

又案：先生有「記大學本預科的好友張愼生先生」記事一則，云：「先生名价床，字愼生，修武人，是我在中華大學預科三年，北京大學史學門本科三年，先後六年間同班同住的好朋友。同師桐城姚永樸先生，象山陳漢章先生，泗陽張相文先生，對陳張二先生尤親密。民九年卒業北大史學門，余因前一年考取第二屆高等文官，分發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留平，愼生與伯蒼先生回開封，任高中、一師、二中等校教員。民國十一年，余與毛子水兄赴德留學，道經開封，猶得長期聚首。此後余居德十二年，一九三四年回北大任教後，曾短期相聚，直到三十五年余歸河南任河大校長，方得復聚。十餘年之睽隔，使余與老友兩人間的治學精神，處世態度，見解與思想，完全不同。」雖有不同，然二人感情之濃厚，確與日俱增，故特錄而存之。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 二十五歲

十月，應第一屆高等文官考試，成績及格，分發到教育部社會教育司見習。先生這次參加第一屆文官考試的動機，只在測驗自己的成績如何，沒想到竟被錄取。

嘗購圖局本廿五史，昕夕披覽，夜必三鼓而後就寢，迨先生北大卒業，筆記數百冊，赫然滿行篋。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 二十六歲

四月，奉師張相文之命，任地學雜誌編輯。前引泗陽張沌谷居士年譜云：「民國九年四月，地學會編輯事委之余誠武、蕭鳴籟、姚士鰲。四月，地學會移至後門內馬神廟西老胡同，年底復移至後門外方磚廠南下窪十八號。」（地學雜誌第二十一年第二期）

五月，在地學雜誌第十一年第五期上發表從歷史上觀察地理變遷與人生之關係一文，首言地理歷史之概觀，次言人地關係，以明自然界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末言地理變遷，以明人類支配自然界利用自然的概況。其結論是人類戰勝自然。歷史上地理之變遷，即人類文明之所由生。

夏，自北大史學系畢業，得文學士學位。時實習已期滿，乃留教育部工作。

案：先生自云：「我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第一班學生。」所以對北大始終念念不忘。

秋，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國學門為研究生。

十一月，於地學雜誌十一月十一期中發表地理與文化一文，說明二者間的關係，由地理環境影響於文化方面觀之，其關係是：（甲）強制的亦友誼的，（乙）部分的非普遍的。由人類文化進步言之，其影響於地理環境者為：創造的亦利用的，相對的非絕對的。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 二十七歲

春，於地學雜誌第十二年一至三期發表長達兩萬餘言論文「歷代地理志評議」，其目的為：一引言，二念四史地理志之概觀，三補疆域志之概觀，四地理志與疆域志之批評，五餘論。先生自敘其緣起說：「閱念四史，以志為先，蓋欲先窺歷代學術、制度、文化、典章之大凡，次再以傳紀印證事實。當時以校課叢集，賦性質魯，鉅冊浩繁，非計日所能見功，速則走馬觀花，記憶難而味厥源流，按時量功，而時不我與，則匍匐行遠，系統失而連續不易。於是決取分求之法，依類看閱，先行錢恂先生史目表，去其板滯，參以私見，作一『念四史目錄分類表』，以朝為經，以目為緯，經則自史記以下止於明史，分為二十四格，緯則就各史原有目錄，區為紀、世家、表、志、傳、外國紀六部；每部之中又分為細目若干類。如紀中分為帝紀、后紀，（本紀及三國志之帝紀主某，均為帝紀異名，呂雉武則天均入后紀。）世家合載記為一類，以其均擁有土地，各主一方。此表專就念四史中所有體裁，略為類歸，便於私人研究計，故仍以世家標名也。表合年譜為一類，區為貴族，（如王子侯者表、公主表、外戚表、皇子表、諸王表、皇族表、部族表之類。）官僚，（百官公卿表、宰相世系統、宰輔表、諸侯王表、功臣表之類屬之。）異國。（六國表，屬國表，十國世家之類屬之。）志合書、譜為一類，而統名之曰志，又區為禮、樂、刑、律曆、天文、祭祀、河渠、食貨、疆域、五行等為十二類，傳分學者、官吏、藝術、超人、遊俠、貴族、婦女、優伶、雜傳等十一類。外國紀則以方域分，以便檢閱。（另見念四史目錄表分類說略中，茲僅舉其概略，以見此篇之緣起。）大致就念四史已有之目錄，略為類歸，間標新目，仍期不背舊有之面目，蓋

專爲研究便利計，非謂正史宜如此，不宜如彼也。閱看之時，依類而求，此類完而再依次及於彼類。如閱地理志時，單就地理志一類閱之，自漢書地理志起，迄明史地理志止，傍及後世補疆域志，以求其全，每閱之先，預想其應爲如何之內容，應具若何之眼光，何以設此一類之目錄，此一類在當時與今日應用之價值，標準既定，始作詳慎之觀察，揭示古書之真面目，原書內容有出於意想所不及知者，則特別標出，以資採取，閱時採點讀之法，凡有可資引用參考者，皆分錄另一簿冊中。隨閱隨記，兼記批評，並記其卷數、頁數，以供他日研究引用時之翻檢。每一篇已，則撮記其內容之詳略、優劣、敘述之方法、次第，比較他篇之特長、異采，以資結束，閱他志亦然。此篇之作，即歸納吾前閱歷代地理志、地形志、州郡志、郡縣志、方職考、疆域志札記所得之概要也。」此先生綜合整理念四史的初步工作，其規模宏遠，步驟精密如此！

案：先生所撰「念四史目錄分類表及分類說略」今未之見，或者未曾發表，德毅侍先生日，亦未嘗聞先生道及，甚爲可惜。

七月，所撰「地震之研究——地震之科學的解釋及念四史五行志中之地震觀。」一文，於地學雜誌十二年刊四至七期發表完畢，末附念四史中所載地震一覽表，統計的極精確詳盡，此即先生綜合研究念四史分類整理所得的成果。

十月，於同雜誌同年八至十期又發表「黃河之概觀——歷史上之黃河變遷觀」一文，分述歷代黃河變遷之經過及其所造成之水患，追往思來，患正未艾。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 二十八歲

元月，先生所譯美國耶律大學教授漢丁敦（Prof. Ellsworth Huntington）文明與氣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書第一章總論，在地學雜誌第十三年一期發表，末附記云：「這一篇是倉莽譯成的，本想用白話，因爲加添的話過多，我的藝術太差，所以才順筆譯下去，我的意思是想譯成後再從頭修改，譯時爲時間所限，一定有許多錯誤的地方，還希望諸讀者加以指教，我敢說我是最能容懇切直率的指教的。」足見先生爲學的虛心。

三月二十三日，中國地質學會第一次常會在北平開會，由會長章鳴釗與地質調查所丁文江主持，章並發表演說，會後，先生特將該次常會來賓演說辭彙輯在一起，在地學雜誌十三年第三期中發表，引言云：「章先生講演後，復由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先生演說組織地質學會之目的及今後之希望，次即由蒞會來賓諸名家相繼演說。地質學會實吾國學者本自動精神，專治一種純粹科學學會之開創者，與會來賓又皆科學界一時之碩彥，宏論名言，更非年來泛泛空談主義時過一哄而散之學會所能比倫，特彙誌當時名人演說辭於下，爲中國科學開幕之紀念焉。」先生熱心科學的研究，亦可於此見之。



六月，於地學雜誌第十三年第三期發表「何爲地理環境，地理環境與人類生活有若何之關係」一文，前言云：「會友善因君遠道遺書，商榷疑難，並泛論海內外學出版界之近況，及近三十年國內地學消長之大勢，而附以若干關於史學地學應注意之大問題，略提所見，以相質證。『何爲地理環境，何爲地理環境與人生之關係？』即其所提示研究地理先決問題之一也。善因諳英日文，研究地理學有年，……吾既感同志同懷之雅，作書答之，暑夜涼爽，靜坐思長，因就平日涉獵史地之猶記憶腦海者，述爲此篇。」

案：先生於民國五十五年冬改訂並附加簡註所著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重刊在書目季刊第一卷二至四期中，即以善因爲筆名，想即淵源於此。以是知上引前言，乃先生所自道。

夏，自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卒業，旋參加北京大學選拔學生赴德深造留學試，先生以歷史學膺其選，同時考取往德國留學的還有毛子水。毛追記云：「我和姚從吾先生雖同爲民國九年的北大畢業生，但我的認識他則在十一年的秋天。那年，我們二人同爲北大史學系考選赴德留學，因而相識，成爲平生常在一起的朋友，歲月匆匆，已將滿半世紀了。」（傳記文學十六卷五期）。據胡適說：「當初北大校長蔡子民派姚從吾、毛子水赴德留學，目的是在造就地理學人才，但他們到了德國改變了初衷。」（張其昀悼胡適之先生，中國一周六一九期）

秋，先生辭去地學雜誌編輯職務。

赴德行程已定，先生於十一月返里，向家人辭行，收拾行裝，爲啓程之計。十二月七日，上書師長張相文報告遊踪。書云：「別師南歸，越日即抵襄，時大桿土匪盤據魯郊，距襄僅六七十里，而防軍他調，城守空虛。生因夜草守城芻議，集議防守，越三日乃赴開封。抵汴之翌日，得京中同伴快函，知赴德船期又改，計時尚有七日留，欲從事訪查挑筋教史蹟，並尋覓大梁回教碑及各項史蹟，輯之成篇，上陳師覽，兼就正於陳圓菴先生。餘暇當遍訪大梁古蹟，彙成遊記，刊諸雜誌。師舊作大梁訪碑記，偶忘載某期雜誌，望轉知作賓兄寄汴一冊，供遵循焉。今晨探知一艾姓者，字漪床，挑筋教徒也，前清舉人，曾官知縣，頗留心典籍，已託人先容矣！若能晤此君，於挑筋教之歷史，當有創獲，而圓菴先生欲訪求之四竹堂紀異，亦可探得着落矣。挑筋教碑現存聖公會，欲往攝一全影，寄呈師覽。」（地學雜誌十四年一、二會合刊）

十八日自汴啓程，歷四日夜而達上海。二十二日，先生又致書其師云：「自汴抵滬，覺南北氣象迥然不同，銅山一帶，寒冷乾枯，一切與開封無殊，自徐而南，始漸漸與京漢路上所習見者有別，乘客楚楚，軍人絕迹，茅舍零落，不見土寨。而少婦幼女，對

衆理裝，談笑自若，無鄉村氣，此京漢道上所罕見也。蚌埠臨淮而南，松柏青翠，籬竹猶綠，池水融融，白鴨往來，大有春意。而浦口臨淮間，氣溫達華氏四十八度，草雖枯而葉未凋，田無苗而水常流，視燕趙無水不凍，無風不烈，實有春冬之別。下關江水黃濁，不類夙聞，惟波濤不及黃河之洶湧耳！車抵鎮江，天已昏暮，不能於車外眺望，然常州、無錫、蘇州燈火萬千，人聲諠雜，氣象正自不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諺，經物質文明之烘托，今視昔百尺竿頭當又進一步矣！生久居北地，乍來南土，除言語外，耳聞目見，覺在在皆有幾分活氣。他年歸來，當上承師志，年遊一省，以廣見聞。人情練達即學問，鰲雖生嵩洛間，若試言所志，寧爲顧寧人，劉獻庭，不願師程門立雪人，一切胥託諸空談，除獨善其身外，對自然對此生毫無辦法也。猶太教碑兩份，六張，謹另封呈閱。開封照像惡劣，題字被彼洗壞重寫，致宏治碑間有漏字，時迫行促，不及改正。開封一賜藥業教考徵引詳瞻，允推宏著。惟第七章述開封市街清真寺一段，頗涉含混，不符實情。教經胡同在北土街（即舊土市街）東南，去文殊寺街東嶽廟清真寺街均甚遠，街實三處，並非一地。東嶽廟傍之清真寺街俗名東大寺街，東大寺，爲開封最古之回教寺，現爲回教俱進會。據寺中康熙四年重修碑，知回教來開封亦最早，而文殊寺街之清真寺亦歷有年所，傳守無替，爲開封回教最大之中心地也。就生訪問所得之結果，實與猶太教無關。生已摹繪一光緒十四年新修祥符縣志街市草圖，容緩日當呈政於陳圓菴先生。法船改期定一月六日開行，置裝畢，有餘暇當一遊西湖。生每至生地，輒喜購本埠地圖，風景畫片，藉資研究，惜無從容時間，到一地即寫一觀察談，爲雜誌稍添材料也。」（同上）。

案：自民國九年至十一年，凡三年間，先生的治學興趣完全在地理學方面，而又特別注意我國沿革地理之研究。先生年遊一省以廣見聞之壯志後來雖未實現，然不能不說是此爲先生早年有志於經世致用之學所立的一個里程碑。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 二十九歲

自客歲十二月三十日赴杭，作西湖三日遊。一月四日與師張相文書，報告旅遊觀感。說：

「生於十二月三十日赴杭，三日夜十一時始返上海，留三日，三遊西湖，頗快心懷。第一日遊葛嶺岳廟、公園、于忠肅墓，沿白堤覓蘇小小秋瑾之墓，過蘇堤而歸。第二日遊三潭印月，蘇堤春曉，雷峯夕照，南屏曉鐘，康莊沿湖心亭而入昨日遊路。第三日與雷遇春兄步遊靈隱寺，中天竺、三天竺，歸至玉泉，觀五色魚，復遊斷橋殘雪，雙峯插雲，自上午十時至午後六時方歸。此行感受印象最深者爲浙江氣候溫和，風景秀韻。陽曆年節爲北京最冷之日，而杭縣氣溫僅達華氏四十八度，生方慶耳目所及大有春意，而

杭城報紙竟有稱邇日奇冷，吾人應如何注意煖室云云；甚矣習慣之能左右人類生活能力也。杭氣候溫和，生活寬裕，然以東方人不善利用自然之故，由逸生淫，而婦女迷神信佛之風亦最盛。僅西湖一地，聞和尚達兩萬人，尼姑亦在一千以上。生親觀數處塔院，年少婦人，圍棹念佛，香煙凝結，上蔽赤日；而羊腸道中，遇婦人乘小轎入寺廟觀菴進香者相望不絕，此亦北數省所僅見者，推其原不可謂非氣候使之然也。聞雷遇春言，二六兩月，男婦混雜朝天竺，通霄達旦，滿山滿湖，怪態更不勝殫述，若然則浙人亦太辜負自然之恩遇矣。生坐之法船定明日開往德法，今日料理行裝，終日方竟，去國在即，念師情殷，已束筆封墨池矣，借破管草此，冀 師知吾近十日之遊踪也。」（地學雜誌十四年一、二期合刊）

七日，又與張相文信，述海上風光並報告行程。說：「生於一月五日，在上海動身，法船安得來朋（**Andre Lebon**）重載二萬二千噸，體積既大，自然隱靜，邇日清和，故雖在茫茫碧海中，毫無動盪。時在艙中看書，時在甲板散步，憑欄遠眺，水天一色，銀波奔湧，奇景壯觀，視陸遊又是一番景象矣。同船赴德者共九人，協組一學餘俱樂部，極覺融洽，明日聞將到香港。香港為英屬，此船屬法，留一日例須納重稅，香港之遊，恐不克如願矣。」又一信云：「此次抵滬，欲求一比較詳備之地理誌，竟徧尋不得，不獲已，仍購中外地理大全一部，聊作充數。受書堂史地叢書，實不朽之偉業，民族之光輝，甚願亮丞早日成就之。馬哥孛羅遊記，實為吾國淺薄之學術界生色，願吾會始終完成之。」（同上）

十五日船抵西貢，次日即上書師長張相文報告遊西貢觀感。說：「生於十二日，（請接閱前期遊踪報告）過河內海防，十五日十一時，到西貢，十七日下午二時，方啓程赴新加坡。海防西貢均有中國街，（本地名廣東街）商務金融，國人均佔雄厚勢力，惜知識稍低，國政不修，法人遇之虐，商店納稅年自二千元至三百元，又有入口稅等，不能充分發達耳。海防風景富麗，西貢尤盛，綠樹紅土，奇鳥大獸，居民以仙人掌為籬，森茂偉大，令人驚歎，殊覺天與安南人厚，而安南人辜負自然賦予，拱手讓於碧眼兒為可惜也。十六日遊西貢動物園，謹贈照片數枚，寄會中，並報告行踪焉。」另一信云：「西貢一埠，據廣益書局司事言，現有華僑三十五萬，福建廣東潮……等幫，各有小學校，有會館，總商會，中學有中法學校，並有南圻華僑日報館一家。海防與西貢均有中國街，華僑亦頗關懷祖國，每以國事相問，惜衰衰者別有肺肝，致國事日非，無以慰僑胞殷殷之垂念耳。船中遇一上海人，往檳榔嶼辦中學者，此人民國五年，曾在檳榔嶼任教課，生與毛準頗以啓迪僑胞，勉圖自立相勗望，當以所帶章太炎國學概論及雜誌數冊相贈，彼為姚明輝及門弟子，生曾云中學若辦成，以通信地址相告，當以吾會所出地學雜



誌，自本年起，以一份見贈，嘉惠遠學。海防西貢等處，華僑總會均設閱報所，亦思各以一份見貽。西貢氣候，晨八十二度，午九十八度，晚八十七度。動物園偉大，動物頗多，非憶想所及料。聞英文有西貢指南一書極詳，容當購一本，寄會中。生想儘見聞所及，收集各地遊覽指南，爲會中圖書陳設之一部，以生自度，當不難辦到也。西貢海防法人銅像甚多，皆征服安南之有功者，生對之，與香港皇家碼頭之銅像，同生不快之感，彼族之元勳，黃人之讎仇也，謹購兩片，存地學會中，共誌此戎裝怒視者，勿再令其徧樹於我堂奧也。」（地學雜誌十四年三、四期合刊）先生的愛國情操蓋終始以之。

二月，至德國，入柏林大學研究，從傅郎克（**Prof Otto Franke**）及海尼士（**Prof. E. Haenisch**）專治蒙古史及歷史方法論。

秋，友人傅斯年由英至德，入柏林大學哲學院研究。（傳譜）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 三十歲

春，北大校長蔡元培赴德國開會，先生與北大同學共同接待，並陪侍蔡夫人參觀。據先生追憶云：「從吾是子民先生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兼任國史編纂處處長時代，北大文科史學門第一班的學生。最後與先生的聚會，是在一九二四年德國柏林的春天，時先生携夫人被邀來德國參加普魯士城德國大哲學家康德先生二百年生日紀念大會，（康德生於一七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赴會前曾在柏林小住。那個時候，已故台灣大學校長傅孟真先生，今國史館館長羅志希先生，毛子水先生等，不少北大同學均在柏林，我和子水先生是指定陪侍蔡夫人參觀柏林帝都畫苑博物館等的，惟先生篤於倡隨，又熟悉柏林古物名畫的欣賞，常來迎候夫人，故聚談的機會頗多。」（大陸雜誌第廿六卷三期）。

先生在柏林大學繼續研究。課餘則與同留學德國的朋友在一起談論學問，有無限樂趣。據毛子水云：「我們初到德國數年內，和我們晤談最多的友人，有傅斯年、陳寅恪、羅志希、孔雲卿、馮文潛、俞大維等。雖所學不同，而都在文史哲學的範圍內，當時談論的樂趣，四十餘年來，記憶猶新。……不過當年這幾位時常在一起談天的友人，雖志業不同，而在切磋學問上則可以說都是終身的朋友。」（傳記文學十六卷五期）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 三十四歲

先生留德五年餘，頗留心中西文化交流的史實之搜集，特別注意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有貢獻的史實之研究。是年撰成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寄輔仁大學編印的輔仁學誌一卷一期發表，此文一出，便受到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學者所重視。十九年燕京大學出版的史學年報第二期，中載韓叔通「俄領西土耳其斯坦與中國在歷史上之關係」一文，即加引用。

案：先生此文結論甚爲客觀而堅實，站在宗教的立場容有可議，如站在純學術

的觀點上則無懈可擊。然當時曾發生一段小小的故事，頗饒趣味，即該刊編者所附加的按語，頗批駁先生所言紙的輸入歐洲，助長新教革教成功之說。據先生追記云：「當年此文發表後，著者猶住德國，第一次接到的輔仁學誌第一期，文中沒有按語，但不久又接一通知，囑將原冊寄還，以便訂正錯誤。著者因閱看時，曾用紅筆改正，不便退還，即置之未理。一月以後，又接到一冊，方知增加了上邊的按語，乃向友人函詢原因，得知：結論文中的第二項，曾贊馬丁路得革教的成功，因此頗引起在輔仁大學服務的若干天主教神父的不滿。最後，主編人允許加了一篇按語，纔勉強應付下去。」（書目季刊一卷三期）是乃宗教的而非學術的，故先生云無甚意義。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三十五歲

先生應萊茵河畔的波恩大學之聘，担任該大學東方研究所漢文講師。先生留德數年，惟汲汲於新知識領域的開拓，不屑屑於學位的之獲，故先生能鴻博淹貫，轉非斤斤於學位者所可望其項背。

是歲，先生所譯蒙古史發凡，寄輔仁學誌第一卷二期刊布之。先生性喜治我國通史，因蒙古史中成吉思汗和拔都的西征，與馬哥波羅的東來，均具有若干世界性，也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因此德國若干大學對蒙古史亦深感興趣，且有專人從事研究，故考慮之後，即選定研究中國通史中遼宋金元史，先從這一時代中的蒙古西征與若干中西交通史上的問題着手。蒙古史發凡，乃先生研究蒙古史所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 三十六歲

先生繼續研究匈奴史及蒙古史，並實地考察匈牙利、奧地利、捷克各國家境內之蒙古西征的古戰場。是歲將西方漢學家研究匈奴史的結果，彙而撰成歐洲學者對於匈奴史的研究一文，寄至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的國學季刊二卷三期發表。這篇文章裏面所介紹的歐洲研究匈奴史的學者有三人，第一人是法國的東方史學家得幾內（J. Deguignes 1721—1800，他的著作是「匈奴、土耳其、蒙古與西方韃靼的通史」，原書有五大本，於一七五六至五七年在巴黎出版。第二位是德國漢學家夏特（E. Hirth 1845—1926），他的代表作是「窩耳迦河的匈人與匈奴」，一九〇〇年出版，這部書肯定了中國的匈奴就是歐洲的匈人，窩耳迦河就是當年東方匈奴西遷歐洲的停留站，同時是西方匈人的來源地。第三人是荷蘭漢學家底哥柔提（J. J. M. De Groot 1845—1921），他的著作是「紀元前的匈奴人」，這是重譯前漢書匈奴傳為德文的一種證補工作。（唐允前揭文）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 三十七歲

先生轉任柏林大學漢學研究所講師。時友人蔣復璁亦於去歲來德，並在柏大哲學系

肄業，與先生常相聚首，成為終生的朋友。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 三十九歲

先生用德文撰寫的“*Ein Kürzer Beitrag Zur Quellenkritik Der Kinund Yuan Dynastie*”（金元兩代史源的研究）在*Asia Major IX*（1933）中發表。

先生來德國已十年，對德國治史非常嚮往，研究環境，令人流連，所以一住十年，不想回國。先生在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六日與門人蕭啓慶的信中有如下的回憶：「我在北大念書時，頗得名師指導，如屠敬山，柯鳳蓀，張相文先生，都是我在大學時代的導師，鄧之誠等於現在的助教（他是當年國史編纂處的祕書。），崔適、陳漢章、朱希祖都是上課的老師。所謂乾嘉樸學，是朝夕掛在嘴上的。到德國後，情形大變了，始而驚異，繼而佩服。三年之後漸有創獲，覺Ranke及Benheim的治史，實高出乾嘉一等。他們有比較客觀的標準，不為傳統所囿。有各種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啓示，指導，可以推陳出新。他們有很有系統的、切實的、客觀的治學方法，他們有意想不到的設備，意想不到的環境，合理的人生觀，與合理的社會生活。五年六年以後，我不想回國了，想在萊茵波昂大學安家了。設非當年老友傅孟真年年寄北大聘書，罵我偷懶，罵我忘棄祖國，我怕真的不同國了。那樣演變下去，就現在看起來，一定大吃苦頭，也許就被盟國的飛機炸死了。但我回國以後，在雲南、四川，以及勝利後，開封淪陷，逃難南下，所吃的苦頭也是終身難忘的。」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 四十歲

夏，自德國啓程返國，計先生留德前後已十一年餘。日本自在我國東北導演九一八事變後，侵略野心日益猖熾，先生受朋友督促，兼又報國心切，至是乃毅然束裝回國。

秋，受聘為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時校長為蔣夢麟，院長為胡適，皆仰慕先生，即請主講歷史學方法，匈奴史、遼金元史及蒙古史研究等課程。友人陶希聖回憶云：「回憶二十年（案：應為二十三年）之秋，北京大學復校之後，蔣夢麟先生受命為校長，胡適之先生受聘為文學院院長。當開學之日，三院大禮堂舉行大會，在會場上，胡先生介紹文學院教授與學生見面，他介紹從吾說道：姚從吾先生在本校讀書時，原名姚士鰲，他留學德國，前後七年（案，應為十一年），先在柏林大學研究蒙古史，又在萊茵省波恩大學及柏林大學漢學研究所講學。現在回母校，主講遼金元史。民國二十年代，像從吾這樣的學歷是少之又少的。一則當年歐洲留學生往往看不起美國留學生，總認為美國的學問膚淺，不如歐洲那樣高深。從吾留學德國，專做一門學問，在一般留學生之中，更是少有，所以適之先生一番介紹詞，引起大會全體重視。這一情景，至今我記憶得清清楚楚。」（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央日報副刊）。先生講授四大可汗時

代的蒙古史時，必引述中外學者的新研究成果，使元史的研究範圍擴大為世界性，不再像以前一樣局限於中文材料，西方的記載也當注意。

同年，在北平排印歷史研究法導論，介紹德國學派的史觀和方法。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 四十一歲

三月，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五卷一期發表「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一文，說明營農生活的漢民族對於游牧兼漁獵的契丹民族，在建國時期，所作的經濟上的貢獻。

先生勤於撰述，旋又為文介紹其師德國佛郎克教授對於中國歷史研究的貢獻，刊於新中華四卷一期。先生在結論中特別提出兩點：（一）佛郎克以我國古代的政治思想來源有三：⊙從事農耕，⊙崇拜祖先，⊙比附天象。因此在天地人三才的宇宙觀中，以人為天地的連鎖，皇帝代天治人，故曰天子，更是天人間的媒介人。這種皇帝代天治人的見解，很可比證歐洲中古時代天主教教皇代天治人的說法。（二）把我國古代周禮中的理想政治，比之柏拉圖的理想國（*Politeia*），兩者相同的地方，不僅都是討論政治的著作，而且同是一個有系統的世界觀。所不同的是：「希臘人主張把國家建築在個人上邊，中國人却把國家建築在倫常的，非個人的，家庭上邊。」實給吾人以新的啓示。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 四十二歲

夏，北大歷史系主任陳受頤休假一年，先生被校方聘兼系主任。

斯時，日本軍閥為推行其所謂的「以華治華」政策，積極策動「華北自治」大陰謀。是年十月二十五日，先生與北平各大學教授徐炳昶、孟森、顧頤剛、錢玄同、錢穆等一〇四人聯名陳情中央，望速定大計。陳情文說：「溯至瀋陽之變，迄今五載，同人等託跡危城，含垢忍淚，不自知其運命之所屆。去秋以來，情勢更急；冀東叛變、津門倡亂、察北失陷、綏東告警、豐台撤兵、禍患連駢而至，未聞我政府抗議一辭，增援一卒，大懼全國領土無在不可斷送於日人一聲威嚇之中。近來對華進行交涉，我政府所受之威脅雖尚未宣佈，然據外電本諸東報所傳，謂日本又有侵害中國主權之五項新要求對華提出。姑無論所傳之虛實如何，任承其一，即足以陷我民族於萬劫不復之深淵，墮『中國之自由平等』之追求於絕路。中山先生所遺託於吾人之重任，數十年先烈所糜軀洒血以殉者，亦將永絕成功之望。我全國人民至於今日深知非信仰政府不足以禦外侮，精誠團結，正在此時。深不願我政府輕棄其對國民『最後關頭』之諾言，而自失其存在之領導地位，故為民族解放前途計：我政府固有根本拒絕此諸條款之責任；而為國家政權安定計，我政府亦當下拒絕此諸條款之決心。在昔紹興之世，宋雖不競，猶有順昌之擢；端平之世，宋更凌夷，復有淮西之拒。我中華民族數千年來，雖時或淪於不才不肖，從未有盡舉祖宗所貽，國命所繫，廣土衆民，甘作敵屣之棄者。此有史以來所未前聞之奇恥

大辱，萬不能創見於今日。是則同人等覬民意之趨嚮，本良心之促迫，所敢爲我政府直言正告者也。同人等以國防前線國民之立場，在此中日交涉緊張之際，唯願我政府明瞭華北之真正民意與樹立救亡之目標起見，特提出下列數項要求，望政府體驗其愛國赤誠，堅決進行，以孚民望，而定國是，不勝企禱之至。(一)政府應立即集中全國力量，在不喪國土，不辱主權之原則下與日交涉。(二)中日外交絕對公開，政府應將交涉情形隨時公佈。(三)反對日人干涉中國內政及在華有非法軍事行動與設置特務機關等情事。(四)反對在中國領土內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之特殊地位。(五)根本反對日本在華北有任何所謂特殊地位。(六)反對以外力開發華北侵奪國家處理資源之主權。(七)政府應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動。(八)政府應立即出兵綏東，協助原駐軍隊，剿伐藉外力以作亂之土匪。」（吳相湘著民國百人傳第一冊先生傳）書生報國，從不後人，於先生亦可見之。

十一月十四日，先生經吳宓介紹，與夫人陳絢女士訂婚。十六日，大公報登此消息。十二月十二日結婚。夫人字宜珍，閩侯螺州望族，先後畢業於燕京幼稚專科及國立北平師範大學。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 四十三歲

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大校長蔣夢麟及文學院院長胡適均南下參加廬山談話會。十一日，北大與清華聯合招生，照常舉行考試及評閱試卷。

十五日，先生與北大各院教授在蔡子民紀念堂集會，一致決議通電表明維護國家主權立場。二十日，先生與各院同仁再度集會，決議發表宣言，表明(一)中國國民素愛和平的本性。(二)指出現實局勢。(三)預測將來戰禍的責任。陳垣提議：應多向國際間發表有利我國的新聞，乃推葉公超、張忠絳等聯絡各方面，組織對外宣傳團體。時北平城外砲聲隆隆，人心驚惶不安。二十九日，日寇侵入北平。三十一日，先生與北大同仁再度集會，在淒涼慘痛的氣氛中，仍舊主張鎮靜應變。

八月九日，北大同仁又集議，決定分批離開北平南下。十一日，先生與梁實秋、葉公超、饒毓泰四人陪同胡適夫人離北平赴天津，乘船至青島。先生再乘膠濟鐵路火車至濟南，轉徐州，復轉鄭州，南下至武漢，再至湖南長沙。（以上參考吳相湘前揭文）。

其時，開南、北京及清華三所大學，隨着平津的淪陷，皆罹其難，三校師生，懷着悲壯的情緒，踏上征途，經過政府和學校當局的籌劃及磋商，決定在長沙先行辦理臨時大學。由於中央和地方教育當局的指導和協助，再加上三大學負責人的努力，竟能在一個月內恢復秩序，正式上課。因三校師生南來的人數衆多，乃以學院爲單位，分別安置，文學院即設在衡山，並於十一月一日正式開學。（中華民國大學雜誌冊一，陳雪屏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十月十八日，子大湘生於湖南。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八） 四十四歲

自對日抗戰全面展開後，江南戰局迅速逆轉，隨着上海和南京的淪陷，臨時大學爲配合長期抗戰的國策，是年二月，長沙臨時大學奉命遷往昆明辦理，命名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擔任常務委員，大政方針採合議制，日常事務多由梅處理。先生與同事多人經香港轉往雲南。時以校舍不備，無法集中，理工學院設於昆明、文法學院設於蒙自。五月四日開學，文學院在宜良縣上課，先生住在郊外，以煤油燈置於用木箱堆積成的書桌上，繼續教學和研究。如馮友蘭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所說：「痛南渡，辭宮闕，駐衡湘，又離別。更長征，經曉嶠，望中原，遍灑血，抵絕徼，繼講說。詩書器，猶有舌，儘筳吹，情彌切。」當時顛沛情形，可以想見。（參考陳、吳前揭文）

先生在湖南長沙臨時大學的時候，深感對日抗戰爲民族發展史上一件大事，是關係生死存亡的長期戰爭，特發起組織「中日戰爭史料徵輯委員會」，開始徵輯戰爭史料。後隨學校遷昆明，此一徵輯會又與國立北平圖書館駐昆明辦事處合作，繼續並擴大搜集工作。（唐允前揭文）先生深深的感覺到抗戰史料易於散失，如不及早搜集，妥爲保存，作有系統的整理，則對歷史無法交待。足見先生的史學眼光是高人一等的。是年八月，草成「蘆溝橋事變以來中日戰事史料蒐輯計劃書」，其目的是：「欲及時蒐輯已發表關於中日戰事諸史料，以免日久散佚；並欲由此奠立基礎，以期能進一步蒐輯關於此次戰事的正式公文與當事人的公私記錄，集中保存，他日得以成立一『中日戰史文庫』，或國立圖書館的一個戰史部。主旨在（一）謀系統的保存。（二）可利用已蒐輯的戰事史料，分別編纂，以期樹立若干間架，他日能完成若干種長編式的著作。」可以說目標非常遠大。茲將計劃內容，條列如下：

## 一、保存計劃——擬區分爲以下諸類。

第一、選購重要日報（如上海漢口香港重慶的大公報、南京長沙重慶的中央日報、漢口重慶的新華日報、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縮印本等）及雜誌（如文摘、時事類編等）自二十六年七月起，整份或整部，裝定編號，妥爲保存，以備檢查。（西文報紙另見）

第二、保存剪報，擬將已剪報紙，分兩類排列，一爲編年，一爲分類。（每一類中初按編年排列。）工作方法，選比較可信的日報（如大公報、中央日報，或漢口掃蕩報）爲主，以其餘所能收集日報爲輔。已選定之日報，凡與戰事有關者全剪，其餘日報僅剪與上選日報不重複者，按時日或依性質附入已剪各報中

。編年者擬以一月或兩月爲一箱，分類者擬以一類或兩類合爲一箱。單頁與箱頭上均標記號數，日報名稱，年月起訖，以便保存。

第三、蒐購日報以外的專書，小冊子、單行本等，分類編目，各作提要，整部保存。（取寧濫勿缺主義，以期完備。）

第四、專收散見於日報、雜誌、小冊子，或成書中的專篇，戰事記與時人言論（以切實可信者爲主），仿三朝北盟會編的體制，按年彙錄全文，以便保存。

第五、人物、地圖、照片、圖表等，分類彙輯，編號保存。

## 二、編輯計劃

第一、編輯「中日戰事記事彙編」長編：略仿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體例，將已發表有關戰事的公文，以及散見各日報、刊物、小冊子、專書中的記事文，儘量蒐輯，依綱類從，編年黏貼，自成一書。編輯主旨，約如下述：

(一)在可能情形之下，選錄原文，不加刪節。(二)長編記事文或重要言論，或分節散見於各段中，或彙錄一事於既告段落之下。(三)所選各文註明初見與選錄出處。(四)對著者人名、地名，專名酌加註釋。

第二、編輯「中日戰事紀略長編」：略仿熊克「中興小歷」（四庫改爲小紀，此據繫年要錄）與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體例，將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以來中日戰爭事實，先就已公布的諸種記載（如政府命令負責當局）的演說談話重要日報（如大公報）的專電與記事中央路透哈瓦斯美聯同盟諸通訊社的電稿等），以日爲經，以事爲緯。據公報（如電令電訊公布等）以爲綱，選比較正確的記述（如負責當局談話重要日報的記事等等）以爲目；雜採其他各種可信之「不同的記述」（如當事人回憶錄專家時賢言論國際通信等）以爲小註，編爲一種「中日戰事紀要(或日歷)長編」。以一日爲段落，一週爲一卷。先立一長編的間架，或「長編的長編」。使(一)異日政府重要公文、手稿、當事人的筆記，回憶錄等出版時，有所歸附。(二)得免時過事忘，材料散失，收集不易。(三)及時蒐集，儲積既久，可望成爲比較詳備之「長編的長編」，供他日專家的編輯或採用。

第三、編輯「中日戰事分區記事長編」：第二種舉中央以統攝全國，以編年通記中日戰爭的全部，其體例略如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第三種依戰區分述中日戰爭局部的演變，其體例略如袁樞的「通鑑記事本末」。故第三種依照盧溝橋事變以來敵人「進犯路線」，及雙方攻守目的，約分戰區單位爲四類。(1)鐵道線（如平漢線戰事平綏線戰事京滬線戰事津浦線戰事等）。(2)大都

會（如平津戰事首都陷落等）。(3)公路線。(4)轟炸區域。各戰區內的外交關係，逃亡與救濟的情形，陷落後的狀況等，均附記於各區戰事的後面。

第三種與第二種主要不同的地方，即以戰區為單位。就組織與排列的方法說，第三種蒐輯的對象，應較第二種為更詳。取材標準，可分為兩方面：〔甲〕本國方面：以下列刊物（或鈔本）為主。(1)政府命令或公告（取原電文或中央社電訊）。(2)著名日報（代表中央者取大公報及中央日報，地方者取各地方比較著名之地方日報）。(3)散見於其他各日報，以及定期刊物而為所採日報未刊布的通信、專篇等。(4)圖片造像。(5)私人已刊未刊的鈔本與手稿。〔乙〕國際方面：(1)英國取泰晤士報。(2)法國取巴黎時報。(3)美國取紐約時報。(4)俄國取真理報（以上中立派或稱民主陣線）。(5)德國取「人民觀察報」（或佛郎克埠報）。(6)義大利取義大利民報（以上法西斯陣線）。

第四、編輯「中日戰事書目提要」：仿「四庫全書提要」或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體例，將已搜購有關戰事的中文書籍、小冊子、單行本、或叢書叢編等。依性質略分為：(一)戰事記，(二)報告與言論，(三)演說與宣傳，(四)教育與常識，(五)文藝，(六)翻譯，(七)其他。每書各作一提要，詳述內容，估定原書的性質與地位。提要的作法，應顧到下列幾點：(1)作者與他的生平，(2)本書性質（屬於何類？是否翻譯），(3)出版年月與地點，(4)內容述評，(5)附記。這一類的提要，可以另紙鈔錄，分貼于每書之後，並可以集為一冊，定名為「中日戰事書目提要」。

第五、編輯「昭忠錄史料彙集」：以上所述為蒐輯中日戰事史料的主要目的，此則僅為附帶工作的一種。收集此項史料時，遇有殉難將士，死義官紳工農的奇行、遺事、名言、傳記、家世、死事情由、像片等，隨時彙集，另立一冊，擬名「昭忠錄史料彙集」，以備將來國史館或黨史編纂處的採擇。

謹案：此次全國抗戰，意義重大，政府宜及時設立昭忠館，收集抗戰以來殉國諸將士、烈士（行刺或破壞敵人軍事政治而積極殉國者謂之烈士），義士（各戰區內不屈節而消極殉國之鄉紳士大夫忠義俠士技術人員及工農商賈等謂之義士）的家世、生平、學行、殉難事實，編為列傳，以垂永久。國家應即延聘專家及方正博聞的學者主持館務，至少能做到以下諸點，以昭敬重：(一)以報功崇德表揚衛國的戰士、烈士、義士為主，非直接參加此次抗戰，或與此次抗戰無關者不錄。(二)立傳體例：甲、陸軍：(1)將官以上專傳，(2)校官尉官合傳，(3)校尉官及士兵經政府明令特准者立專傳，(4)士

兵分軍建立無名英雄冢，或題名金石，恭送入 總理陵園，或入地方中山公園，或入一地方的昭忠祠。乙、空軍：(1)隊長殉國者立專傳，(2)隊長以下合傳，(3)經政府特許立傳者專傳，(4)空軍殉難者一律立木主，或題名金石，恭送入 總理陵園，或地方公園，或入一地方的昭忠祠。丙、其他抗敵殉難，殉職的烈士、義士：(1)經政府明令特許者立專傳，(2)其餘合傳，(3)由政府明令在原籍，或殉國地點立碑，或建塔表揚。(三)由戰事史料蒐輯處，蒐輯或採訪殉國、殉職、殉義諸烈士的(1)家世，(2)生平，(3)學行，(4)殉國、殉職、殉義經過，由國家特派之史官，爲之作傳。(四)建立殊勲者，應由政府指定黨國大手筆，代爲作傳、書碑、鑄像，立於 總理陵園或其本人故鄉，或殉國、殉職、殉義的地區。

第六、選輯「中日戰事文錄」：此亦爲蒐輯戰時史料副產品的一種，要旨如下：一、凡有關戰略，戰時外交、政治、財政、民生、社會、教育的論文，均入選輯。二、空論及不切實際，或論旨在攻擊無關朝章國政的私人者不錄，無關戰事，或不在抗戰期中者不錄。（如胡適之先生答室伏高信書等雖在盧溝橋事變以前因關係重大均宜收入。）三、譯文校訂。譯文與原文均佳者分別刊印，未全譯者補譯，誤者校正。四、國際名人論文彙編（依時日編選，各照原文排印或擇要譯成漢文）。

第七、編印「戰事簡明日曆」（樣式或爲小冊子或爲單張）。

工作程序以第一至第四所述蒐輯此次中日戰事史料爲主，其餘均爲副產品，副產品數量充足，可以發表者，當隨時與國內各大書局合作，陸續出版。否則分別保存，以備查考。

三、戰區劃分，史料彙集依地理劃分三大戰場，各別整理。〔甲〕、北戰場及西戰場。戰史史料彙集，將地域縮小，又分如下戰區：第一、平津戰區，按以下諸目彙集史料：(一)盧溝橋事變以前的中日關係（自九一八日軍佔領瀋陽，到盧溝橋事變）。(二)平津的陷落（自盧溝橋事變，到日本佔領北平天津）。(三)陷落後的平津（自二十九軍撤退，到偽組織的成立）。(四)冀東特區與通州保安隊的反正。(五)平津的偽組織。第五項如敵人利用間接統治的各種計劃，漢奸列傳，偽組織成立後的叛國設施均歸入。此外如平市焚書記、平津逃難記、故都回憶錄、大學與各文化機關之被破壞與南遷，日軍入城記，平津紊亂狀況，游擊隊的活動，及民間謠傳等項，亦包括在內。第二、平漢線戰區（自長辛店到黃河北岸）：可分爲保定攻守記實、石家莊的陷落，自石家莊到新鄉，平漢線陷落以

後華北狀況，及各地游擊隊的活動等。第三、平綏線戰區：可分為百靈廟收復記、南口戰爭記，自南口退兵到張家口，大同的潰退，歸綏的陷落，察綏陷落以後，蒙古各盟旗對中日戰事的態度等。第四：同蒲縣與正太線戰區：可分為自大同到太原，娘子關的攻與守，太原附近的戰況，自太原到臨汾，臨汾與臨汾的陷落，臨汾陷落後的山西等。第五：北戰場西戰場與國際間的關係。第六：北戰場西戰場抗戰期間時人的言論與國際批評：凡不能錄入某線、某日者，另入此欄，重要文獻雖節錄採入各段附註者，亦仍存全文於此欄（註明某與某複見）。無關重要之文字，列入存目。第七：空襲與被炸地慘狀：可分為空襲與防空設備，空襲與死亡統計，被炸地名一覽，被炸地的種種慘狀等。〔乙〕、東戰場（約包括上海首都杭州鎮江青島濟南徐州安慶諸大都會京滬滬杭江南津浦膠濟諸鐵路線京滬公路線長江沿海諸航道等）：第一、京滬戰區（自八一三到首都的陷落）：（一）上海戰事（自八一三開戰到大場退兵）。（二）杭州灣日軍登陸記。（三）京滬線戰事。（四）京杭國道與江南鐵路的戰事。（五）鎮江陷落與沿江戰事（自吳淞口到南京）。（六）首都的防守與陷落。（七）英大使被炸始末。第二、滬杭線戰區（此段內之外交、空襲、學校遷移、難民逃亡等均附見各段之下。）：（一）滬杭線戰事。（二）杭州的陷落。（三）杭州陷落以後的浙江。第三、津浦與膠濟線戰區：（一）津浦南段（自浦口到臨淮關）。（二）江北戰事（津浦線以外的江北戰事）。（三）津浦北段（自天津到濟南）。（四）濟南的退却。（五）青島的自動破壞與放棄（六）膠濟線。（七）津浦中段（自濟南到徐州）。第四、徐州會戰：（一）徐州會戰以前。（二）徐州會戰的經過。（三）台兒莊的勝利。（四）徐州的陷落與退却。（五）時人言論。（六）國際輿論。第五、隴海線戰區：（一）魯東與隴海線。（二）開封的陷落。（三）皖北與豫東。（四）黃河決口與日軍進攻豫中的停止。第六、長江戰區（自首都到九江）：（一）長江戰事（自蕪湖到馬當）。（二）安慶的陷落。（三）馬當的攻守。（四）九江的陷落。（五）德安的勝利。（六）南昌的陷落。第七、武漢戰區：（一）保衛大武漢的計劃與工作。（二）武漢撤兵的經過。（三）武漢撤退以後。第八、廣州戰區：（一）廣東敵軍登陸記，（二）惠州與廣州的陷落，（三）廣州陷落以後，（四）中外人士對於廣州陷落的言論與傳說。第九、海南島戰區：（一）海南島的陷落，（二）法日關係，（三）法屬安南。第十、華南沿海戰事：（一）廈門日軍登陸記，（二）廈門陷落以後，（三）沿海敵艦騷擾略記，（四）敵機轟炸福建各地，（五）敵機轟炸粵漢路，（六）敵機轟炸廣九路，（七）敵機轟炸西南各省一覽，（八）汕頭被炸，（九）香港英人的防守、計劃，與英人對中日戰事的態度。第十一、東戰場與國際的關係。第十二、東戰場抗戰期間時人



的言論，與國際的批評。如將時賢言論之有關政治者，採入各段之下，作為小註；重要論文，分類保存；空論與無關重要者，列入存目。（存目的編輯，仿四庫未收書目例，略作提要，申述列入存目的理由。）第十三、國際輿論：（一）反法西斯派、如英美法俄等國的朝野言論。（二）法西斯派，如德義；（三）敵人的狂妄言論；（四）日內瓦國際聯盟對於我國聲訴的態度與處置。（此處專收國聯關於我國聲請時的會議與決議，凡不用國聯名義者，分入上列各國子目下。）〔丙〕後方的設施：第一、後方各省區的備戰狀況，就西南、西北、華北、華中、華南各省，皆分省增列子目，敵機對各省區轟炸的慘狀，皆分別另立子目。第二、抗戰建國大事記長編，計分廬山談話會，國民政府西遷重慶，抗戰期間各項政治的設施，各傷兵的救濟與處理，難民公務員的救濟、財政與愛國公債、獻金運動、國民參政會、外國顧問、軍用品與兵工設備，英美借款與建築滇緬綏昆湘桂諸鐵路。此後在工作過程中，當視材料收集情形另增子目。

#### 四、蒐輯史料工作實施計劃

案：此次中日戰爭，預計史料的遺留，約可歸為四大類。一、政府辦理此事之重要宣言與公文、戰報、外交情報、會議記錄，各部報告與當事人的回憶錄、事務專報。電報、書牘、統計表等。二、本國以外有關各國的報告與記載。三、截止現在已發表的報告與記載。四、戰事的直接遺留物與戰地遺跡。關於第一類，無論我政府或敵人政府或第三國政府與當事人，除一小部份外均尚未至發表時期，可以暫置勿論。關於第二類，擬逐漸蒐集。第一期先收（1）英國倫敦泰晤士報。（2）美國紐約時報。（3）法國巴黎時報。（4）德國佛郎克埠日報，及人民觀察報。（5）義國義大利民報。（6）俄國真理報，（7）日本東京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或其他日文大報各一份。（天津上海河內出版之英法文日報當儘量購買。）其餘亦隨時訪查，擇要購買。關於第四類。如已運後方之戰利品，照片等，擬請各公私文化機關，隨時蒐集，集中或分地保管。各戰區戰迹，目下不能蒐集者，戰事停止後，應選派有史學訓練人員親赴戰地採訪，或組織學術調查團實地調查。現在着手蒐集者，僅限於第三種之全部。（即本國文的戰報現已發表與記載）與第二種之一部。（即能蒐集的津滬香港日文諸大報）因性質不同，應暫時分為本國文與外國文兩部。（一）故工作範圍暫以蒐集我國政府已發表之公報、電報、中央社新聞稿、重要日報，及其他關於戰事諸刊物為主。（外國文如路透美聯等通訊稿能購到或在手頭者自然同時蒐集。）

- (二)中央社電稿購置三份。(一份備查對兩份供剪貼之用)
- (三)日報取言論記事比較負責者。茲擬取天津、上海、漢口、香港、重慶出版之大公報，首都與長沙重慶出版之中央日報，代表全國。各省地方報，則取如濟南之華北新聞、長沙之力報、昆明之雲南日報，(或民國日報)、漢口之掃蕩報、開封之民國日報等，代表地方。(其他如香港上海等地之大報亦酌量搜求用作參考)武漢重慶之新華日報，香港之南華日報等，代表在野黨。香港、南洋、檀香山之報紙，代表國外僑胞意見，大公報購置五份，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等各購置三份，各留一份以供查對，餘供剪貼。
- (四)依上列「中日戰事紀略(或日曆)長編，」「中日戰事分區記事長編」、「昭忠傳」、「戰時文錄。」諸綱領，將已選定之政府公報，通訊稿，日報等，逐日選圈剪貼。剪貼方法：一、主文頂格。二、註文及參考用之「異說」，低兩格。三、未證實之電訊，或證明為謠傳之電文，低四格，並附註意見。(或如蓋「待考」「傳聞」等類之印章，表明當時曾有如何之謠傳。)四、荒誕不可信之記事，亦另加標幟，或低若干格粘貼。(以上低格粘貼印時即可改為小字作為參考用之附記)。五、無來源者，附加說明。六、電文衝突者，二者兼收，以待證實。七、已證實者，取為主文，改其餘為附註。
- (五)以蒐集原刊物為原則，不能粘貼或偶有殘缺者，方用鈔寫。
- (六)粘貼時以一事為一單位，粘於一紙。紀事或電文長者，粘於兩紙或兩紙以上，仍為一單位，以便續得材料，或長編通信時，依日增入。且可以餘紙附記蒐輯者之意見。
- (七)粘貼報紙的紙張，選用耐久且易保存者。(如國產棉紙)粘糊用不至蟲蝕者。每一月或每兩月置於一木箱或裝訂成冊。(現時史料徵輯會剪報股係採用散張粘貼法裝於小木箱內，木箱係用煤油箱改成甚為便利。)
- (八)材料排列，應分三類。一、依編年排列，以一月或半月為一單位。二、依性質分類排列，先分為若干大類，由大類中分為若干小子目。以每一大類為一單位。(如西戰場戰報參政會等。)三、依題目排列，以一題目為一單位。(如徐州會戰，海南島與中法日交涉等。)
- (九)採輯人員(1)一人担任一題目。(2)逐日登記「剪貼至某日某地」於工作簿，以便查考，每一冊成後，送交指導編輯員審查。有疑問時，指導編輯與採輯人員，開小組會議，共同研究，務求尋得一比較妥善的解決，以免或有錯誤或遺漏。

- (b)定期刊物，小冊子等，各購兩份，一份編號入參考室保存。一份編號由指導員或採輯員逐件詳看。可採取者，採入各段之下，作為小註。不可取者；（或係證明鈔自他報或係空論妄說）略加評語，註明不足採取之意見。
- (c)暫不粘貼之報紙，傳單、印刷品等，（外國報紙在內）應整理保存。以期能保持久遠，保存辦法：報紙用細薄國產大張棉紙裱其一面，（以能看見原字為主）分期裝訂。編號收藏，日報以一句為一本。零星印刷品以類相從，自為一單位，特別重要之文件、手稿、簽署等、照片製版，另部保存。

## 五、蒐輯史料凡例

一、上列蒐輯盧溝橋事變以來中日戰事史料計劃。僅係一得愚見，希望能獲得贊助，見諸實行。所擬綱領子目，僅是假定如此，將來着手蒐輯，當依材料的多寡，關係的輕重，酌量改定，惟希望能適合實際，對當代史料作到大量的蒐輯與保存。

一、此次蒐集史料，主旨所在，約分兩個步驟。第一步略定綱目，欲將已發表的史料，依綱隨目為多方面的蒐集，(1)暫以本國文為限。(2)編年紀事。(3)以一題目為一單位，名「某某戰區史料彙集。」第二步希望他日能依據已蒐輯的史料刪繁去複，考異辨偽，着手編輯成下列的諸種長編。一種擬定名為「中日戰爭記事彙編長編」。仿三朝北盟會編體例，編年彙輯散見於各日報、小冊子，各書籍中的記事紀言論文或短記。一種擬定名為「中日戰事紀略長編。」仿繫年要錄體例，以日為經，以事為緯，以中央統括全國。（也可以定名為「中日戰事編年總錄」）一種擬定名為「中日戰事分區紀事長編。」仿紀事本末或朝野雜記體例，體仍編年，事則加詳。依地域分記各區戰事的實況。（也可以定名為中日「戰事分區紀事本末」（一種擬定名為「中日戰事書目提要。」）仿四庫書目提要體例，將有關戰事書籍小冊子，各作一提要，估定原書之價值。此數種長編或提要，僅備他日編纂抗戰建國史的預備工作，供將來專家的取材與刪訂。至於用新式通史或專史體裁，編印成一種「抗戰建國史」或「台兒莊的會戰史」。則應待之將來，此外尚可附帶蒐集另成專門題目的，尚有數事，一曰蒐輯陸空軍及國內賢豪殉國成仁殺敵的奇勳偉蹟，以備他日國家編輯昭忠錄的採擇。（昭忠錄的編輯目的在激勵當事人愈早則效力愈大）二曰，蒐輯國內外專家時賢的名言諫論，略仿前代經世文編或文粹文類的體例，分類編為「戰時文錄」。三曰，編製中日戰事詳細地圖。四曰，編輯戰事圖畫集。（以上第三第四或另為一書或散附上舉二書中）五日，編輯中日戰事簡明日歷。凡

此五種，皆係因材成書，一方面希望引起國人更深切的注意，一方面留供專家的採用。簡單說，這些附帶的工作，有則收集，無則闕略，不坐視史料的散佚，亦不貪多無所宗主，致誤史料蒐輯工作的進行。

一、現時戰事方烈，重要的公文與當事人的回憶錄等，均尚未到成書公布的時期，目前工作自應先以已發表的公文及重要日報中的記事等為斷限，先立一個間架，以便異日逐漸擴充。此等已經發表的公文、紀事，僅能暫以本國文及本國的著名日報為主，以其他能得到的外國公文及外國日報為輔，購求英、法、蘇、日、德、義等國的重要日報，雖期於及早見諸實行，但裝訂整理，加以保存，頗為不易，而翻譯考訂，亦費斟酌，系統的使用，勢須期諸異日。

一、現代人事複雜，宣傳造謠，五花八門，真偽雜揉，智者莫辨，故蒐輯中日戰事史料於通訊社的電訊、日報的紀事，期刊的追述，紛紜叢雜，實無異於披沙揀金。每事欲求一剝後可信的「核心」。實屬不易。然如放任真偽雜揉的記事，蔓延滋長，將來爬梳整理，勢必更覺困難，應聘請常識豐富，博覽深思，善於利擇的學者若干人，担負審核、討論、指導的責任，以期蒐輯工作成效的顯著，茲再揭示數點，以供參考，作為蒐集時決擇去取的標準，一曰，注重當事人的回憶錄。與直接的報告。（如上年七月七日漢口大公報所載宛平縣長王冷齋的「盧溝橋事變回憶錄」等）二曰，注重無意的記事，慎取有意的宣傳。（如逃難記報紙上的尋妻覓子的廣告即大部份為無意的記事而報紙新聞欄內之演說社論等即大部份為有意的宣傳）三曰，注意史料的來源。（如東京與倫敦所見不同莫斯科與羅馬論調更異之類），及記事者（通信員通訊社等）之態度。（此點在現時最易辨認時過則分別即難）四曰，注意通訊社，日報的立場。（如同盟社路透社哈瓦斯等各受政府政策民族利害的限制故皆不可全信或全不可信）五曰，注意反證。六曰，注意國內外專家比較客觀的評論。剪貼日報時，希望能依據這些標準為多方面的彙集，選可信者為主文，以其他異說為附註，庶幾有所折衷，去取時能比較的得到允當。

一、史貴記實，無徵不信，此次中日戰事史料的蒐輯，務以事事求實為主旨。（一）在服從國家法令，擁護政府立場的大前提之下，盡量納就事論事的異見。（二）知敵知己知世界。（即注意明瞭敵我與國際間的關係）（三）努力辨別真偽，對己不忽略宣傳的用處，對敵不受宣傳的欺騙。（四）努力辨別是非，時時注意國家所處的時代環境，與所有的國力。既不為高論所引誘，亦不受外人不負責任的言論所迷惑。（五）慎下判斷，在材料證據許可的條件下，詳考「異同之故」。

附記於各條的下面。(六)不把不知道的，當作是知道的。

一、作者平日涉獵國史，深覺宋代史家對當代史事的記述，最爲詳博可觀，而人人所稱道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因爲取捨有意，旨在資治，反不若李燾續通鑑長編的採輯豐富，註詳事盡。宋朝各帝王中，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史備事詳，尤爲超越今古，這時代大部頭的著作，若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的詳述外患，程克中興小曆（四十卷）的詳記朝政，都是爲其他朝代所不及的；而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書，集衆史的大成，註詳文備，剪裁有法，尤爲有大功於當代，遺實惠於後學。惟惜秦檜當國時代，和金政策實行以後，箝制異已，禁抑公私著述，故記事未能如紹興九年以前的詳密。然經李氏的苦心搜討，猶能一年一卷或兩卷。（要錄最詳者一年十三卷，如紹興五年是。自紹興十二年以後至紹興二十五年，比較簡略，多者一年三卷，少者僅一卷。二十六年秦檜已死，卽又增爲五卷。三朝北盟會編紹興十三年以後，亦比較簡略。其故因學紀聞卷十五，朝野雜記甲集卷六均慨乎言之。）一視孝宗以下，驟如撲空，讀史者失所憑依，實不可同年而語。非事無可記，實記之無人；以今視昔，宜知奮勉。歷史學的主旨，在瞭解現代事變之由來，記事能得真像，應由近而及遠。前事不致妄解，則述今或更勝於稽古。今國難空前，殘破偏地，竊念應有比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更詳備的蒐輯與更詳備的記述，安慰當代的，亦卽告慰將來的人。（我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幾將百年，尙無有如三朝北盟會編式的記載，博採中西記錄，以本國的立場詳述其事者，亦一憾事，是則蒐輯近百年來的中外記錄，亦應於戰事勝利以後及時注意。）不揣冒昧，聊爲發凡。幸黨國碩賢及時提倡，海內同志，各抒偉見，共助成之。

一、作者昔在柏林樞祕檔案館及萊茵省立檔案館參與實習工作時，卽深感原有史料易於散亡，傳聞追記，每能亂真，正式公文，公家尙知保存，而非公文類的當事人之公私書牘，散見於日報的時人談話，以及零星報告、傳單、宣言、遊記、廣告等等，實轉瞬卽失，保存爲難，若不隨時蒐輯，則時過事忘，無術追求。儒將顯宦，名賢才士，雖死後多有回憶錄、日記、史詩、札記的存留，然事後追憶，既嫌失真，而去取臆斷，尤易滋惑，約而言之，今日不努力從各方面保存原史料，則他日卽無從考訂編述一種可信的歷史。是則及時蒐輯，分別保存，實國人有志史學應盡的職責。作者治史爲業，習久成癖，故敢貢其一得之愚，於當世賢達之前，如蒙匡正，實所深幸。」（以上採自「盧溝橋事變以來中日戰事史料蒐輯計劃書」排印小冊子）



案：以上是先生所擬定的中日戰事史料蒐輯計劃書，其詳盡的程度令人驚異、讚佩、嚮往，欣然讀之，愛不釋手。足見先生運思的細密，設計的周詳，非受過專門史學訓練，兼通古今中外史學的專家不能道。先生這一計劃書，顯然受德國史學的影響，強調研究史學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性，如注重當事人的直接報告，無意的記事，審查史料的來源及留意反證，都是德國史學精神。先生留學德國期間，曾在柏林樞祕檔案館及萊茵省立檔案館實習，就深感原始史料易於散亡，傳聞追記，每多亂真。很多有價值的私人書牘、零星報告，若不隨時蒐集，往往轉瞬即佚，事過境遷，再行追記，就嫌失真，而去取臆斷，尤易滋生疑惑。所以先生說：「若今日不努力從多方面保存原史料，則他日即無從考定編述一種可信的歷史。是則及時蒐輯，分別保存，實國人有志史學者應盡的職責。」不僅有這一偉大的抱負，並付以實際的工作，與宋代的大學史家李燾、徐夢莘、李心傳相較，又有什麼愧色呢！所以先生這一計劃，受宋代史學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先生稱道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採輯豐富，註詳事盡。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專述外患，史備事詳，超越今古。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集衆史的大成，註詳文備，剪裁有法。都是以當代的人寫當代的史。先生所擬編輯計劃中中日戰事紀事彙編，是仿照徐夢莘會編的體例。中日戰事紀略長編，是仿照李心傳要錄的體例。中日戰事分區記事長編，是仿照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和楊仲良續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的體例。而修長編之法，又是司馬光、范祖禹所創，李燾加以推廣的。以上諸人，都是宋代大史學家，則知先生史學精神，遠超宋儒，豈不是信而有徵嗎？這是先生一生重大史學貢獻之一，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 四十五歲

一月一日，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正式成立。先生自敘云：「此次中日戰事，其規模之廣，意義之大，為我國歷史上空前所未有。關於此次戰事之文獻，亟應蒐集整理，加以保存，以備將來國史之採擇，及戰後研究政治經濟社會各種問題之參考。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深感此事之重要，爰合組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於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經費由兩機關分擔，而以北平圖書館負採訪蒐集之責，西南聯合大學負整理研究之責。所集史料之性質，不僅限於軍事，即政治、社會、經濟、交通、教育各方面，亦均注意採訪之。範圍不限於本國，即敵國以及各中立國之出版品，凡與此次戰事有關者，亦均被搜集。本會工作可分兩大步驟，一為蒐集保存，一為整理編纂

。」其宗旨至爲高遠。徵輯會設立主席副主席各一人，委員六人，先生爲委員之一。茲列各人姓名職稱如下：

- 袁同禮 主席（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
- 馮友蘭 副主席（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
- 劉崇鉉 委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學系主任）
- 姚從吾 委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學系教授）
- 錢端升 委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政治系教授）
- 傅斯年 委員（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 陳寅恪 委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學系教授）
- 顧頡剛 委員（國立雲南大學史學系教授）

先生任總編纂，劉崇鉉任副總編纂，鄭天挺、錢穆中文編輯，葉公超、蔡文侯、雷海宗英文編輯，吳達元、邵循正文編輯，劉澤榮俄文編輯，皮名舉德文編輯，王信忠、傅恩齡日文編輯。張敬擔任文書、岳梓本庶務，萬斯年中文採訪，鄭逢源、王育伊中文資料整理，高亞偉做中文戰事書籍提要，趙芳英編中文雜誌索引，周正福任中文剪報，顏澤霖及劉金寶任西文採訪及西文資料整理工作，王原貞編西文雜誌索引。

三月，將去歲所草「盧溝橋事變以來中日戰事史料蒐輯計劃書」予以增訂，並在昆明排印，分贈各大學及公立圖書館。

六月，先生所撰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一文在治史雜誌第二期發表。先生認爲「宗教是亂世的產物，它的目的：在發揮以先覺覺後覺的態度，代天行道，救世救人。我國崇敬孔子的儒者，不作禮拜，信仰多神，嚴格說來，不能算作宗教。佛教是外國傳來的，不爲我國所獨有。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不但是外來的，並且也不行於內地。道教支流繁多，但老子是哲人，張道陵是天師教，既不救世，也沒有理想，只是一種民族的迷信。有理想，有宗旨，有領袖（教主），有教堂，有儀式，有經典，態度積極而又能覺世救世人的，在我國只有金元時代的全真教。從比較宗教學與歷史學的觀點說，全真教纔真正是我們中華民族自創的一種宗教。」（東北史論叢下冊）此一結論，已屬顛仆不破。

先生渾樸儉素，和夷謙冲，最易受青年親近，自全面對日抗戰展開以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號召全國青年大團結，於去歲七月九日，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是歲，先生奉命在西南聯大設立支團部，旋又遵中央委員會的指示，組織中國國民黨西南聯合大學黨部，與委員陳雪屏等共同策劃，每以澄清職業學生的蠱惑，鼓勵一般青年勤學報國爲目的。在西南聯大極端複雜的政治環境中，爲擁護政府抗戰國策，鼓勵青年參

加抗戰工作，爲極艱苦的奮鬥。雖爲左派份子所畏忌而大加抨擊，然先生正氣凜然，無所顧忌。

民國二十九年庚辰（一九四〇） 四十六歲

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成立一年，先生特提出工作總報告，原文如下：

## 一、蒐集工作：

甲、書籍之採訪：中文書籍七百四十六種，西文一百二十二種，日文六十七種，小冊子一百三十八種。

乙、期刊之訂購：中文三百五十九種（內僞組織刊物六種），西文一百零二種，日文十二種。

丙、日報之訪求：中文九十四種，西文二十九種，日文五種。

丁、資料之蒐集：計有遠東問題專家論著單行本，外國人士同情抗戰之講演稿，各國駐華新聞記者稿件，外僑之祕密函件及報告書，各國教產被燬損失調查報告，各國商業損失調查、各國社團及工會抵制日貨之宣傳品與廣告，海外各政黨之出版物，文教機關被燬調查、醫藥防疫及戰地救護設施報告，戰地照片，以及敵人漢奸之宣傳品等。

## 二、剪排工作：

甲、日報剪排：抗戰史料以每日報紙爲大宗，但必須加以剪裁方能供他日之採擇。現值抗戰之時，一切官書，公文以及私家日記、筆錄，尙未至發表時期，捨報紙外，資料尙不甚多，故首先必須將資料構成戰史之輪廓，以期從事編纂者有所取材。剪報排列方法，分編年及分類兩種，編年從時序，分類依性質，二者相輔而行，互爲表裏。總期此種初步工作，能給編輯戰史者之便利。

### 附 A、剪報實施辦法：

一 所剪中文日報，斷自七七盧溝橋事變之日起。

一 剪報以寧濫毋缺爲原則，然與抗戰無關者不採。

一 主要日報須徵購三份或五份，二份或四份供剪用，一份保存，以備檢查。

一 剪報，以大公報爲主體，以他報之專載，特訊，或爲大公報所缺者配剪，尤重有關抗戰史實之切實記載。

一 所剪之報，分貼爲片段及單條之後，再依編年及分類兩種排列。編年以時日爲先後，分類依性質爲析歸；編年者供纂輯中日戰事紀略或其他編

年戰史之用，分類者供編纂專題記事或分類記事之用。

一已剪貼之報紙單片，分裝皮藏箱，編年則標明所儲材料時日之起迄，分類則標明子目。

一編年之片段及單條之資料，在特用之剪貼紙上右角加蓋事實發生之日期，左角加蓋分類區別，排列先後暫按日報出版日期定。

一分類整理暫擬為九大類，一曰軍事，二曰政治，三曰經濟，四曰交通，五曰文化，六曰民運，七曰各地，八曰日本，九曰國際。教育入文化，外交入國際關係，不另分類。

一分類整理，九大類中更析為若干子目，依事為主，以時為序。剪貼紙上右角仍鈐日期戳，左角標明子目，以便取用後歸還原欄。

## B、已經剪排之報紙：

月份二十八年一月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排列分類排列編年主要報紙昆明雲南日報主要報紙漢口掃蕩日報、大公報配剪之部昆明益世報（注重專訊、通信）昆明民國日報（選剪通訊、專訊）配剪之部武漢日報、長沙國民日報、全民日報等。

「註」(一)以後剪報擬以大公報為主，剪至目前抗戰階段，以期成一完整系統，俟此主體之編年報紙剪排完畢，再用其他各報補充之。

(二)編年整理一月一箱，每箱排列方法暫按日報出版日期，但仍須在每頁剪貼就緒之特用紙右上角加蓋事變發生日期戳，左上角加蓋分類戳。

乙、西文小冊子之整理：將中日兩國及國際間出版有關中日問題之小冊子按類排列以供研究之用。

## 三、編輯工作：

甲、「盧溝橋事變以來中日戰事大事日表」：初稿已具雛形，惟所有材料尚待增補，以期周密。

乙、「盧溝橋事變以來大事日曆長編」：撮記中日戰事，以簡明扼要為主，列為日曆，以為編輯戰事紀略之初步。

丙、「盧溝橋事變以來每日戰況詳表」：詳載每日戰事消息，以戰場為經，以日期為緯，臚列日報戰爭消息，以便檢覽全面戰事之進度情況。

丁、「盧溝橋事變以來戰局轉移地圖」：此圖專以輔助每日戰況詳表供讀史修史之參考。

戊、「盧溝橋事變以來中日戰簡明一覽表」：「扼要選記每日大事彙列為表幅供

隨時檢閱及張掛之用。

己、中日戰事紀事長編（附略例）

- (1) 凡記載或敘述抗戰史實之書籍及小冊子一律采錄。
- (2) 凡理論而無史實之書籍及小冊子不錄理論兼記載史實者錄其史實記述之部（理論精闢者選錄）
- (3) 計劃、報告、談話及有重要關係之文字得酌加甄錄。
- (4) 凡有小說性之文字不錄。
- (5) 編排所錄材料用編年體繫年月日。
- (6) 所錄材料其史實在兩日及兩日以上者分繫各日後，遇不可分截時，置最初之日後，遇無日期可考時，則置於其月之末，遇無月份可考時則置於其年之末，或仿北盟彙編之例釐為雜錄。
- (7) 采錄文字一依原樣子不加潤改，遇原文顯然錯誤者得酌加案語。
- (8) 采錄書籍及小冊子之名稱，撰人名氏、版本、冊數、面數，均注明於原文之後。
- (9) 另附采錄書籍及小冊子目錄於卷首或卷末。

庚、「盧溝橋事變以來新出戰事書籍提要」：仿四庫全書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提要體例，將本會所藏中文戰事書籍各作一提要（附提要略例）

- (1) 作者（姓氏里居及生平）
- (2) 出版年月及出版地點。
- (3) 性質及價目（性質指：「甲」述作或纂錄或翻譯，如係翻譯，當注明譯自何處何國文字及原作者原出版年月出版處。「乙」單行本或某叢編之一種。
- (4) 內容評述。

辛、「暴日侵華與國際輿論」(Japan's Aggression and Public Opinion)

英文本第二輯：內容取材擬注重游擊戰西北情況及抗戰期中後方建設等，初稿已成三分之二。

壬、「西文中日關係書」(A Selected List of Books and Pamphlets Concerni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所收書籍斷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近八年來歐美各國出版之書籍，以後出版者隨時增補。

癸、中日關係書目彙編(A Bibliography of Bibliographies 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將雜誌及書籍所刊之書目編一總目按類排列以供研究採訪之用。



## 四、索引工作：

甲、中文雜誌索引：由全國出版之三百餘種雜誌中選擇有史實價值之資料分類排列已收論文三千四百餘題加以甄選，編一「中日戰事論文索引選目」史料部分作為編輯「史料長編」之參考。

乙、西文雜誌索引：根據歐美出版之雜誌索引十餘種。

丙、中日戰事公牘索引(**Index to Documentary Materials Pertaining to the Sino-Japanese War**)體材依據**Times Index**加以擴充，專擇取各刊物中所發表有關中日戰事之**Documentary materials**以備將來研究中日戰者之參考。

丁、戰事中國國際關係史料彙編(**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本篇專收錄有關抗戰時間中之英文史料以公文性質之資料為主，間及當事人之回憶錄等。其所容納之資料計分三類：(一)中國與列強之關係(二)中日問題與世界政治(三)日本侵華與列強遠東之權益詳細篇目將來視所收得資料之情形定之。

劉崇鉉先生(副總編纂)

鄭天挺先生(中文編輯)

錢 穆先生(中文編輯)

葉公超先生(英文編輯)

蔡文侯先生(英文編輯)

雷海宗先生(英文編輯)

吳達元先生(法文編輯)

邵循正先生(法文編輯)

劉澤榮先生(俄文編輯)

皮名舉先生(德文編輯)

王信忠先生(日文編輯)

傅恩齡先生(日文編輯)

先生這一偉大史料搜輯工作，是特別具有歷史意義和價值的。從上述編輯的規模看，就可以了解先生所特具的歷史眼光了。

民國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四十七歲

西南聯大青年團支團部團務，移交委員陳雪屏負責，先生仍從旁協助。於傳道授業

# 臺大歷史學報

• 30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 第一期

解惑之餘，常常鼓勵同學投筆從戎，報効國家。

民國三十一年壬午（一九四二） 四十八歲

民國三十二年癸未（一九四三） 四十九歲

三月二十日，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在重慶雨浮支路中央圖書館舉行，先生亦前往參加。會中選舉理監事，先生以三十六票與顧頡剛、傅斯年同當選為理事。（史學雜誌創刊號）

案：史學雜誌創刊號上載有中國史學會刊第二期目錄，內有先生撰「方臘之亂與摩尼教」與毛子水合撰「談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與丁則良合錄「宋史劄記六則」，共三篇，但不知是否出版。

十一月十七日，西南聯大教授會開會，會中曾討論到盟軍來華助戰，亟需大批通譯人員，先生因而建議本校常務委員會請徵調本年度四年級全體學生，在第一學期課業結束後，即離校受訓，充任通譯工作。十二月一日，校方舉行校務會議，遂商定實施辦法，由常務委員梅貽琦在國民精神總動員月會中提出報告，得到到會全體學生一致的擁護。

案：後來西南聯大四年級學生全體應徵，服務時間長達二年，實開戰時知識青年從軍報國的先河，有助於抗戰不小。推原西南聯大所以能發動學生從軍，實由先生與陳雪屏等共同策劃激勵，有以致之。（唐允前揭文）

民國三十三年甲申（一九四四） 五十歲

民國三十四年乙酉（一九四五） 五十一歲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我國對日八年浴血抗戰，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次戰爭中，國人生命財產的損失，多至無法計算。

民國三十五年丙戌（一九四六） 五十二歲

西南聯大在抗戰勝利以後，因為戰時教育的使命業已完成，它的三個成分都迅速準備復校，是年春宣告結束，學生經過志願選擇，分隸歸屬。先生亦隨北大復員返回北平故居，任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離別八年半的北平，一旦勝利回來，所帶給先生的喜悅，誠如馮友蘭撰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所說的：「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人，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聯合大學初定校歌，其辭始歎南遷流離之苦辛，中頌師生不屈之壯志，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歷歷不爽，若合符契。聯合大學之終始豈非一代

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參見陳、吳前揭文）

先生在西南聯大所主持的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於八年間，收集各種資料二百餘箱，至是亦運回北平北海內之靜心齋庋存，為有關抗戰文獻一大寶藏，案此二百餘箱抗戰史料，在三十七年底北平淪陷時，未及運出，實是民族文化的一大損失。

十一月，河南大學校長田培林升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先生即被命出長河大。十二月，先生隻身偕田赴汴就職。時戰後師資奇缺，圖書儀器殘損，校舍待修，事事棘手，先生百方擘劃，日有起色。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一九四七） 五十三歲

在河南大學校長任。先生自云：「自三十五年十二月至三十七年五月，應當是河大復員後的整理補充時期，一切蕭規曹隨，繼續補充整理，虛心訪問，博求人才，冀對此歷史悠久的故鄉大學，有所增進。……………(1)教務長仍由郝象吾先生繼續負責，期保持『嚴格考試，認真教學』的傳統精神。總務長由黨玉峯先生擔任，訓導長由馬亦百先生擔任，期能清廉自持，並恢復勤樸讀書風氣。(2)各院系亦聘學識卓越教學認真諸教授，先定基礎，期能逐漸充實，徐圖發展。當日在張靜吾，李賦京諸教授領導下的農學院，閻振興、周禮、嚴凱之等教授領導下的工學院，均亦頗有生氣。(3)約請國內學者來汴講學，已實現者，文學院曾約請徐旭生、董作賓、勞幹諸先生。法學院長期講學者有孫文明先生）臨時講學者有張金鑑、張純明諸先生。」（中華民國大學誌上册二四二）。

十一月廿七日，河南大學校慶。先生於主持慶祝大會後，邀約時任省議員校友史宗周、董廣川、董鑫、張豁然、李安等聚敘，詳談學校拓展計劃，由充實現在述及展望將來，甚有遠見。如擬以文學院移設輝縣百泉，工學院將著重發展水利，治黃學術研究，為鄉梓興百年之利，深受各方一致讚佩。先生辦教育眼光遠大如此！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一九四八） 五十四歲

時國家實行憲政，先生經全國教育團體選舉為國民大會代表。是年三月二十八日，在首都南京召開首屆國民代表大會，選舉今 總統蔣公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

六月，共匪流竄河南，擾亂開封，月之十九日，匪軍由東城宋門攻入市區，巷戰開始，廿日，開封陷沒。先生在危城中，即思脫身之計，先將麵粉十餘斤炒熟盛于一布袋，另購黃瓜若干根，並將在德國購置之金鍊掛錶及安全剃鬚刀分藏於二大饅頭內混於十餘饅頭中，把金鍊另用布包好當作腰帶，化裝成一老農，與河大三五學生乘夜混出城。雜難民中，向東步行。先生雖居北平、旅德國，寓雲南者達三十餘年之久，然鄉音未改，且頭髮斑白，隨行學生均以老公公呼之，故未引起他人注意。從開封到歸德，沿途歷經戰火，十室九空，晝則冒炎日兼程前進，夜則舍破屋中，飢則吞食乾饅頭，渴則剖食

生黃瓜，艱苦之狀，可想而知。幸先生身體健壯，有克服困難的剛毅精神，刻苦耐勞的良好習慣，終於安抵歸德，詢知國軍周鼎所部駐所，即往拜訪，遂獲護送至徐州，乘車至南京。一位國立大學校長，運用這樣的心智毅力，臨危不亂不懼，不僅在國史上絕無僅有，即放諸國史，亦屬罕見。（吳相湘撰姚從吾師盡瘁史學，傳記文學十六卷五期；唐允前揭文）。茲再錄先生自述脫險經過如下：

「三十七年，共匪叛國罪惡逐漸暴露，六月中旬，突攻開封，激戰三晝夜，十九日，由東城宋門攻入市區，巷戰開始。二十日黎明，敵人與學生吳、甘、馬、黃、袁等七人，易服各携麵粉一小袋，雜難民羣中出城，當時市區砲戰方烈，沿街死屍相屬，出城後，方見匪哨瞭望，難民低頭前行，匪亦不問。約行一小時餘，紅日東昇，羣始集於一小村中，飲水休息，時學生至者漸多，因會同吳、甘、馬諸人，與諸生作簡單約言：赴商邱者雜難民中東行，期免失散。分隊酌給麵粉，期足三日之養。自小村東行，共約二十里，方出警界線，過此未遇匪軍，亦無人查問。第一晚宿先鋒營民家，第二日宿羅旺，曾遭檢查。第三日遇國軍第五軍西援開封，且戰且進。難民羣因繞道睢縣境，至深夜方住白岡寨，數遭盤查，因人數衆多，幸無留難。至六月二十三日下午方至隴海路柳河車站，與駐軍取得聯絡，當夜趕至商邱，住省立中學。旋晤周警備司令，始知開封於六月二十二日消息不通。翌日向教育部與北平家人報告脫險消息。時腳腫失眠，至商邱停留一週，與當地河大同學會，教育界等，籌劃安置東逃學生，略有頭緒，方乘火車赴南京，當蒙 總統召見，並發軍毯三千條分給東來學生。」其艱險之狀，尤在語言文字之外。（中華民國大學誌）

案：門人吳相湘記先生能脫險既屬命運，又因為平日習於刻苦，特轉錄如下，以備一說。云：「民國三十七年夏，相湘適奉派至南京，聞開封淪陷，深以從吾師安危為慮。教育部囑檢尋河大師生名冊，以便辦理接待逃出汴垣師生事宜。從吾師每次來南京，均借居成賢街中央圖書館小樓一角，相湘隨蔣慰堂館長打開從吾師臥室內一綠鐵皮箱檢尋名冊時，不覺淚下如雨，心中總以陷身赤魔手中，凶多吉少。每日除打聽消息及祈禱以外，別無策可施救援。一日，偶遇一湘西籍國大代表石君，自稱可卜吉凶，相湘知從吾師生於光緒甲午重九，乃請石君卜之。石君旋告以安全無虞：以午屬火，刀兵屬金，火必尅金，可寬心。當時惟有祈求其靈驗，而二日後，從吾師脫險安抵歸德喜訊到京，又一日，從吾師經徐州安抵南京。從吾師此次能脫離虎口，實其平日習於刻苦有以致之。」（吳前揭文）

先生抵南京後，即往在成賢街中央圖書館，時河大學生陸續逃來南京的很多，教育部命東來師生由下關逕往蘇州休息，徐圖復校。先生一路辛勞，抵京後又有諸多困擾

，乃血壓增高。及轉至蘇州，主持復校上課。當先生在開封主持河大校政時，夫人及子大湘、女大良皆留住北平，是年秋，亦相偕南下至蘇州團聚。先生既患高血壓症，又患心臟衰弱病，不克任繁鉅，乃向教育部懇辭河大校長職務，未獲即允，約以開學為期。歷時三月方始就緒。十月十日在中正路怡園總辦公處舉行開學典禮，各學院亦陸續上課。先生回憶云：當時「為加強新研究情緒起見，先後邀請史學家錢賓四先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慰堂先生，教育家汪懋祖先生，鄉里賢達秉農山，馮芝生、張伯英諸先生，來蘇講學。」（中華民國大學誌）師生情緒始漸安定。先生以健康關係請辭河大校長職之意益堅，適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早有意聘請先生出任故宮文獻館館長，在南京看到先生健康，因即將館長聘書送到寓所。至十二月，教育部始特准先生所請，河大校務暫由教務長代理。先生即於同月就文獻館館長新職。

民國三十八年己丑（一九四九） 五十五歲

一月，先生自南京將故宮第三批文物（文獻館資料為主）裝載在崑崙艦後，即經上海押運來台灣，由基隆登岸，再運到台中運放。暫居台中。生活甚苦，賴夫人變賣飭物為生。

二月，夫人受聘為台灣省立彰化中學英語教員；先生全家遷居彰化，生活漸告安定。據夫人追記云：「剛到台灣時，生活極苦，靠變賣先母所賜飭物為生。在學生蔡麟筆君的幫忙，從吾的敦促下，我往彰化中學教書，才渡過難關。從吾待人誠厚，常不顧自身的安適，協助親友，獎掖後進，我總本著向上向善的原則，盡力協助他。在生活不安的處境中，都在不知不覺中渡過。回想起來，還感到心悸。」（姚從吾先生哀思錄）

三月，先生受聘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時新就任的台大校長為北大老同學傅斯年。傅問先生：「嘿！你現在還能好好教書？」先生答道：「你當校長，我一定賣力。」傅認為一個人當了校長，就沒有時間讀書和研究，他自己就有這種苦惱。事實證明，先生二十多年來一直為台大賣力。（哀思錄）時先生全家仍住在彰化，每兩週北上一次授課。

民國三十九年庚寅（一九五〇） 五十六歲

在台大歷史系任教，授遼金元史，歷史方法論。暑後，先生舉家遷來台北。

十二月二十日，老朋友台大校長傅斯年在台北市台灣省參議會以腦溢血病逝於議場，噩耗傳出，學術界與教育界莫不萬分哀痛，先生與傅氏係三十年故友，一旦永訣，內心的哀悼是可想而知的，故輓以聯曰：「細思中夏簡冊所傳，君自應稱國士；緬想卅年切磋之益，我今痛失導師。」（傅孟真先生年譜）先生曾云：「逃難來台，一時百念俱灰，孟真先生死後，益感人生無常。」均是實錄。



民國四十年辛卯（一九五一） 五十七歲

春月，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祕書長張其昀派祕書宋晞來台大歷史系先生研究室替先生辦理重新登記黨籍的事。先生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在西南聯大時為黨貢獻心智，此後亦不斷參加知識青年黨部工作。

二月，在台大文史哲學報第二期發表「契丹君位繼承問題的分析」一文。近年生活漸趨安定，為報國，為教學，願以有生之年精深研究，努力寫作。此後，除授課外，即埋首研究室，有時到晚飯時間已過，仍沒有回家。

民國四十一年壬辰（一九五二） 五十八歲

秋，受教育部之聘為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

十二月，在台大文史哲學報第四期上發表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一文，在結論中，先生說明北方塞外部族在國史上的地位和對於我中華民族文化的貢獻，此為先生研究邊疆史的結晶。先生說：「大唐帝國瓦解以後，入主中原的東北民族，首為契丹人，次為女真人，再次為北方的蒙古人，最後又是東北的滿洲人。契丹人統治中原的態度是放任的，目的在享樂與羈縻，對於漢人只有消極的剝削，而沒有積極的管制。……契丹自燕雲十六州歸他們統治以後，曾實行一種兩元政治，……番漢之間只求苟安無事，並沒有一種互利進步長期合作的計劃。蒙古入主中原，大體上仍以掠奪為原則，利用與剝削之外，對中原漢人的生死榮枯漠不關心。雖間有一時的撫慰，實無長治久安的遠圖。元世祖忽必烈算是最關心漢地治安的了，但他推行政策：以蒙古人管軍，以西域人理財，以佛教為國教，以漢法治漢地。當時的漢儒，祇是政治上一小部分的助手，仍未超出利用與剝削的大原則；因此軍事停止，統治權也跟着瓦解。比較上番漢合作最親切、最實際、文化與武功也能比較配合的，要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與清朝了。在這兩個朝代，就番漢兩大種族長期合作後混合的結果與經過說，有利用也有互助，有衝突也有瞭解，文治武功相得益彰，可與漢唐並駕齊驅，而視宋明遼三朝為優勝。金朝的疆域，廣闊雖不及蒙古人，而文化的成就則遠非蒙古朝可比。我們承認東亞中華文化的第二主流是女真人，理由即在於此。清朝就以往的歷史說，是次於漢朝唐朝的繁榮時代，金朝是清朝的前驅，這種好的開端，可以說是從金世宗開始的」。

民國四十二年癸巳（一九五三） 五十九歲

是歲，中央黨部祕書長張其昀所主持的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擬編印邊疆文化論集，請先生撰文以光篇幅，先生乃撰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遷燕後的轉變一文以應。文中指出因為女真人自己沒有定型的文化，更能發揮長於模倣的精神。遷燕以後，環境既與漢唐無殊，行動自更與漢唐類似。就金朝一代政治來說，比宋遼並不算差，乃其接受

漢化的結果。

民國四十三年甲午（一九五四） 六十歲

中國歷史學會成立，於三月七日召開會員大會，先生被選為理事。方豪追記當時情形說：「張曉峯先生在中央黨部秘書長任內時，力促中國歷史學會復會；民國四十三年春，他約張致遠先生，牟潤孫先生和我籌備，三月七日在台大法學院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從籌備時起，姚先生即非常熱心。四月三日舉行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這次會議是由胡適之先生出名召集，也由他擔任臨時主席；但胡先生却又提議請沈剛伯先生擔任本日會議主席。當推舉常務理事時，胡先生表示他常在國外，頗不方便，主張由國內者擔任；結果，沈剛伯等五人為常務理事，沈先生為召集人。劉壽民先生因事赴台中，留函建議由我擔任總幹事，姚先生在會中又竭力鼓勵，就這樣逼上了梁山。」（方豪：我所認識的姚從吾先生，傳記文學十六卷五期）

十二月，在台大文史哲學報第六期發表說遼朝契丹人的世選制度一文，指出契丹的選汗習慣，漸被中原漢唐系文化「世及嫡長制」所取代，到聖宗即位，興宗繼立，道宗踐祚，已完全採行立嫡立長制度。這一轉變，純為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要求，這正是歷史的任務。

民國四十四年乙未（一九五五） 六十一歲

七月，在大陸雜誌十一卷一期發表「忽必烈於漢化態度的分析」一文，分析中原文化在外族入侵時能够保全的原因：（一）重視忠信。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在忽必烈的潛邸舊侶中，如姚桓，商挺的忠貞，許衡、趙復的篤敬，自然博得忽必烈及繼體之君的重尊。（二）守法不阿與誠實不欺。所謂：「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如賀賁呈獻所得藏金，許衡不食無主的梨，自然值得欽敬。（三）中原文化易知易行，己所不欲，毋施於人，己之所好，推及人人，皆有賴於身體力行。所以說：「忽必烈的傾心漢化，人的因素，關係至鉅」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漢文化，經過漢唐兩大帝國長時期的發揚充實，基礎深邃，同時地廣人衆，憑藉雄厚，自一二一五年後，蒙古佔領的華北，歷久不能安定，遂成為政治上一個嚴重問題，忽必烈獨能高瞻遠矚，號召四方文學之士，研究如何復行漢化，於是羣賢畢集，形成一個集中解決漠南漢地問題的集團，使此一急迫的問題，開始獲得解決，這一結論，已屬顛仆不破。

十一月十五日，台大十周年校慶，特舉辦各項學術講演及專題討論，以資慶祝，先生主持長城在國史中的地位一項專題討論會，並講述金元時代的長城，到會聽衆一百五十餘人。

是歲，先生受聘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員。

民國四十五年丙申（一九五六） 六十二歲

六月，在學術季刊四卷四期發表「匈奴爭奪東亞霸權的檢討」一文，此為先生論述匈奴史最後的一篇文章。先生認為匈奴史的研究是世界性的。因為匈奴首領冒頓單于的奇特，張騫、蘇武故事的動人，在歐美東亞史與東方學，特別是漢學的探討中，始終佔據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先生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曾開過匈奴史研究的課程，討論過「匈奴的立國精神」、「匈奴爭奪東亞霸權評議」、「西漢和親政策的新評價」、「匈奴文化的特點」、「匈奴西遷的研究」、「陳湯與郅支單于」等問題，主旨在從事我國史書中、古遺物中，對匈奴史材料的搜集與整理。

民國四十六年丁酉（一九五七） 六十三歲

八月二十三日，先生應台北市聯合國同志會之邀，在中山南路教育部第一會議室舉行的第一七二次座談會中發表演講，講題為「對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發表在大陸雜誌第十五卷第六期中。先生確認國史所以擴大綿延的原因，乃由於儒家大同文化的維繫，一部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儒家大同主義文化的發展史，這裏值得敘述的是：

第一、先生認為我們的歷史綿亘數千年，沒有間斷，應該歸功於下面這幾個因素：（甲）漢唐在東亞開拓疆土的廣大，因為地大物博，生存的空間寬裕，所以能建立一種多方面的有彈性的以農桑為本位的中原文化。本錢既雄厚，便可以繁殖種姓，增進文化；更可以對外抵禦侵略，招徠遠人。（乙）我們有富於人情味的儒家哲學，既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更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有「有教無類」與「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大同世界觀；所以數千年來雖遭遇種種艱難，而仍能克難恢復。（丙）漢唐兩代的武功文治，等於我們有兩個羅馬帝國。對於政治、法律、社會組織（家庭宗教觀念），尊基深厚，兼容並包，可以峙立永新。

第二、先生認為國史從殷商發祥，直至廿世紀辛亥革命，曾經過五大醞釀，四大混合：（一）有商、周、春秋戰國的醞釀，而後有秦漢的第一次大混合，（二）有魏晉五胡十六國的醞釀同化，與南北朝的分途發展，而後有隋唐的第二次大混合。（三）有五代的醞釀，與遼、宋、金的分途發展，而後有大元帝國的第三次大混合。（四）有明朝與蒙古的對峙休息，而後有大清帝國的第四次大混合。對於辛亥革命以後的國史，先生認為中華民族正面臨一種新的考驗，但相信我們能迎頭趕上西洋的科學文化，並實行民主政治，一定可以造成歷史上的第五次大混合。

第三、先生認為我國歷史的形成，實以漢唐中原儒教文化為主流，黑水白山的亦漁亦獵亦農的女真滿洲文化為第一支流，北部大漠草原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的遊獵畜牧文化為第二支流。就歷史的形成說，東北區域尤為重要，就演進的大勢說，漢唐中原農業文

化是主體，第一第二第三支流等其他文化是輔佐。

第四、先生認為中原漢唐文化所以能領袖羣倫，使邊疆各支流文化能朝宗歸海，形成今日世界文化中東亞一大民族與文化單位，推厥原因，實由於中原文化富人情味，有世界性，能誘導邊疆民族，自動的接受漢化。這些邊疆民族，雖以武力侵入中原，而對於文化則樂於捨己從人，承襲漢唐。漢唐時代規模雄偉，中原儒教文化向外擴充，尙可以說是由於漢唐強大武力的領導，因得發揮雄厚的財力與充沛的人力，而使四鄰歸服。但大唐帝國瓦解以後，這些憑藉都沒有了，勢將步羅馬希臘國亡而民族文化也隨着煙消雲散之後塵，可是詳觀契丹（遼朝）、女真（金朝）、蒙古（元朝）的歷史，他們反而都自動的採行中原儒教的文化。舉凡漢唐留下來的政治組織，如三省制度；立君習慣，如立太子；考試制度，如開科取士，都逐一仿效。不但沒有破壞漢地原有的社會組織，反而全部的或部分的與中原人民合作，共存共榮，接受了中原人民的生活方式，後來即乾脆相率成為廣義的中華民族。從遼金元清的歷史中，反而真能認識中原儒教大同文化的客觀價值。

這篇文章長達一萬六千餘言，是分析最透澈研究最深入的論著，是對我國歷史發展所提出的最明確最深入的看法，為前賢觀察所不及，解釋所未周，堪稱民國以來講述中國通史的第一篇大文字。先生講完後，緊接着有桂禮江、陶振響、朱瑞祥、孔慶林分別提出問題，先生即一一解答。最後又綜合答覆如下：「承諸先生提示種種意見，至為感謝。現在再綜合歸納如下。一、中國歷史悠久、擴大、綿延，沒有中斷，據個人的看法，是由於中原漢族儒教大同文化的維繫。這應當是一個總原因。然儒教大同文化何以產生？何以有如此雄厚持久的力量？則原因甚多。而地理物產方面憑藉的廣大深厚，生存的空間寬裕，以故人口繁衆，農業發達。哲學文化富人情味，兼容並包，擇善而從，具世界性。這些實為主因。由此互為影響，因使民族的歷史與文化交相鼓勵，進步不息。中間雖經歷困難，而均能克服。二、從歷史看，中國數千年來，所接觸的民族，並非盡屬文化落後的邊疆民族，就中如印度，有大乘佛教、禪宗等傳入中國；如阿拉伯，有天文、算學等傳入中國；中國均能吸收消化，有所發揚。晉唐時期名僧如法顯、玄奘輩，遊學印度，終身篤修，成就偉大，至可欽佩。近年我國留學美歐學生，對科學、工程等也逐漸有所貢獻。相信這種貢獻，將日益增進。將來的事，固難預言，但我們是有光榮歷史與優良文化的民族。已往對印度，阿拉伯等的抽象知識，已經虛心、努力學習，擇善而從了。現在既有更美好，更實用，更合理的自由、科學、民主的文化；則上下一心，急起直追，不甘落後，自可斷言。這是我們可以引為自慰自勉的。」（大陸雜誌十五卷六期）這是研究國史的根本問題，先生已發揮至淋漓盡緻了。

十一月十七日，先生向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提出四十七年研究計劃，請予補助。題目為「元朝祕史研究與漢譯蒙音本的初步整理」，此一計劃，旋獲得通過，特予補助。計劃書長達二千多字，說明工作性質與工作計劃甚詳，此一計劃世界性，為研究元祕史之總成績。原文如下：

## 一、研究重點與預期獲得的結果

(一)從研究史料的觀點整理現存漢譯蒙音本元朝祕史：按現存「元朝祕史」，蒙文原本，早已失傳。（最近僑外蒙科學委員會委員策，達木丁、蘇隆新編譯的「蒙古祕史」，仍自承「以漢譯蒙音本為底本」。見一九五七年三月謝再善中譯本序言。十八頁）。今存者，為「明初漢譯蒙音本」，全書十二卷，二百八十二節。現時通行本有二：一為一九〇八年葉德輝刊本；一為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三編本。比較上，後者晚出，且收有北平圖書館所藏明刊殘葉（計共四十一葉），實為優勝。此書從吾在大學主講遼金元三朝史，好之已久；實因此書確為我國正史與漢文記載以外，唯一的，由蒙古人寫的，大部頭的直接報導塞外邊疆民族歷史的著作；從此一書中，不但可以獲得十三世紀震驚世界，統一中國元朝太祖（成吉思汗一二〇六—一二二七），太宗（窩闊台汗，一二二九—一二四一）的許多直接史料；且可由他所記塞外游牧民族，草原生活與田獵習慣等，印證「廿四史」中所記其他塞外諸民族，（如匈奴、東胡、突厥、契丹、女真等）的習俗與文化。

這些游牧社會的特殊習俗與文化，例如：（一）嫩秃黑（NATUK）、「營盤」，意即故鄉，一譯「家道」，應該即是元史（一一八）特薛禪傳中的「農士」。（譯言「經界」或「分地」。）（二）推定繼承君王，（如祕史卷一，第五十二、五十三節及卷續一二十頁以下。）應即契丹族的選汗。（三）擇子世官，應即契丹、突厥、匈奴的世選，或世官等等。這些習俗與文化，都是前次國人很少注意的。（再者廿四史中外國傳所記東北、西北邊疆民族的歷史、風俗、生活、行動等，常使人有片面的，「甲國記乙國」的感覺。但由此十二卷「元朝祕史」的比較、印證，上述遺憾，即可獲得若干的補救。）

(二)從蒙古語文下手，校正漢譯蒙音本，完成一種新譯的「國語蒙古祕史」現存「漢譯蒙音本元朝祕史」，出自中古蒙古文（約自十二世紀末至十五世紀末），流傳至今，已有七百餘年。（假定從一二四〇年到一九五七年）漢譯有逐字譯，有總譯。逐字譯難有助辭，語尾；總譯又係明初方言；助辭既不易瞭解，方言則文義亦覺特殊。加以後人輾轉傳鈔，譌誤亦勢所難免。因之，



現代各國東方學者，蒙古學者，對「漢譯蒙音本」的原文，已不能全部澈底瞭解。推敲比證，煞費苦心。今據札奇斯欽先生（蒙古青年學者，民國二十六年卒業北京大學政治系，留學日本，現為政大兼任教授，著有「蒙古之今昔」等書。）與若干蒙古前輩學者的研究估計，瞭解清楚而無問題者，可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年來繼續琢磨，選註蒙古字，則力求慎審；對明初方言，則詳求比證；遇鈔寫訛誤，亦慎加校勘；多方研究，則所知已逐漸增多。今仍擬從文字方面下手，繼續校讀漢譯蒙音，一方面由札奇先生將漢譯蒙音，復為蒙古原字；一方面將已校正的字句，從新譯成國語。同時對於各國學者的貢獻，也多方訪求，擇善而從；期能全部瞭解，完成一部新的，完善的「國語蒙古秘史」譯本。

(二)採用近世學者的新研究，期能充實新譯本的注釋：「漢譯蒙音元朝秘史」，自一九〇八年葉德輝氏刊行，一九一三年伯希和先生倡導以來，四十餘年各國專家輩出，新著日多。而蒙古語言研究，成就尤大。約而言之，可分為下列五個研究重心。(一)法國伯希和先生（**Prof. P. Pelliot** 一八七八——一九四五），與他的門弟子，如**L. Hambis**等，比籍神父田清波（**A. Mostart**）的論文（多為法文），也可歸入此一重心。（以上法文）。(二)德國海尼士教授（**Prof. E. Haenisch**）曾將全部秘史譯成德文。現在華盛頓大學的鮑璞教授（**Prof. N. Poppe**）的研究，（論文多為德文，次為英文）。也可歸入此一重心。（以上德文）。(三)美國哈佛大學則有柯立夫教授（**Prof. F. W. Cleaves**）與洪煨蓮先生等，近年來在哈佛亞洲學報等所發表詳明的論文。（以上英文）。(四)日本研究秘史的人數最多，時間也較早。那珂通世，初譯文廷式鈔本在一九〇八年；繼起者則有白鳥庫吉、小林高四郎等（以上日文）。(五)俄國**A. Palladius (Kafarov)**初譯秘史為俄文，遠在一八六六年，現在新譯漢譯蒙音本為俄文者，則為郭增（**S. A. Kozin**）等（以上俄文）。上列各家對元朝秘史的研究，大部分屬諸語言學，文字學方面的比證與發揮；一小部分屬於史實的考證。屬於史實考證者，當儘量採用；屬於語言者，僅就必需者擇要選取而已。（最近大陸偽組織為便利宣傳，於一九五一年、一九六五年，也有兩種通俗「蒙古秘史」譯本出版，均由謝再善執筆，一是直接利用葉德輝漢譯蒙音本，一是新譯俄文編譯本；〔兩書均已由香港購得，〕惜均係通俗宣傳性質。查大陸專治元代史，而兼通法、英、德文者，有邵循正、韓儒林、翁獨健等先生。偽組織新譯此書，不讓三氏

與聞，而聽憑謝某一人主持，即為不重視學術研究的實證。）

- (四)預期獲得的結果：總括上述，再具體列舉可能完成的工作如下：⊙擬從蒙古語文入手，逐字校正漢譯蒙音本，期能瞭解正確，從新譯成一部「國語蒙古秘史」，這一新譯本，應當是忠實的，完整的，學術的，可讀的。⊙以史事為主，以文字校正為輔。即是注重史料的認識與史事的比證。文字的推敲，當於將來蒙文復原時再試詳之。⊙這一新譯本，應於每節或每段後，附有詳明的注釋。注釋應分下列兩部：甲、歷史事跡的解說與考證。即注重秘史中所記人與事等歷史性的價值。乙、語文（蒙文的，明初方言的。）的校勘與解說。以上兩部，均應盡量採用世界學人近三四十年對此書研究的結果與貢獻。（注文排印小兩號的字，用阿拉伯字母標記，散見每段或各節之後。）⊙這一新譯本，應附有地圖、照片（如成吉思汗、窩闊台汗遺像及有關蒙古文化〔生活〕、歷史圖片），與一「蒙文字彙」（人名、地名專門名詞等。）印於書後，以便對照。⊕這一新譯本擬定名為「漢譯蒙音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

## 二、研究計劃的實施：

上述工作，一部分早已開始。今擬從事整理，先將本文國語新譯部分，加以系統編排與注解，需時約一年半左右。（一）工作實施時所用的底本約如下述：⊙漢譯蒙音元朝秘史，翻譯滿文時，依據四部叢刊三編本，參用白鳥庫吉本與葉德輝刊本，並採用伯希和，**Mostaert**，柯立夫，小林高四郎諸先生的新研究。⊙羅馬字譯音，暫用白鳥庫吉本，參用伯希和與海尼士譯音本。（二）注釋：語文解說，史事比證，缺略補充，筆誤校正，除李文田，高寶銓，沈曾植，王國維，陳援菴諸氏原注解外，盡量採用伯希和、海尼士（**E. Haenisch**），武拉底迷兒造夫（**Vladimirtsov**），柯立夫（**Cleaves**）諸家的研究與新貢獻。（三）詳注出處，及去取標準，以便同好者之查對與批評。（四）法、俄、英、德、日重要論文，擬選譯全文，兼收書評，另集成冊，期成正確引用，不致斷章取義。」

十二月十一日，聯合國同志會舉行第一七八次座談會，由同事方豪報告歐美及日本研究中國史的近況，先生亦出席，並於主講人講畢後發言，倡導組織一個宋史研究的機構，主張由方豪、全漢昇、趙鐵寒諸教授主持之，約集國內研究宋史的人，編印宋史論文集及中國近五十年來宋代史研究專著與論文目錄，籌劃出版宋代史料及研究專刊，以期與國際上研究宋史機構合作，皆屬當前之學術研究急務。後來宋史研究會的成立，宋史研究集的出版，實基於先生一言。先生談話全文如下：

「今天方杰人先生所報告，歐洲國際青年漢學家所發表的『宋計劃』(Sung Project)，或者說對於宋代史的研究，就有些兩樣了。就鄙人所聽方杰人先生的演講，與所知李濟之先生、張貴永先生的報導或通信，我們知道：宋代史的研究，是新興一批英、德、法、義、荷蘭等國青年漢學家們主持的。這一計劃的提出，也不始自今日。發起人與主持人白樂日博士(Dr. St. Balazs)是匈牙利人，原為德國柏林大學已故漢學研究所主任，名歷史家傅朗克教授(Prof. Otto Franke, 1863—1946)的學生。兄弟留學柏林時期(一九二一—一九三四)，也曾一度與白樂日先生交換鐘點，譯讀唐書食貨志。人極英敏幹練，漢文之外，精通德、法、英文。這一計劃由他發動，可知是有選擇的。他們既都是少壯派，對中國學問(Sinologie)的態度，又與老一輩不同。主要精神之一，在於認識現代的中國。他們選擇研究宋代史，也就是因為宋代史與現代的中國比較接近。這一認識是自發的，與我們無關。就是說，有我們參加，他們在那裏研究；沒有我們參加，他們也仍是在那裏研究。不過白樂日先生們很歡迎我們與他們合作。對於這次我國出席德國明興(Muenchen)(慕尼黑)馬堡哥(Marburg)國際東方學會與青年漢學家會議的代表，李之先生、張貴永先生，尤其是方杰人先生表示甚佳，開誠相待。特別歡迎方先生親臨巴黎，參觀白樂日先生親自主持的宋史研究工作，贈送所有關於「宋計劃」的出版品，歡迎我們能與他們合作。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個國際文化合作的機會，不是跟著人家跑。今天藉聯合國同志會的講演座談會，由方先生專門報告此一問題，並請到會的諸位先生發表意見，也就是想讓大家知道，歐洲青年漢學家對於研究我國歷史，是如何的注意。我們對於這般青年朋友對宋代史研究的工作，應當持些什麼樣的態度。

兄弟在大學講授遼金元史，因此也喜歡閱讀宋、元人的文集雜著等，最近也曾與方杰人先生、蔣慰堂先生、趙鐵寒先生等交換意見。主張儘可能的與白樂日先生等合作。並主張推舉方杰人、全漢昇、趙鐵寒三先生偏勞主持。由方先生等總其成，組織一個專門研究宋代史的機構，以便對內對外，進行聯絡。再請求教育部、大學、中央圖書館，以及各有關研究所協助進行。茲將個人的意見，再歸納為下列三點，略述如左。

- 一、聯合國內對宋代史有興趣的人，積極籌劃工作，以期能與國際青年漢學家合作。這一項工作，據方杰人先生的表示，有些即可著手，有的已經有人担任。如：(一)約集國內研究宋代史的人，出版「宋史論文集」，(二)編輯「國人近五十年來宋代史研究專著與論文目錄」，(三)出版宋代研究專刊，(如(1)「三朝北盟會編與徐夢莘」，(2)

楊家將事跡考，(3)宋代書院考，(4)宋會要研究等）及其他。這些都是我們應當作的，而也是他們所願意知道的。

二、一方面可以觀摩比較，與世共進；一方面也可取長補短，擇善而從。上述合作辦法，若能見諸實行，自與我們非常有利。宋代史是我們列朝史的一部分。在這一部分內，能得到國際青年漢學家的合作，自然可以知彼知己，獲得種種的便利。如他們強調宋代影板印書的重要性。這一點自也是我們所已知道的。但是經過國際朋友們的再度提示，自更可加強我們的自信，鼓舞我們的興趣。又如宋代科學的發達，據說，單就這一項李約瑟先生即可列出幾百個人。這些自然都是對我們有很大幫助的。其他如地圖、統計表、繪畫、照片等的繪製與選用，一向都是歐美先進學者的專長。我們若能擇善而從，正可以補充我們的不足。至於有些工作，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等，如何譯音，譯音如何方能一律，那是他們的事情，我們自然可以酌量放棄了。

三、有了上述準備之後，此後我們可以每年推派代表參加青年漢學家的會議，或有關的國際東方學的會議，以便多多認識新的朋友。多多瞭解國際間研究我國歷史等方面的行情，以期更能得到國際間的提携與合作。」（大陸雜誌十五卷十二期）先生對倡導宋史研究的熱心，是令人敬佩的。

民國四十七年戊戌（一九五八） 六十四歲

中央研究院在台恢復院士選舉，先生被提名為人文組院士候選人。於四月十日第三次院士會議中，當選為人文組院士。此一學術上的最高榮銜，先生得之，絕非偶然。時先生正開東北史專題研究一課程，選修學生有杜維運、陶晉生、桑秀雲、施曼華、劉鳳翰、蕭啓慶、陶英惠和德毅等八人，特於次日在先生研究室設茶點向先生致祝賀之忱，並恭聆先生訓誨。茶話會後，特在傳園合影留念。

春，台北市研究宋史的同好，相率組宋史研究會，先生亦參與，同共編輯宋史研究集第一輯，收錄近年發表的研究論文二十六篇，都三十二萬餘言，於本年六月出版。

同年，國史館組織史料審議委員會，聘先生為審議委員。

先生於去年以元朝秘史研究與漢譯蒙音本的初步整理專題，向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提出申請，並獲得通過補助，這是一個兩年計劃，至今年六月底，第一期已屆滿，乃於七月四日致書該會，詳告工作進展情形。書云：「從吾與札奇斯欽君前所擬學術研究計劃『元朝秘史研究與漢譯蒙音本的初步整理』，承蒙貴委員會核准補助，並於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廿八日收到第一批補助金新台幣壹萬五千元。從

吾等由此得以安心工作，至爲感激。同時印製稿紙、卡片，購求重要書籍，支付法文翻譯稿費等等，也均得應時舉辦。諸承厚助，至感方便。……頃者第二批補助金即將撥發。僅依原定合約，……將所主持的元秘史研究從新譯註工作進展情形，分爲(一)新譯工作，(二)注釋工作與(三)其他正在進行中的預備工作三項，略述如左。敬請審核備查，若有指示，自當考慮遵辦。

## 一、秘史新譯工作進展情形：

(一)案四部叢刊本「漢譯蒙音元朝秘史」十二卷，從吾多年前即已著手研究；意欲從事改譯，增加新注。就中漢譯蒙音部分，在字旁逐日註寫蒙古原字，由札奇斯欽先生擔任，去年（一九五六）春已全部作完。惟此係初步工作，是否正確與完備，尚待進一步細心的考查。自與貴會成立合約後，從吾即與札奇先生對前次已進行的工作，商定一整理覆審辦法，分爲兩部各別進行。一爲將已有漢譯從新逐字校正蒙文，務使新譯與蒙文原意彼此符合。二爲將已校正蒙文的新漢譯，寫成現行能讀的國語。前者由札奇先生擔任，後者由從吾擔任。舊有漢譯校正蒙文部分，札奇先生至目前止，已作成五卷，一百六十九節，約佔全書五分之二。（全部元秘史十二卷，共分二八二節。三卷以前每節較短字數亦少，故一六九節祇有十二卷中的五卷。）已校正蒙文的新譯，寫成現行國語，從吾已作成一卷，計六十八節。國語新譯對明初舊譯，重要區別如下：①缺者補充，②漏者增添，人名、地名增添尤多。③以國語爲主，期能生動達意；對明初白話，當盡量採用。④增加批評式的說明與注釋。

(二)又秘史的蒙古人名，地名，專門名辭（官名、制度名、器物名等），專門術語（如「掃花」、燒飯祭祀等），擬集成蒙文字彙，詳加注釋，兼譯漢文，附印全書之後。此一工作亦已由札奇先生開始。

## 二、注釋工作進展情形：

(一)新譯本注釋工作，由從吾執筆，以簡明爲主。⊙凡李文田（元秘史注）、沈增植（元秘史補注）、高寶銓注文有可採者，均酌量採用。空泛不切實際者不錄。⊙凡比國Uostaert神父所提出的疑難字句，認爲伯希和、海尼士、郭增等三人譯文不明，須加改正者，均全部予以注意（郭增所譯俄文，暫從Uostaert與謝再善譯文所引），不需要時，亦不盲從。⊙認爲有詳註的必要者，隨時增加（如卷一，第一節中的營盤，蒙文作「嫩禿黑」，應即元史卷一一九德薛禪傳中的「農土」，應加注解之類。），刻下第一卷注譯初稿，已將作完。

(二)又，近日中央圖書館善本目錄出版，發現歸安王樹榮先生在光緒三十一年（一九



○六），曾完成元秘史潤文一部。（鈔本，共八冊。）此書至現在為止，尚為國外治斯學者所不知。王氏的主旨，是將原來的明初俗語，易成文言；沒有新的發現，初看似覺用處不大。但王氏也是才智之士（他生於一八七一，一八九四舉人，後入京師法律學堂，任高等廳事長。），學有根底（著有紹邵軒叢書七種），成此書時，年富力強，用功頗深。對於明初白話術語的瞭解，有時甚為精細。（如凡例說：元人的國語、元人的制度，皆不加改動，可知他也頗知實事求是的道理。）如秘史明初漢譯中有「頭哨」、「後哨」字樣；乍見有些生硬。王氏潤文改「頭哨」為「前鋒」、「後哨」為「殿後」，比較上就明白多了。又王氏注文全鈔李文田秘史注文，增加的甚少。但此書總是經過留心人研究著成的，所增注文，有時也頗為有用。

### 三、其他若干預備工作進展情況：

上述翻譯與注釋工作以外，尚有若干預備工作，也是「元朝秘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茲將已經著手者，也略述如下：

(一)選譯伯希和先生已發表法文關於元朝秘史的論文（序文與譯文等），以便採用。

伯希和先生遺著十一種（①元朝秘史法文翻譯，②金帳汗國歷史注釋，③唐朝歷史中的西藏（暫譯），④喀爾米克史評論，⑤十四世紀亞拉伯蒙古字典，⑥蒙古箭記（*Nates Uongales*）（暫譯），⑦新疆地理論文三種（暫譯）⑧周達觀真臘（高綿）風土記譯注（這一種已有馮承鈞氏譯成中文），⑨西安府的景教碑，⑩中國印刷術的起源，⑪伊耳汗國（波斯）拉施特哀丁所著蒙古史首卷百三十六頁的法譯。另有聖武新征錄等若干種不在遺著之內。）在台北已找到的「元朝秘史」、「聖武親征錄」等，當酌量選擇，以利採用。

(二)比國Mastaert 神父批評海尼士、伯希和、郭增（*Kozin*）三家對秘史翻譯的專文，擬整篇翻譯，全部採用。（這一部分的翻譯也請丁德風先生擔任，已譯成三萬餘字。）

(三)自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寧經室外集卷三）中列有「元秘史十五卷提要」，於是一般人皆信四庫全書中未收秘史。但是四庫史部政書類有孫承澤「元朝典故編年考」十卷，十二冊，據提要卷八一，則說孫氏編年考中第九卷，即是元朝秘史。究竟是全部元朝秘史呢？抑僅是節錄呢？迄今尚無明白斷言者。從吾本擬赴台中北溝一查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孫氏原書，以明真象。嗣因發覺中央圖書館新出善本書目中，列有精鈔本「孫氏元朝典故編年考」十卷十二冊，乃請求調借往閱。上月中旬，幸已閱及。確定九卷中所收為秘史續二卷，太宗一朝事跡。校對四部叢

刊本元朝秘史，知文字已有潤色過的，太宗朝的元朝秘史四庫史部中也是有的。此外尚有一種預備工作，亦正在進行中，即李文田、沈增植，高寶銓、王樹榮諸家的注文，引用時，均曾加以整理，以期正確。(1)凡諸家引用成書，均一律加注卷數，並儘可能注明所用版本。(2)諸家引用成書，一律查對原文，校勘異同。(3)諸家引文，遇年代均注西元某年，以便比較；遇地名，均注今地。(4)人名、專名難解者，均酌加解釋。」先生工作態度的謹嚴，研究行情的熟悉，求真求實求是的精神，考而後信的治學方法，均可由此報告中窺見之。

十二月，先生再向中國東亞學術計劃委員會提出「漢譯蒙音元朝秘史中若蒙古掌故與俗諺的研究」新研究計劃，請求補助。此計劃是上一研究連緒的。

## 一、題目的性質與說明

由於近來曾與札奇斯欽教授為「漢字蒙音本元朝秘史」作了一次新的翻譯，審知秘史中有不少「蒙古掌故」與「蒙古俗諺」是值得特別提出來研究的。因此打算將這些蒙古掌故與蒙古俗諺從元朝秘史中選錄出來，先闡明蒙古的原意，再參考同時中文原始史料，比較研究，將所得確有意義的結論，寫成短篇論文，作為蒙古史研究的專篇。這是本題目的性質。這裏所說的「蒙古掌故」，是指十三世紀蒙古人已往的事例，已有的故事。所指的俗諺，是指當時蒙古人常用的「格言」或「成語」，而又對當時行事有影響有關係者。這一工作略如王國維先生的「蒙古札記」（觀堂集林卷十六），與比國神父Mostaert的「蒙古（元朝）秘史若干小節目的研究」。（見「哈佛亞洲學報」第一九五〇—一九五二各期）。

## 二、選擇題目的舉例：

就蒙古掌故說：蒙古舊例，諸部首長各有「分地」的習慣。在十三世紀蒙古人初入長城以後，此一習慣對中原郡縣制度，桘鑿不入，曾引起不少的糾紛。「分地」在元朝秘史中謂之「嫩秃黑」，旁譯漢字多數作為「營盤」，有時也作「家道」、一曰「分地」。全書中不下數十見。在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禪傳中，謂之「農土」；傳中曾有較長的敘述。他如國朝名臣事略，元文類等，也有關於分地的記載。今以「分地」為例，擬將一些關於「分地」的掌故，依據蒙古原文，參用上述原始史料，加以分析研究。一方面期能明瞭蒙古原文的本意；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瞭解此一術語轉入漢籍中應用時的引申意義與內容的轉變。由是寫成短篇論文或節記，名曰「農土即嫩秃黑與元初所謂分地」，作為專題研究的一個子目，或一部分。漢譯蒙音本元朝秘史中類似這樣的掌故甚多，如「推選繼任可汗」，如「抓馬」，如「燒飯祭祀」等等，均擬擇要選錄，加以研究。

就蒙音本元朝秘史中蒙古俗諺說，全書十二卷中為數亦多。例一，如說一個人不成材，蒙古諺語有「裹在草裏牛不吃，包在脂中狗不吃。」（秘史卷十一）。成吉思汗說：「真的窩闊台的子孫，都是『裹在草裏牛不吃，包在脂中狗不吃』呀，我的子孫中，豈都不生一個好的！」例二：如桑昆要「請成吉思汗吃許婚酒」，蒙古文原說「請吃不兀勒札兒」；意即「請吃羊頸喉肉」。因為羊頸喉肉，性韌，吃過的人印象深刻，不易忘記。這正如內地定婚用雁，以示夫妻不易分離之意。這一類的諺語，也擬同樣提出，加以研究，以期明瞭這些諺語的真正含義。

### 三、希望獲得的結果

上述兩項（即有關史實的掌故與有關史實的諺語），擬選錄二十條左右，寫成專題論文或簡記。每篇短者兩千字，長者五千字；全部約有五萬字到七萬字。寫成後即定名為「漢譯蒙音本元朝秘史中若干蒙古掌故與蒙古俗諺的研究」。

這一計劃旋獲該會通過。

民國四十八年己亥（一九五九） 六十五歲

先生所主持的漢譯蒙音元朝秘史的初步整理工作，蒙中國東亞學術計劃委員會連續補助，至今已一年半，工作進行非常順利，刻已完成。六月十九日，致書該會，並呈繳成果，函內詳告完成經過情形，甚關重要，茲錄如下：

「從吾自四十七年春季開始，接受貴會協助，由從吾負責主持與政治大學邊政系教授蒙古朋友札奇斯欽先生共同對「漢譯蒙音本元朝秘史」一書，從事初步整理；從新校正蒙古原文，譯成通行國語，並採用近人新研究加以註釋。此一新譯本，擬名曰：「漢譯蒙音本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此項工作，預計四十八年六月底以前可以完成，等項各已陳明在案。今幸上述譯註工作，已經竣事，並清鈔完畢。全書共十二卷，訂成三厚冊，計得二百六十六頁（中國張）。每張以七百二十字計算，共約十九萬五千字左右。另附蒙古文專門名詞索引，將書中人名、地名、專門術語等，分類編為字彙，索引，共為一厚冊，約二百三十餘面（單頁）。全書共計四冊，校對清楚，謹裝入兩紙袋內，送呈貴會查照驗收，以完手續。倘有指示，自可洽商遵照辦理。再者為期貴會對於鄙人等所呈工作，容易明瞭計，謹再略述前項工作結束經過，作為總報告；分為（一）譯述工作完成經過，（二）註釋工作完成經過，及（三）蒙古專門名詞索引排列要點三項，作一簡單說明，以備查考。

一、譯述工作完成的經過：此次從吾與札奇君從新譯註蒙古秘史，原係整理舊有積稿，故比較尚有經驗，標準易定。乃採分工合作辦法，分別工作，互相糾正，期於研求所得結果，彼此符合。

(甲) 第一步由札奇君專負校正蒙文責任。校正後，逐字逐句，直譯為國語，逐卷交從吾審定。校正時特別注重文句的口氣；多數少數的區別；是轉述，亦係直陳？若與舊有譯文衝突，或有不合時，則多翻字典，查對黃金史，蒙古源流（以上均有蒙文原本）等，以明究竟。不能確定時，則存疑待考。所幸完全不能瞭解的地方不多，故尚可以順利結束。至於「有否忽略」或「誤不知以為已知」之處，則須與國內外專治此書的學者，交換工作，誠意批評，方能明白。

(乙) 第二步，再由從吾與另一位蒙古同學，哈勘楚倫（台大外文系同學，今年卒業，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共讀四部叢刊中的「漢譯蒙音本元朝秘史」逐節逐卷與札奇君所譯重作第二次的校正；校正後，再正式寫成通行的國語。有疑難及歧見時，特別標出，再與札奇君共同研究。若仍有疑難，不能確定時，再約請旅台蒙古長者（就國大代表，立法委員，蒙藏委員會老專門委員中訪問邀請）共同研究。幸而此事不常有，故工作尚無困難。然亦有若干次甚覺獲益。如元朝秘史第一節，說到蒙古始祖所定住的不哂罕山，後來被稱為聖山。「不哂罕」蒙古話即是「佛爺」（浮屠）。那末有些人就敷會此山是因佛得名，應與佛教傳入有關。實在成吉思汗生於西元一一五五年（乙亥，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我們是相信成吉思汗活了七十二歲的。）定居在不哂罕山的蒙古始祖，尚早二十餘代，遠在隋唐以前，南北朝時代。我們很難相信那個時候，佛教已通行到幹難河一帶。後由蒙藏委員會一位專門委員說：「不哂罕山」在三合字典中有「樹林密茂，深邃神秘」的意思。「佛爺山」應是後人因名稱巧合的附會。後來我們在秘史卷二，第七十節、第八十節、第一〇二節、第一〇三節，（尤其是一〇三節，）找到不哂罕森林深密，一再救護了帖木真（成吉思汗）生命的證據。這一前輩的解說，自然就比較合理的多了。

總之，譯述部分，我們曾小心的，冷靜的利用我們已知道的工作經驗，從仔細熟讀本文下手，逐字逐句，謹慎譯成通行的國語。第一、沒有刪減或省略。第二、儘可能也沒有增添。舊式蒙古文有時過於簡潔乾枯，但若不得已需要增加字句的時候，概加括弧，以示區別。

二、註釋工作完成的經過：此一部分偏重史事的比證與解說，由從吾負責擔任；但也曾得到札奇兄的密切合作，與隨時協助。查元朝秘史，舊有註釋，已有李文田、高寶銓、文廷式、沈曾植、王樹榮、日人那珂通世諸家，而李文田、那珂通世所註與高寶銓、沈曾植所補，尤稱繁富。惟惜秘史原書，係由蒙古文寫成，而諸公所依據者，除那珂外，僅為漢文總譯本。總譯本又多為意譯；人名、俗語，多被刪削，未能全部譯出。而這些往往正是書中重要的關鍵；以故李、高、沈諸先生用力雖勤，實

在多未搔到癢處。今茲新譯，一切依據蒙音原文，從事註解，等於開荒建室，一切須從頭做起。又此等解說工作，重在詳徵博引，觸類旁通，故非熟於元史、金史，精於元代掌故，以及元初人文集，（耶律楚材父子的文集，及王惲秋澗大全集等）明初人著述（如陶宗儀的輟耕錄，葉子奇的草木子之類）者，不易印證貫澈，多獲佐證。茲舉二例，略事說明。例一，秘史第八十五節說：「雀兒被『龍多兒』趕入叢草，叢草尙能救他性命。人來了，咱們若不救他，反不如叢草！」龍多兒是甚麼？（是鷹？抑是鵠？）大家爭辯不休。海尼士先生誤信蒙古源流，錯譯為「籠子」，自然不合。（原德譯本，頁十七。）那麼我們舉出元史（一二八）土土哈傳：「『逃鷗之雀，叢草猶能生之。』吾願不如草木耶？」互相比證，則知這句話原來是一句蒙古流行的俗語，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例二，第二百六十九節（卷續二，頁十三到十四），成吉思汗死後，左手、右手萬戶諸王長官們擁戴斡歌歹（窩闊台）汗為大汗。擁戴的時候，特別又重複了一句「察阿歹兄長奉戴他的弟弟斡歌歹為可汗。」就蒙古文說，看不出有何特別意義。實際上蒙文秘史，行文簡潔，這句話是有特別用意的。這裏須看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方能明白。耶律楚材傳說：「己丑（一二二九）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察阿歹）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兩相對照，事更明顯。秘史十五卷本第二百六十九節的漢文總譯，沒有提到察阿歹兄長奉戴他的弟弟斡歌歹汗為可汗的話，因此也沒有引起李文田等人的注意。所以元史一四六耶律楚材傳中一大段可以與秘史互相發明的地方，也就被博學的諸前輩輕易的忽略了。

三、蒙文字彙各種索引的說明：譯文與註釋以外，另附「蒙文字彙索引。」（初稿共二百三十五單葉）合訂一冊，計分兩大類。甲、專有名詞索引。分為三大類：（一）人名索引。（二）氏族部族等索引。（三）地名索引。（地名又分為山名，河川名，湖泊名，城市名四類。）以期易於尋找。乙、重要術語及名稱索引，如政治制度類，尊稱類，宮廷筵飲類等十五類。凡秘文中專門名辭，大部分類輯出，標寫蒙文，以著原形，而便研究。蒙古字彙索引排列的方法，詳於文前的「凡例」，茲不贅述。然這也祇是暫時的安排。將來究應如何編排，作者初無成見，尚可從長商議。」

案：自晚清以來，重視邊疆史地研究，專門研究元朝秘史一書的學者已逐漸增多，如李文田、高寶銓、文廷式、沈曾植等人，都曾有譯註，他們用功最勤，然因所用材料僅限於漢文，往往不能觀其會通，了其真義。現今先生的國語新譯註完成，乃是集中外大成的，不僅是李、高、沈諸賢的諍友，也是秘史的



功臣了。

是月，德毅自台大歷史系畢，所寫論文「洪容齋（邁）先生年譜」長達十二萬言，即是在先生指導下完成的。同屆畢業者尚有蕭啓慶，撰「忽必烈潛邸舊侶考」，亦先生指導。

七月，台大歷史研究所招研究生，德毅亦報名應試，八月中旬發榜，以微差而名落孫山，先生獲知此事後，於十六日晚賜書慰問，首云：「研究生考試，弟台未蒙錄取，實爲不幸，且甚感遺憾！然弟台沈靜苦學，宜有成就，一時挫折，非戰之罪也。幸弟善自寬解，以慰師友之望。」又鼓勵說：「弟台勤學，極可嘉許。……非具破釜沈舟之心，難有出人頭地之望。失敗爲成功之母，惟望今後立志猛進，下年度再顯身手耳！張忠棟、周龍皆初次受挫第二次成功者，大器晚成，幸吾弟勿自餒。」德毅讀後深受感動，立刻奉一長信致謝，並述自我檢討所得意見和今後努力方向甚詳。二十三日，先生又賜一函，再致慰勉，老師愛護學生心切意誠，毅至今仍感念不忘。函中云：「函悉，所見極是。切盼就此從自反方面下功夫，繼之以恆，以期有成。連日又想到陶英惠兄，他也是這一次不幸的失敗者。見面時請代爲致意是盼。您們兩位，我的印象都是有治學興趣，並能自動工作的人，前途希望甚大。（我所說的自動工作，即是說遇到題目有辦法，能自動設法尋找材料，並有判斷能力，將所找材料，自動的組成一種有研究性的論文。）因此切盼兩位萬勿自餒鬆懈，以誤前途。」師道之大，由此可見。

先生彙集三十年來所發表的有關匈奴史及遼金元史研究論著共二十篇，命名爲東北史論叢，交正中書局出版，以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一文代序，於是年九月問世。先生特在代序後附記中說明編輯的經過。云：「上邊的論文，原是一篇講演舊稿，曾於民國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台北市聯合國同志會第一七二次座談會中宣讀，後又在大陸雜誌第十五卷第六期發表。文中所說，祇是近年來研究我國邊疆史的一些見解罷了。……民國四十六年多，欠債漸多，生活日艱，友人吳相湘先生、包遵彭先生建議編印鄙人歷年所作專題論文，擬名『東北史論叢』，分爲上下兩冊，由正中書局出版，可以得稿費若干，以資維持。因爲這些論文發表於北大國學季刊，台大文史哲學報，都是沒有報酬的。另有若干篇印入時下期刊或叢書者，也由包吳兩先生代徵同意，加以彙集，並提議用這篇講演稿作爲代序。因念既可濟一時的急需，又可不另作序文，遂一併允諾。」論叢中各文部分略作改訂，然大體悉仍舊貫。

十月二十四日，友人李濟赴美開會，先生致書陳述近年研究情形及未來願望和計劃，原信如下：

弟性庸魯，然喜讀歷史已四十餘年，對於我國東北與北方兩區域中的歷史與地理，

如遼宋金元四朝史，及其他漢唐四週邊疆的歷史（日人稱之爲支那週邊史），曾作若干專題研究，編有若干部分的講義。同時，對於這些區域內的旅行記，調查報告，專題記事等，所謂直接史料等，也部份的有所收集與有所註解。近年來因 先生之鼓勵，重新譯註東北區域內十三世紀的蒙古秘史，並能及時完成，甚感興奮。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嘗不自量。仍希望今後數年，能將這一安定的機會，延續下去；使弟得以繼續工作。謹依所知，續提陳愚見，甚盼 先生賜予考慮，並繼續予以支持！

弟擬繼秘史譯註之後，再完成一種元初（十三世紀）「蒙古史料六種」的校註工作。（合之王國維先生的蒙古史料四種，可得十種，作爲一集。內容均以同時人記述，親見新聞，記遊，記行等爲主，均爲直接史料，價值甚高。若以十種爲一集，以弟所知，遼金元三朝，可得四集至五集。）四十九年度擬作兩種或三種：一、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註，〔節本有註，足本尚無註者。〕二、張德輝塞北紀行校註，三、王惲中堂記事校註。三種中，一年中至少作兩種。每年寫八萬字到十萬字，使之成爲一種專刊研究。擬即用此一計劃，向東亞學術研究會請求補助。貴會若能每年允予簽約，給予三百元或五百元美金，如是弟即可安心工作。三年或五年後，當可完成一集或二集，對於十三世紀蒙古所建大元帝國的研究，當有極大的裨益。同時弟亦可利用餘暇，完成久已著手的「遼宋金元史」，（共有四十八講，約六十餘萬字。均有講義，大部分已油印出來。）和其他專題研究的講稿。

我是主張「以勤補拙，以儉延年」八字律己的，行之多年，頗有實效。今後仍願繼續維持下去，在 適之先生與 先生領導之下，安心工作八年或十年，以期對於我國一片荒地的本國朝代史，與歷代邊疆史，有所貢獻。個人生活，能如近一、兩年的小康（買菜有錢，出外有衣穿即可。）私欲已足，此外，別無他求。祇有禱告上帝，使得道者多助，對內把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發揚光大，將現代漢學研究中心，奠定在我國的研究院和大學裏。對外多培養幾位李政道、楊振寧，多得幾次諾貝爾獎金。政治、民生雖一時尚不如理想，那末國家與民族的再生與復興，或可確有若干把握了。

此外有些瑣事，也順便提及以慰 注念。一、秘史譯注稿擬先在台大文史哲學報分三期發表。因爲捷克研究所Paul Poucha的書，（原名大意：「蒙古秘史是歷史史原也是文學的作品。」全書爲德文。）已經由史語所買到了；他所提示的若干問題，有些頗與我們看法符合。（如認「失吉忽失忽爲秘史作者或有關係之類。」）有些即可依據補訂，用不著再等了。（柯立夫先生的英文譯文也不等了，拙作印出後，當先寄一份，敬求柯先生不吝指教！並請便中代致問候！）二、札奇的蒙古文已上課，選課的三人，旁聽的四五人。他很想於四十九年度，我們合作的計劃完成後，將蒙文黃金史一書譯成漢

文，希望也能得到東亞學術研究會或多或少的補助。（他已與剛伯先生略略說過，當再與札奇兄一談此事。）三、關於收集材料及購求新書，（有關蒙古及東方歷史者）此刻不能多寫了，只有等待將來先生住定後，再通信麻煩先生了。四、最後還有一個請求，即希望能在弟之研究室內，得到一部哈佛出版的亞洲學報，交換、購買都可以，不識連生先生能代為設法否？」足見先生對學術的熱心，對國家的關愛，字裏行間，所充滿的，無非是愛歷史愛文化愛國家的熱情而已！

十二月，先生與門人札奇斯欽合作所撰成漢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現又增訂完成，凡二十餘萬言，這一譯註工作始於民國四十一年，以張元濟主編的四部叢刊三編本元朝秘史為底本，先將全書照漢字蒙音寫出蒙文，再自蒙文直譯為漢文，又自直譯寫成意譯，加以潤色，最後詳加註釋，為一現代中國語蒙古秘史通行本，先生自云：「今茲新譯，一切依據蒙音原文，從事註解。」是一項拓荒的工作。自四十七年起本工作曾連續獲得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的資助，先生本擬撰「元朝秘史重新譯註工作的凡例」，略述工作的經過及個人今後對此一工作的若干意見，但因有些問題，一時尚未獲得滿意的解決故迄未撰成。本專書在台大文史哲學報分三期發表（九至十一期）。此書有四優點：（一）全書二八二節逐句翻譯，沒有刪節。（二）應當註解的地方，均酌加註解。（三）文中沒有「麼道」「有來」，使大家都能够閱讀。（四）不知道的地方缺疑待考，決不強不知以為知。足見先生切實負責的治學態度，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是始終一貫的。

民國四十九年庚子（一九六〇） 六十六歲

元月，先生與札奇斯欽合作完成的「漢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前四卷在台大文史哲學報第九期刊出，先生極歡迎同好批評指教。據先生自己檢討，尚有三點美中不足的地方：（一）用散文譯敘事詩未必盡妥，（二）人名地名等未盡與華夷譯語和蒙古源流等比照研究，（三）註釋未盡引用漢文以外的材料。凡此均是應繼續努力的。先生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是一絲不馬虎的。在該原著刊出的同時，先生本擬撰一「元朝秘史從新譯註工作的凡例」刊在前面，略述工作的經過及個人今後對此一工作的若干意見，但因有些問題，一時尚未獲得滿意的解決，所以沒有寫出來。

五月十九日，中國東亞學術計劃委員會舉行月會，由先生作研究工作報告，報告題目是「元朝秘史中若干掌故和中原傳說的比較與初步解釋」，舉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禱神代死」，與「鷹鷂逐雀，叢草救雀」三則故事，說明蒙古掌故與中原傳說極為類似，只是表達的方式彼此出入甚大。他們間究竟有沒有關係，是值得研究的。據先生推測：（一）故事核心應是同出一源，農業社會與草原社會情景相同，所見所感也相同，久之歸納出一種相同的古諺，自屬可能。（二）表現的方法則因時因地因人而各不相同。

上年度先生與門人札奇斯欽合作，向東亞學術計劃委員會，以「漢字蒙音本元朝祕史中若干蒙古掌故與俗諺的研究」一專題，申請研究補助，獲得通過。六月三十日，期限已滿，乃是繳研究成果，並撰一總報告送會。報告中述說研究過程與工作甘苦。茲錄於下：「四十八年度（四十八年七月起，四十九年六月止）從吾與札奇斯欽君繼續獲得貴會補助，從事研究漢字蒙音本元朝祕史中一部分蒙古俗諺與蒙古有關歷史性的掌故。主旨欲將全書中，這些俗諺與掌故分別選出，詳加分析，寫成五萬字到七萬字一冊有關蒙古掌故的若干篇專題研究，作為對於蒙文元朝祕史一書進一步的瞭解。此等掌故與俗諺的專題研究，即定名曰「漢字蒙音本元朝祕史若干掌故與俗諺的研究」。

一年以來，工作進度，每三月領取補助費時，均有簡短報告。今期限已滿，全部工作，如期結束。研究總題，擬仍用舊名，曰：「漢字蒙音本元朝祕史中若干蒙古掌故與俗諺的研究」。今將已寫畢清鈔，並認為可以作為研究成績者若干篇，作為目錄，列舉如下：

甲 關於元朝祕史中蒙古掌故者：

- 一、元朝祕史所記「忽刺安，迭格列」人（紅襖軍）助金守潼關並抗禦蒙古入侵事跡考（十三張，約一萬字。）
- 二、說元朝祕史中的推選可汗與選立「太子」（二十五張，約一萬八千字。）
- 三、成吉思汗與珊蠻（巫）教（十二張，約九千字。）
- 四、說元朝祕史中的篋兒干（十二張，約九千字。）
- 五、元朝祕史中的抓馬解（三張，約二千字。）
- 六、從阿蘭娘的折箭訓子說到訶額侖太后的訓誡成吉思汗（八張，約六千字。）
- 七、元朝祕史中若干掌故和中原傳說的比較與初步解釋（約三千字。）

乙、關於蒙古俗諺者：

- 八、十二卷本元朝祕史中若干俗諺的初步解釋（二十一張，約一萬六千字。）

（內容分為兩大部。甲祕史中蒙古俗諺尚可全部解釋者。共得十條。乙、祕史中蒙古俗諺雖可作解說，而尚有待發之覆者，共得四條。）

合計以上八篇，約有六萬五千字到七萬二千字。與第一次呈送計劃書時，所預期的結果，大致尚算符合。

此外尚有若干專題，或已寫成，而因材料不足，一時尚不能結束；或因已有人寫作，而一時未發現新材料者，也祇有暫時擱置；或因研究方便計，而臨時加以歸併。凡此若干變更，確因事實求是，工作後所得理應如此的結果。謹亦略作說明，以供參考。(1)「別乞試解。」第一次工作報告時，曾撰作專題。嗣經統計研究的結果，別乞一辭，可得三種解說：(一)珊蠻（巫）教的尊稱。(二)人名的一部分。(三)皇女之尊稱，但何以有此三

種稱謂呢？又皇女何以得此稱呼？均一時尚不能作圓滿的解說，茲擬暫緩結束。(2)「說元朝祕史中的「奧魯」與「諸軍奧魯」。第二期報告中，選為專題題目，嗣發現日本西京大學教授岩忍氏已有專題發表，當請人譯出。比較後，再定去取。(若拙作無新材料、新見解者，擬即放棄。)(3)「釋蒙古祕史中的達魯花赤及其在漢文中的引伸義。」因牽涉漢文材料太多，太零散，一時尚不能即作結束。凡此之類，咸基於實際的需要。事非得已，但非總題目的變更。幸賜諒鑒！

再者札奇斯欽君與從吾共同努力於祕史中蒙古俗諺與掌故問題的研究。關於蒙古文方面史料的選擇，蒙文黃金史的選譯，札奇先生用力至勤。上兩次工作報告中，也屢有陳述。此一輔助工作，目下亦告一段落。今由札奇斯欽先生綜結一年來的研究，寫成長編，題目：蒙古黃金史(Altan Tobci)與蒙古祕史之關係及其異同。(共一〇四頁，約七萬字。)一併呈覽，作為研究成績的附錄。書中內容一部分已採用於上所列舉的專題研究。一大部分尚擬增入蒙古祕史新譯本中，作為祕史的補助與解說。」

案：從四十六年以後，先生專力於元朝祕史的研究工作，就功力言，可以說以超過前賢，就心得言，上所列八篇論文，可以說每篇都有新的創獲。

八月，台大推薦先生為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研究講座教授。先生自記其申請的經過說：「四十九年八月十一日下午錢校長思亮來寓訪問，適余外出，由宜珍接待。據云：欲余担任台大國立研究講座教授，由彼推薦。當留下申請表兩份，囑填妥後，於明後日送交校長室，由彼親收。余初意：胡先生在台所創導的一切學術福利事業，祇願以助教身份，樂觀厥成；不欲個人圖佔絲毫利益。因此研究補助，講座教授等，均不擬請求，也不擬接受。思亮校長的好意，也想觀望不就。表雖填，未即送去。十二日下午在孔孟學會聯席會中晤楊亮功同學，告以此事，彼頗勸余接受，將來再讓出，宜珍亦以為然。乃於當晚草函兩通：一、申明曾與東亞學術研究委員會簽約，接受繼續補助。若講座教授通過後，幸即通知，以便將已接受未用之款。如數歸還。二、說明本意：若獲通過，一年後，當退讓，願自食其力，在東亞學術會每年得些補助費，私願已足。惟此事是私人的志趣，不足為外人道也。申請表、著作三冊及兩信，均於十三日上午九時後，親送校長室，由那祕書代收。(十四日晨記。)」先生澹泊明志，於此亦可窺見。

十月二十四日，接台大通知，已獲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通過聘為國立研究講座教授，每月補助研究費新台幣叁千元，但先生已先與東亞學術會簽約，並領有該會的補助，先生恐有「國難期間一人兩薪」之嫌，因向東亞會請求解除契約並退款，該會以難以向哈佛燕京學社交待，不同意變更用途，可補助其他輔助研究工作人員。十一月十六日因致函校長錢思亮說明此情形信云：「弟承蒙本校推薦，獲得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



聘為國立研究講座教授，至感欣幸。當即應聘，並同意履行聘約上規定的各種義務。查聘約所附『致送研究費原則』，第五款有云：『在聘約有效期間，不得接受其他生活補助性質之研究費。…但若所接受者，不用為應聘者個人生活補助時，本會不加限制。』第四十九年度（四十九年七月至五十年六月）曾與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簽定契約，每三月領受該會補助美金一百五十元，合計新台幣五九七六元。由弟與札奇斯欽分用。（弟用一半，札奇斯欽用百分之三十。）此事，在弟第一次覆函先生時，曾有聲明。嗣後決定應聘研究講座，即去函與該會洽商退款辦法。往返數次，至十月二十二日，方獲具體決定。要點如下：1.原計劃照舊維持。（因研究講座的工作，也即是弟在該會提出的工作，兩者並不衝突。）2.但若助理人員或經費分配有變更時，應報該會備查。意即：弟若將所領研究費分給他人，從事研究工作，而不用於個人時，該會可予同意，並願代為證明云云。弟當向該會陳報，自八月份起，已領款項由弟分給札奇斯欽教授百分之五十，（每月一千元）從事翻譯「蒙古黃金史」為漢文，分給助理員蕭啓慶等二人百分之三十（每人每月三百元，蕭為隨弟工作，較有成績之研究生。試作「舊元史蒙漢文引得」。餘作研究室鈔字等公用。（弟個人僅經手而已，不取分文。）頃已商洽妥當，第二次研究費已於昨日發下。似此尚與前述 先生轉來長期發展科學會『致送研究費原則』第五款不相牴牾。諒可不受該會的限制。惟國難期間，集款不易，立法處世，宜求公允。茲為劃清手續，明白責任起見，謹將弟與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濟之先生交涉經過，專函呈報，敬希 先生同意，存案備查。（弟與該會往來函件，與分款收據，均另冊貼存，必要時可以送查。）先生若有指示，亦可考慮補救。總期心安理得，公私均便，使適之先生與月涵先生為國家所創良法美意，能順利推行也。」足見先生於金錢方面確實一絲不苟。台大旋專函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除引述前函要點外，末謂：「本校除同意姚教授與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所商定之辦法外，轉請查照備查。」

案：台大致科學會函是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為敘述方便計，並繫在這裏。

十一月十七日，先生受聘為國家長期發展科學研究講座教授，得聘用助理研究人員一至二人，該會所定聘用標準已由台大轉下，先生即致書台大校長錢思亮云：「弟任教台大已逾十年，而所治遼宋金元史內容繁雜，亦正需要生徒助理與完成，獲此機緣，至深感謝。乃就近五年來隨弟工作已有成績之研究生及最近兩年在弟處作畢業論文而受訓已滿或將滿，確有可資深造能力者十餘人中，選拔二人，作為專任助理研究員。」於是選拔門生陶晉生及李敖二人，陶於四十八畢業於台大歷史研究所，李亦於同年畢業於台大歷史系。先生於十二月十日又致書錢，說明選拔他二人的原因，原文如下：

「弟性喜通史，然我國通史時代過長，研究步驟，勢不得不先期有所側重，再做到逐步有所會通。留學德國時期（一九二二—一九四三），因蒙古史中成吉思汗，拔都汗的西征，與馬可波羅的東來，均具有若干世界性，也是世界上的大事。因此德國若干大學對蒙古史亦深感興趣，且有專人從事研究。故考慮之後，即選定研究中國通史中的「遼宋金元史」（九〇七—一二三四）。光從這一時代的蒙古西征與若干中西交通史上的問題，歷史地理部份，弟曾從A. H. Herrmann工作兩年，其他方面，在離德以前，均在繼續。著手從師工作。觀入審已，多方努力，期能獲得留學德國的實際工作知識，弟幸尚知反省力學，二十餘年來。亦數有文章發表。此後興趣日深，又得適之先生與陳寅恪，傅孟真，毛子水諸先生為師友，質雖庸碌，尚能初有樹立。這是弟一生中深感榮幸的，因此三十年來未曾稍變初衷。

迴憶在北大主持歷史學系時，即又分「遼宋金元史」為四小部分：(1)「遼（契丹）與北宋」（九〇七—一一二六），(2)金（女真）與南宋（一一一四—一二三四）。(3)蒙古初期，（一曰四大汗時代，即蒙古與西域諸國）。（一二〇六—一二五九）。(4)蒙古與東南亞。每一段落，常選一人至三人從事工作。故自弟歸國至抗戰（昆明）時期，即完全依照上述辦法分配。如傅樂煥，鄧廣銘，楊志玖，方齡貴等先後不下十餘人，均曾在此一階段，共同講習，担任工作。逃難來台，一時百念俱灰。孟真先生死後，益感人生無常；弟亦只求獨善其身，日抱元朝秘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了此殘生而已。幸而韓戰發生，美援繼至，台灣安定，反愈於在大陸時期。因又將二十年來在國史中所辛勤墾植的若干部門，（如匈奴史，如中西交通史之若干專題），（中有造紙術流傳歐洲考等，）如若干區域的邊疆史（東北史等），史學方法論（此一部門，用適之先生的全部新考證工作，去印證與充實德國人自L. Roysen以來的理論，並互證兩國大師們的豐富、優美作品，使此一課程更有內容，更有意義。）等等，舊事重提，繼續工作。然亦止於好好教書，同時利用閱讀心得，就能力所及者，作兩三篇不苟且的學術論文，對北大師友，對留德一段辛勤學習，有點交代，於願已足。至於工作計劃云云，可以說是始終沒有嚴格考慮過的。

近年來，濟之先生不甘受台灣為文化沙漠之譏評，而有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之組織，對有志研究國史者多方輔助。迨後適之先生返國，充實中央研究院，並有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的推行。從吾以庸魯之才，幸蒙先生與適之先生，濟之先生提携鼓勵，因是忘其愚鈍，乃又有重整舊業的打算；同時不揣冒昧，欲謹慎從事，期於有成。數年以來，弟與札奇斯欽（蒙古有希望的少壯學者）、歐陽無畏（西藏語文少壯學者）、廣祿（滿文專家）諸友，暇日過從講習。對於從學諸子，如文崇一、勞延煊、陶晉生、王民信、蕭啓

慶，李敖，張國興，張狃諸人，均盡我職責，隨機指導，隨時鼓勵他們，多學習語文工具，多讀基本書，辨別史料與研究的異同，多注意各部門研究的行情；細心選擇題目，寫作論文，期能有成。並擬從今年起，將弟在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所得全部補助費，（一年美金六百元）徵得濟之先生等同意，分給札奇斯欽與蕭啓慶、王民信，使合作研究『舊元史中蒙漢專門名辭，』或編寫局部的引得，或作成簡明辭彙，期對舊元史逐漸整理，冀奠立元史研究（十三世紀蒙古史）（四大汗時代與忽必烈時代）的基礎。若能再得陶，李二人分治『遼與北宋』，『金與南宋』則前次在北大時服務的志願，即可逐漸繼續。弟一生從勤苦中來，無他嗜好，自當愛惜暮年，在適之先生濟之先生輔導維護之下，為學術工作，繼續努力。

弟頗贊成七十退休辦法，自問退休後仍可工作。弟私念，在台大遼金元史一段，最好的繼續辦法，是商請勞延煊君研究告一段落後回國。他的在美遺缺，可由我方另選一專業青年接替，期能發揮中西好的文化傳統，方是一個中美合作的好辦法。不識先生與適之先生遵意以為如何？

總之，此次所選聘的陶晉生、李敖二人，倘能獲得先生同意及長期發展科學會的核准，弟雖屆退休之年，工作能力仍在，自信尚可從旁與若干青年學子，再工作十年或八年，完成若干著作。不但有以慰北大師友與適之先生，且冀有以對孟眞先生與先生苦心經營之台灣大學也。」由於先生的力薦，陶李二人皆獲通過。

十一月，出任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第四屆聘任評議員，史語所大事年表云：「本院院士依法選舉本院第四屆聘任評議員三十人，呈奉 總統聘任。其中李濟，勞榦，全漢昇，董作賓為本所專任研究員；胡適，姚從吾為本所通信研究員。」（史語所四十周年紀念特刊）

十二月二十七日，先生向中國東亞學術計劃委員會提出新年度的專題研究計劃申請補助。並聲自己不支取分文，全部補助金合理分配給參與工作人員。題目是「舊元史中蒙古名辭的探源與初步解說」，茲錄計劃書如下：

「一、計劃的旨趣與說明：（一）研究計劃提出人姚從吾擬欲利用以下的方便，從事嚐試『舊元史中蒙古名辭的探源與初步解說』。這些方便，個人認為在目前的臺灣，也是不容易得到的。（1）是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歷史系遼宋金元史研究室與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關於這一方面的圖書設備；（2）提出人多年來研究十三世紀初期蒙古史（一二〇六年成吉思汗建號，到一二六〇年元朝的建立）與元朝史（忽必烈統治中國以後至元亡）的若干經驗；（3）多年共同工作的北大同學，蒙古青年學人札奇斯欽合作的方便，與（4）年來由貴會提倡研究東亞學術，得以有機會選拔的二三研究生與助理工作人

員的熱心協助。有了這些方便，纔逐漸引起申請人研究這類偏僻題目與偏僻工作的勇氣。即是打算將二十四史內舊元史（爲別於新元史起見，通稱爲舊元史。）貳百壹拾卷中蒙古名辭，（包括人名、地名、制度名，俗語，術語等等，）逐卷錄出，加以共同討論，共同研究；並嘗試著作一些探源的工作，將漢文蒙古名辭，努力復原，逐一試寫成爲現行的蒙古史，和藉以瞭解他們的意義，並用通行漢文加以簡明的解說。(一)希望能利用近年來在這一方面工作所得的若干成果，助成上述計劃的可以如期（大部份的，或整個的）完成這些成果，如(1)十二卷二百八十二章蒙古秘史的從新漢譯與復原，即寫成現行的蒙古文（已發表的祇是國語通俗本和和一些簡明的註釋。）(2)如現存蒙古文黃金史（哈佛曾將此書列爲「蒙古叢書」的一種）的漢譯與(3)四十八年度舊元史引得的著手編纂等。這些也都是曾受到貴會直接或間接的補助(二)至於舊元史中，蒙古文以外的「外國名辭」數量也相當可觀。但希望經過這一次的清理後，先確定他們都是些什麼文字（如匈牙利文，畏兀兒文，西藏文等）。俟工作完成後，再作另一步的決定。(三)清朝乾隆時曾有『欽定元史國語解』（二十四卷）之作。當虛心的加以利用，並公正的能確定這一部書的客觀價值。

二、計劃內容及進行的步驟：(一)計劃的內容（附舉例）——元史二百一十卷中的蒙古名辭，依內容加以分析，約包括下列幾項。茲舉例說明如下：(1)人名：如成吉思汗，者別等。(2)地名：如克魯倫河，沱海山等。(3)制度名：如「農土」，意即分地，「怯薛」，意即護衛等。(4)事物名：如斡爾朶（宮帳），質孫衣（一色衣）等。(5)成語：如「也可、兀蘭」，（意即很巧）；「吾圖、撒合里。」（意即大鬍子）等。(6)其他。(二)工作進行的步驟——茲依年來工作的經驗，本計劃工作進行的步驟，約如下述。(1)舊元史共二百一十卷，大致可分爲兩部：(A)第一百四十五卷以前，包括紀，志，表、傳，尤其列傳部分，百分之九十以上爲蒙古人或色目人。爲本計劃工作重心的所在。(B)第一百四十六卷以下，到二百一十卷，百分之八十皆爲漢人。就中雜用蒙古人名字的，或列傳中引用蒙古俗語等的，約有百分之二三，數量並不很多。故第一期工作步驟，是先將全書中的蒙古名辭逐卷輯出，作爲後來探源工作與解說工作的預備。（此一工作，因四十八年度曾有舊元史引得工作的挹注，或可早日完成。）(2)第二步，希望能於第二期（即五十年十月以後）起，依舊史卷數次第，先將每一卷中的蒙古名辭，試作復原，寫成現在的蒙古文；並寫成拉丁拼音字；再進一步，用漢文試作解說，寫成簡明的「專門辭彙」。希望能在民國五十一年六月，將舊元史的前一百四十五卷，全部作完。其餘，將督責助理人員，盡力作去，能將初稿作完，固佳。不能，屆時當陳述原委，再共商補救辦法。總期，所完成的工作，不一定是最好的，因爲缺乏討論與比較；但希望是有最佳



學術性的，並藉此使青年英俊之士，得到研究國史工作的若干初步訓練。」這一計劃是與元朝秘史的新譯注有直接關係的，舊元史中蒙古名辭的探源工作，不僅偏僻，而且難做，惟有從秘史中尋求之一途徑，先生既完成秘史的譯注，此工作乃可以下手。

民國五十年辛丑（一九六一） 六十七歲

四月二十二日，中國歷史學會第二屆會員大會在台北市徐州路台大法學院禮堂舉行，改選理監事，先生以最高票當選為理事，並被舉為理事長。此次改選，主要是第一屆亞洲歷史學會在菲律賓舉行時，我國代表張貴永已邀請第二屆會議在台北舉行，因共舉張為總幹事，進行籌備。（方豪前揭文）

夏，先生與門人札奇斯欽和王民信合作，以專題研究「舊元史中蒙古名詞的探源與初步解說」，向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申請研究補助費，獲得通過。分三部進行：一、舊元史蒙古人名的探源與解說。二、蒙古專門名詞的探源與解說。三、說舊元史的達魯花赤。均由先生總其成。

七月二十五日，先生担任研究講座教授一年已滿，特將研究成果呈報學校轉科學會，並致函校長錢思亮云：「……報告書及附件共分四部，（一）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註內容及附件兩篇，原稿已鈔妥，依另約於六月末送東亞學術會登記驗看，不久即可發還。（二）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註，引言及內容目錄。（三）所聘助理研究員二人工作情形。（四）致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及所領補助費實在支用情形。因從吾四十九年七月末應聘研究教授以前，曾接受東亞學術會美金六百元的補助，當時曾向有關方面聲明，本人除研究教授薪金外，不再受任何補助。而研究室已得補助，得允許後，可移作補助他人之用，依例應將經過情形，附帶呈報。以備查考。」由這件小事來看，先生對學問對事情都是很嚴謹的。

夏，香港新亞書院在國內登報招收研究生，毅當時任職中央圖書館為額外幹事，見報很想申請試試，乃向先生請示，並請求寫推薦信。先生非常鼓勵，並於八月二十七日欣然為寫一情辭肯切的推薦信給錢穆院長，事雖未成，然先生愛護學生的熱忱，至今仍使毅感念不忘。原信云：

台大歷史系四十八年卒業生王德毅，江蘇豐縣人，年二十七歲。肄業期間，曾參加弟之專題研究班前後歷三學期，共同研究「成吉思汗與全真教」，「忽必烈與金蓮川幕府人物」，「余玠保蜀抗蒙考實」諸問題，表現甚佳。四十八年卒業後入營服役，又與小兒大湘同戍金門，因此患難相通，知之甚深。王君實英毅勤學，博覽能文，卒業論文由弟指導，題目為「洪容齋先生年譜」，長達十餘萬言。今已將節略本在幼獅學報發表。王君慕先生與新亞國際聲名，今欲申請為貴院研究生，



「洪容齋年譜」即將呈閱，度當不以弟言爲阿好也。鄙意若王君論文可取，應請給一較佳名義，以示鼓勵。少年嗜學，實爲難得，甚幸先生與潤孫先生有以玉成之！辭旨懇切，非一般八行書所可比擬。

九月，先生囑德毅在台中霧峯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庫幫忙編錄元代三十家文集篇名目錄，以利上項專題研究之進行。時先生正以餘暇研究南宋末葉抗蒙軍事家余玠生年及貢獻，搜集材料甚夥，毅曾於工作之暇，翻閱晚宋文集，偶然發現余玠材料數條，爲先生所未及者。即以鈔呈，先生得之喜甚。

十月八日，前向東亞學術會申請的專題研究計劃已進行一季，特撰成工作進步報告一篇送會，謂「舊元史中蒙古名辭的探源與初步解釋工作進行，共分兩部分，一是屬於技術性的，即機械的編制舊元史列傳，本紀、志、表中的蒙文名詞引得；一是屬於研究性的，即細心比較已編好舊元史中的蒙文名辭，與現行蒙文共同研究，在可能範圍內把它們逐一復原，並加以合理的解釋。就本計劃的性質說，自以第二部分爲主；但是就進行的步驟說，我們第一期的工作，却是偏重前者的。」

十一月，完成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注，內中考證史事，多從王國維、陳垣，張相文諸家之說，解釋地理則多從俄人巴提侯耳得（W. Barthold）在同教百科全書中的專題論述。餘如張星烺、馮承鈞熟於中西交通掌故，卓見精論，亦復酌加採用。此時先生方計劃廣續王國維蒙古史料四種校注前業，輯爲蒙古史料第二集或第三集，每集亦四種，依次刊行。續集所選者，西遊錄爲其中之一種。另三種爲新譯蒙古秘史，蒙文黃金史譯註及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注。

民國五十一年壬寅（一九六二） 六十八歲

德毅半年來編鈔元人文集目錄，發現文集中傳狀墓銘甚多，多爲柯劭忞新元史列傳所據，乃於元月十一日奉書先生，謂「如將有元一代諸家文集所收碑傳誌狀彙集起來，做錢儀吉碑傳集成規，輯成『元碑傳集』一百卷，相信將裨益元史的研究。」三天後即接獲先生手示，云：「所擬書名元碑傳集甚佳，百卷云云似乎過多，可以作作看，有多少算多少，不必預定。吾弟既有此意，請自爲之。似不應計日見功，應先作一日錄，隨時留意，積久自可有成。」又云：「聞已向東亞學術會請求補助，甚善，此間沈院長，李所長對昌先生印象至佳，由彼指導，當無問題。吾弟苦學，又篤於友愛，若能多得些補助，亦可從容一些。……來稿兩篇均佳，而陳旅集尤好，因尚未涉獵過，頗覺新鮮。石田集上海已有影印本。刻擬將來稿集在一起，名『元集提要』，足二十家即裝訂成冊，以便查對。」先生對學生之關懷與鼓勵，字裏行間盡藏真誠。

元月二十九日，匯款給學生李敖，接濟其春節急需。並致書叮嚀善用才智，不要亂

罵人。信云：「兄應善用才智，切勿沾染罵人惡習，尤忌常作辨難文章，像近日一二野鷄學人，下流亂罵，連村婦都不如，應引以爲戒也。錢賓四先生專心辦學，應加尊重，各行其是，不應亂罵，蓋過於放肆，恐於工作有礙，尚祈三思！」

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選舉新院士，先生以院士身分出席盛會，會後院長胡適以連日身心過勞，致心臟病復發，溘然長逝。先生睹狀，萬分沉痛。次日治喪會成立，先生亦爲委員。三月二日，各界公祭胡適，先生輓聯有云：「數萬里聲名遠播，靖獻宗邦，碩畫良圖成往事；四十年教誨親承，勤劬學問，考經論史泣遺文。」（紀念胡適之先生專集）。

初，先生囑德毅有便去東海大學拜訪該校中文系教授孫克寬請益，乃於四月中旬前往，並將暢談經過情形報告給先生。先生得信大喜，並來信勉勵。大略云：「函悉，能與孫今生先生暢談爲慰，那末您留在台北的小李年譜，即可暫存研究室了。近日大致翻看，有獨到處，但我總以爲年譜前應補一小傳，並說明小李雖宋史無傳，何以尚有作年譜的必要，不然，爲無名人氏作年譜，不是太突兀些嗎？……您留意收集南宋『井研四李』、『眉山三李』生平材料，極合我素心，敬祝您早日成功！若能再益以臨江三徐，則南宋史學淵源，將更瞭若指掌，即可卓然名家了。但是如何方能達到完美的理想呢？愚意仍以再考台大研究所爲上策。愚雖無似，但除研究所應得之津貼外，不足之數，當設法補足之，每月可得千元之數。這是我們志同道合最保守的打算。我這研究室裏，也極需要好學博覽如吾弟，長期相助者，共期有成。」

案：德毅後來陸續完成李燾父子年譜，李心傳年譜，徐夢莘年譜，乃深受先生的鼓勵。

秋後，德毅離開服務一年半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回到母校擔任助教職務，先生即囑擔任兼任的研究助理，於公事之餘，助先生鈔錄元人文集目錄。

是歲五月和九月，先生連續發表「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註」和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註」二專著，擬彙編爲蒙古史料第二集，以供有志研究十三世紀蒙古歷史者分別採用。據先生在嶺北紀行校註引言裏說：「卅五年以前，義寧陳寅恪先生，海寧王國維先生同時主講國史於北平清華大學研究院，兩先生頗留心西北邊疆民族的歷史和中國與四周外族歷史語文的關係。王先生曾校註聖武親征錄，長春真人西遊記，趙珙蒙鞑備錄，與彭大雅徐霆的黑鞑事略，合印爲蒙古史料四種。流傳既廣，解說亦詳，學者便之。今從吾不揣冒昧，欲廣續前業，乃與二三同好友人，重譯蒙古秘史爲通俗國語，譯注蒙文黃金史爲漢文，校註耶律楚材足本西遊錄與張德輝嶺北紀行四書，爲蒙古史料第二集，期有助於十三世紀蒙古初入中原時期歷史的研究。」

案：先生與札奇斯欽校註和譯註的四種史料，雖皆分別發表，但並沒有彙印在一起定名為「蒙古史料第二集」，實為遺憾。

十月六日至九日，第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在台北市台灣省立博物館舉行，由中國歷史學會總幹事張貴永擔任大會主席，先生被推舉為出版委員會負責人，並任學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時與會外國學者討論亞洲城市的特色等問題，先生乃將舊文說阿保機時代之漢城在大會中宣讀。事後，第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論文集編印時，乃增訂刊入之。先生於文末附記云：「此文初印於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五卷第一號，五年前又收入東北史論叢上册，當時因倉猝彙集，未暇校正，一九六二年十月，台北召開第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與會鄰國學人曾提出論題多篇，討論亞洲城市的特色等問題，中國歷史學會論文小組即建議：由從吾再審閱此文，酌加補充，在會議中宣議要點，以備一格，因即校正補充，重印於此。」（第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論文集頁一一二）。

是月，台大文史哲學報第十一期出版，先生與札奇斯欽合譯的蒙古秘史新注本第三冊，從第九卷到續集第二卷，最後四卷也跟著印完，自四十七年以來，五年間，雖非屏去一切，專心譯蒙古秘史，但大部分的精力，除在台大授課外，確實都耗費在這一工作上面。一旦工作告一段落之後，使先生有了統觀全文與檢討全部工作的得失和獲得比較與反省的機會，頗有輕鬆快慰之感。（引自先生撰由四部叢刊本元朝秘史「抓馬」「從馬」的譯文略談對於蒙古秘史翻譯的心得與困難一文，台大文史哲學報十二期）。

民國五十二年癸卯（一九六三） 六十九歲

春，中央研究院院士旅美語言學家李方桂回國，寓台北市近郊南港中研新村，先生曾將新譯蒙古秘史抽印本三冊相贈，李對譯本中蒙古習俗的解說如抓馬從馬頗感興趣，因建議分類搜求蒙古傳統的習俗，先生認為可行，乃先撰「由四部叢刊本元朝秘史中『抓馬』『從馬』的譯文略談對於蒙古秘史翻譯的心得和困難」一文，略談譯註時的甘苦經驗，使青年學子了然於為學之不易，非勤敏而又謹嚴者不易見功。

德國政府擬聘請我國學者赴德講學，教育部有公函到台大，四月二十六日，系主任劉崇鋐徵詢先生意見，先生憚於遠行，乃致書劉氏婉謝之。信云：「承示教育部四月二日公函，略謂德國文教處承諾赴德諸學者可補助每月一二〇〇到一五〇〇馬克及來回旅費，福特基金亦可補助云云。徵詢弟之意見。幸蒙老友關注，至為感謝。惟弟對此舉不擬考慮。理由如下：一、弟所習為元代史及邊疆史，以臆度之，當不為德人所注意。若講述通史等，自極吃力而不討好。弟年已望七，實已無此精力。二、弟承台大錢校長、沈院長等舉為研究教授，且有助研究員兩人，而東亞學術研究會對於弟研究室之其他工作人員有時也尚可稍有資助，對於此等優待，個人深感滿足。故願晨昏從事，冀有成就

。目下惟祝上蒼保佑再能潛心工作五年或八年耳！其他一切，非所望也。謹將原件送還，以便另詢他人。至於先生及剛伯院長的好意，謹於此再致懇謝。」

六月，先生所指導之碩士班研究生蕭啓慶行將卒業，卒業論文為「西域人與元初政治」，先生閱後甚為欣慰。馳書論其感想云：「(一)總印象：論材料的搜集，內容的解釋，全文的組織，均見功力，具有卓見。(二)中國材料部分水準已高，當為國外同治此一問題者（除日本外）所不及。今後當留心補充，期臻完善。日文部分所列已多，似尚可再作選擇與補充。因近五十年日人頭等人才，一大部分集中研究滿蒙史，他們是第三者，又頗以西域人自況，故對西域人在元朝的貢獻，不特欣賞，也頗有卓見，此點實應特別注意。惟日文材料不是史原，至多只是些意見，供參考而已！俄文方面，其重要性與日文同，可惜我們在台灣不能使用，希望吾弟到美後，對此須加以注意，隨時補充。(三)附錄『史源與參考書目錄』極佳，可與若干史學名著媲美，參考書部分，次序似尚可改善，或依內容，或一律按時代，或依性質分組。」這些指示都是最切要的。末後，先生又補充說：「國家突遭空前劇變，從吾以逃難餘生，小島苟安，實已出諸意外，尚有何求？然因久遊世界知名大學，略知世界學術大勢，故一息尚存，不敢自懈。來台以後，頗感寡合，自我陶醉之餘，對吾弟等期望頗殷。然自問亦實非自私，特為時代惜才而已！日暮途遠，所可自慰者，惟期諸弟俱能青出於藍，卓有樹立，對祖國史學界能維持住好的傳統，不讓西方人用他們的偏見來寫我們的歷史，於願已足。」先生愛國家，愛歷史文化的真誠，對學生期望的殷切，深情美意，躍然紙上，讀之令人感動不已！

秋，專治宋史的我國旅美學人劉子健回國，鑑於國內研究宋史的興趣雖日益增高，但缺乏相互切磋的場所和機會，遂邀請先生及蔣復璁、方豪、屈萬里、全漢昇、趙鐵寒諸同道，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舉行一次餐會，商定把宋史研究會復活起來，改名為宋史座談會，以便與國際間研究宋史的學者和機構進行溝通與交換資料或出版物。其第一次集會，即由劉擔任報告及召集人，報告題目就是在美國研究宋史的途徑。

十月二十五日（九月九日），先生七十初度，友朋及門弟子購紀念品為先生祝嘏。先生有達觀的二十字養生格言，說：「飯吃八分飽，覺睡十分好，按步就班幹，聽其自然老。」友人鄒湘喬特為寫在硃紅冷金箋上，裝成鏡框，掛在客廳裏，常得意地指給朋友看。

民國五十三年甲辰（一九六四） 七十歲

二月二十三日，與門人陶晉生函，垂詢其在國外情形其詳，關愛之情，溢于言表，而諄諄叮嚀，尤意在言外，正所謂愛人以德了。茲錄原函如下：

許久未克通信，時深想念。 令尊希聖先生時常見面，談史憶舊，頗增快樂。你



的采石戰役考實論文印出來了，頗獲佳評，校印時我匆匆又看一過，王德毅弟在校改時又查對原書，頗見辛勞，值得稱謝。你上次來信說：修改後纔能見人，這是學然後知不足，不必了。你的信中又說：第一試考完後，或可回來一年。前天希聖先生也說你快要回來，藉找材料，並可省親了。甚為欣喜。您離祖國是否已近三年了，應該回來看看。去年哈大郝延平回國六個月又復返校。你是不是也是同樣的例子？論文題目如何？歐美各大學都頗重視博士論文，第一砲放的響了，以後就有很多的方便。吾弟勤修有年，是應當一鳴驚人的。弟堅毅，細心，努力工作，前途成功，自可預卜，謹為預賀。您與鮑家麟小姐訂婚，我也很高興，您們是很理想的結合。祝您們共同努力，共同創造前途與幸福。

鄧先生處也久未通信，聽說他休假到西雅圖去了，何時復歸？您的理想與計劃如何？是否想在美久住下去？您近來研究的題目轉變否？您說中國古代史注意的很少，那末遼金元史，在美國似乎更沒有人注意了！您所說的劉子健先生，刻下正在南港，常常見面。人尚精明幹練，我們組織了一個宋史座談會，部分結果已在大陸雜誌發表。印第安那大學的東亞研究如何？他們一般的說對中國史那些部分有興趣？大師有些什麼人？找基金會捐款，不是美國人主持是否容易？其他大學對中國史的研究如何？以愚推測，怕要逐漸趨於人存政立，人亡政息呢！近年來他們研究中國近代史，是不是只想了解現況，解決實際的問題，不是真心的像歐洲人研究希臘羅馬一樣，認為是一種學問。目下國際情勢變了，怕他們注意的目標也要跟着變。這些都是坐井觀天式的推測，不知有百分之一二摸着邊否？與弟相處有年，不曾談這些瑣碎的問題，倘有指示，實所樂聞。

於此亦可見先生關心國際上研究中國史的行情，而於新的思想，新的方法，尤能虛心接受，這是值得青年們學習的。

四月二十六日，宋史座談會舉行第五次集會，邀請先生做專題報告，乃講述「從宋人所記燕雲十六州淪入契丹後的實況看宋僚關係」以與諸同好共商之。此次集會在台中東海大學舉行，到會人數頗多。

十一月二十六日，與門人蕭啓慶函談Dr. I. De Rachewil西遊錄英譯本的問題，頗懷疑Dr. De Rachewil的中文程度不夠，又沒有好的助手，所以有些地方弄的不甚好。原函甚長，但關係學術至大，特轉錄如下：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航信收悉，至為欣謝。札奇先生歸來後，得知英美近年若干情形，頗感興奮。兼知兄在哈大努力近況，至慰。方擬問候，您的信就來了。您年來考試成績甚佳，私心至為喜慰。所談吾國西北、東北邊疆史地研究事，均甚正



確，如何發揚進步，容日再詳。總之，我們有的是材料。張星烺先生的中西史料彙篇，只是一個起頭；自然作的不够，也不是一個人所都能作好的。我想還是一部書一部書整理的好。至於如何與外國同時代材料互相印證，以及如何整理，發揮我們的材料？如何擴大研究？自當採用新法，並須與國外有同好的學人誠心合作，以期集思廣益，因此弟頗有意與Dr. I. De Rachewil 合作；因為他也研究十三、四世紀的中國，不正是我們所企求的嗎？假使他認為與我們合作，可以互利的話，我方當開誠相見；將來當可從這一方面對東亞中國史十三十四世紀的研究有些新的貢獻呢！翻譯「世界征服者的歷史」又遭停頓，因所約蕭廉任先生近陞為副教授，不能再任助理研究員了。若想繼續，譯費出自何項？尚須另籌。我是傾向譯成朱凡尼與施特特哀丁二書的，若有機緣，一定把此事作好。

現在我想抽些時間與您談一談Dr. R. 君「西遊錄」英譯本的問題，以便您對此書作報告時，便中可作些更深一層的認識。

Dr. R. 今年五月末寄來一冊英譯「西遊錄」的加印本，我曾翻閱一過，當時曾將我認為有問題的，記在書眉。本想寫一長文，加以批評，刊入大陸雜誌。嗣因事忙，又因Dr. R. 的態度似乎不甚好；（他是到處求教的，但又裝出博學的樣子。）要寫，須詳細細的寫一文，並可寫成英文，與Dr. R. 商榷一番。單單寫一篇中文批評，是不過癮的。（我若有蓮生先生與煥蓮先生的那一枝筆，早就與Dr. R. 痛痛快快的討論一番，把這本書，弄的更清楚一點。）我的目的只是商榷學問，加深本書的了解，並無爭勝自是的意思。現在將我五月間批記的幾點，寫在下面，供您參考。

第一、是本子選擇的問題。我們認為「西遊錄」當年的原典，是「燕京中書侍郎宅刊行」的刻本。日本原鈔本後面刊有兩行字，（見下面第二行引文。）說的清清楚楚，不應再有誤解。但是何年刊行的呢？王國維先生根據原書後面的這兩行文字，「戊子（1228）清明日湛然居士漆水楚材晉卿題，燕京中書侍郎宅刊行。」考定所謂戊子（一二二八），是原書寫成之年。刊行年月，當在次年己丑，那即是一二二九年了。日本宮內省的本子，是後來的鈔本，不是原刻本，而且錯字相當的多。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左右，我尚在柏林，陳援菴先生曾以羅振玉氏排印本「西遊錄」一冊寄贈，批改錯字，約在十處左右。這尚且是羅振玉氏的排印本，原鈔本更差。例如「拂更」（全書一一四頁二1a）。又如「壬午之冬」旁批「至元十九年」，（全書一二〇頁7a），及後面的跋文，「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晉卿奉世祖之詔，巡視西域……」云云，更是莫明其妙。後經多年研究，共認日本現存的鈔本，只是「西遊錄」一個海內現存足本鈔本的孤本，但原鈔頗有錯誤。現在較好的本子，「應當是王

國維先生研究以後，改正過的日鈔本。」（理由甚多，惟須作一校讎記，方能明白，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清楚的。）這個本子，刻下藏在北平圖書館，一時不易獲得，頗為可惜。三年前Dr. R. 初次來信，曾說從房志彤先生處，得知我研究耶律楚材云云；我曾開列書目，寄書相勉。後有一次來信，認為日本宮內省的鈔本是原典；責我何以不用？又何以未取序文？那自然與實際情形不符。當時曾用中文去信，申述序文將來出全書時當加入。至於原典云云，在正言告之，明白說出他的看法不對。措辭現在想起來，或稍直率一點，所以未得回信。近看他在引論中說到本子的歷史，雖也指明日本宮內鈔本，偶有錯誤，但所指的實在不夠。例如Dr. R. 說：「KZ 本標點偶然也有錯誤。如影印本1265，如何如何。他能指出影印本十二頁（126）五行「根深蒂固」，斷句點在蒂字旁邊的不對，那已經很難得了。但同書下一頁（13a），全書頁一二六，一頁中即有兩個很顯然的錯誤，他竟沒有發現，那就未免有些粗心了。這兩處錯誤就是：13a 頁中的第四行「或堅請之乎於朝廷」，與同頁第九行，「夫豈待公子之喋喋也！」這兩句中，上一句多了一個「乎」字；下一句多了一個「公」字。（兩字旁邊的△是我加上去的。）中文一看，即知道有問題。那兩個字若不刪去，全文即欠通順。您琢磨琢磨看，是不是如此的。

日本鈔本西遊錄中錯字頗多，您仔細看幾遍，即可發現。不過舊時日本學人在中國鈔書，若是自鈔，鈔本中有錯字，那是應該原諒的。但您若即依據它作為底本，那就大有問題。這些地方，勢須與Dr. R. 面談，纔能弄得明白。通信、轉譯，都是不容易求得滿意結果的。（我注西遊錄重在史料的使用。版本的考定，尚沒有多加注意。敬請 兄代為注意，在美若有好的見解，自當擇善而從。惟須是合理的、有證據的。至於「武斷」、「優越感」，那都是要不得的。）

其次，文字的解說方面，也舉一例，請您注意。如日本宮內本影印26頁（原書一一五面）「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許，長者僅負二枚。」我們的本子（盛如梓的節本。）長者多作「長耳」。長耳、即是「驢子」。「長耳公」一向是驢子的雅號。意思是說：「八普城所產的西瓜，（日本宮內本此處標點有錯誤。）大者每個有五十多斤，一頭驢子，僅只能馱兩個。」這是很清楚的。所以張星烺先生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五冊，三百三十面中，即沒有解說。日本宮內本，誤「長耳」為「長者」；這一來，整句話都有問題了。長者的長，應讀如「知養切」；普通是指年高的老人說的。負，「以背任物曰負」，如「負米」之類。孟子（梁惠王第一）說：「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那末在中國，老人是不常背負東西的，何況是每枚有五十多斤重的兩枚大西瓜？Dr. R. 也覺著讀如知養切的長者（老人、成年人），不合適。他譯長字為

「池陽切」的長。（即長短之長。）說是「長的西瓜，只能（一次）馱兩個。」（頁21）。意思明白嗎？怎麼馱法？是須有交代的。中文負字，即是用背負物，是只能指人說的。猶之乎用馱字，多指動物一樣。**Dr. R.**在小註86（頁五十四）雖也提到**Bretschneider**，但認為譯錯，因此**B**在原書第一冊頁20中的解說，以長耳為**Donkey**（驢子），不幸未被採用，也沒有提到驢字。大概他認為是沒有問題的了。這些地方，我看還是從俗（中國）的好。無謂的考證，不但不能顯示博學，而且浪費時間，不知兄以為如何？

此外如「三尺法」，（譯文頁35底行）**Dr. R.**譯為**Three Laws**，通行漢英字典（**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三尺法下，即是這樣的譯法。**Dr. R.**雖也鈔了史記卷一二二杜周傳頁（85），那仍是不够的。「三尺法」，譯成現行的國語，即是「成文法」，意指最早寫下來的法律條文。換一句話說，意即公認的法典，或基本法（憲法），那是大家都應當遵守的。這些尚是我們了解的地方，至於我尚不了解的地方也有多處，正欲向通人求教。有人出來大家共同討論，樂何如之！

總之，耶律楚材在當時是一個歸化的契丹人，（他的詩跳譜，王國維也曾指出，見年譜），西遊錄粗枝大葉，也是不容易譯成外國文的。我更無意與**Dr. R.**爭辯。將來有工夫的時候，也許替他作一篇「英譯西遊錄的校勘記」，供我的西遊錄校註改板時之用。相反的，因為他也研究十三、十四世紀中國史，空谷足音，在今日尤為難得。私望，甚欲與他善意的合作，以期與世共進。例如繪圖，考證中亞地名，許多專名，俗語如何解釋？**Dr. R.**能多多提示旁觀者清的新問題，等等。自是我們（特別是我）所竭誠歡迎的。這也即是我樂與歐美日本志同道合朋友合作的希望。

至於我的校註書，近日也發現了若干錯誤。(1)西遊錄的排印本，沒有三種。神田本即是倭古書屋本。去年假黃得時先生與神田通信，方知「倭古書屋」即是神田先生自己書齋的名稱。原文說：「昭和倭古書屋本」云云，（原校註本頁二一二等，即有兩三處這樣的錯誤，）實在粗心，應即更正。(2)頁二二五，「羅振玉排印本以長耳為長者」排印字下應加「日本鈔」三字。(3)其他錯誤、錯字、缺點尚多，下次再詳。

近年來我常想另印一部「蒙古史料第二集四種」，把「西遊錄校註」作為四種中的一種。將來擬把校註本加以充實，使它成為一本較好的專著。我的計劃，①應加耶律楚材的原序。②加耶律氏的宋子真的神道碑與名臣事略中的耶律文正王事略。（元史本傳是否也收入？未定。）③應增加多幅地圖。④影印最早中土不全本與日本宮內省鈔本附校刊記。⑤中文西遊錄佚文輯佚，以便與日本鈔本比較。⑥加多種引得等等。我相信集思可以廣益，商榷得失，對於我們尤有實惠，自當虛心，擇善而從。因此

望 兄多多代爲留意，有聞卽告，以便隨時改正，是所企盼！」

案：這封長達四千字的信，是專談Dr. Rachewil 爲西遊錄英譯本的問題，先生頗懷疑Dr. R.的中文程度不够，又沒有好的助手，所以有些地方弄的不甚好。但西遊錄有他這樣的英譯本，也算難得了。先生認爲我們要做的國史研究工作真是千頭萬緒，曾窮畢生之力以從事之，仍感覺不够理想，所以把希望寄託在繼起的門生身上。因此在信末又附了幾句很動感情的話：「近來胃有些不好，所以工作的情緒也差一些。我已經老了，所以得知兄與晉生兄等在美努力，甚爲欣慰。關於西遊錄事，請代注意，有所聞卽以實告，隻字片言皆所拜嘉，不能再擔擱了。」先生對於國史的研究，總是這樣熱誠感人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德毅在宋史座談會中報告王國維先生對宋史研究的貢獻，先生亦光臨指教。德毅於講完有關王氏宋史方面的研究和著作後，並作結論說：「王氏一生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實和主編定期刊物，圖書金石拓片的編目整理和摹印二事息息相關。蓋自光緒二十七在上海佐羅振玉主編教育世界雜誌時起，卽將著作與出版打成一片，早期研究西洋哲學和文學批評等的論文，都發表在該雜誌上。三十四年就職北京學部圖書館，至宣統三年正月羅創辦國學叢刊，請王主編，於是又將歷年研究戲曲的著作擇一部分刊入其中。是冬東渡日本，到民國三年羅再創辦國學叢刊，又請王任編輯，於是將近年海外著述悉送入此叢刊中刊之。民國五年回國，居上海，爲英人哈同倉聖明智大學主編學術叢編，月出一冊，計在民五、六兩年中，王氏著述極勤，學術叢編中每冊皆有他的著作，總計此二十年中，一面從事研究，一面計劃出版，於是王國維的大名乃爲舉世學界所同欽。如果不主編各種期刊，便沒有推動他勤於著述的力量，即使他學養越積越厚，他的著述也不能卽時爲世所熟知。如果他生前不及享大名，則他的自殺，也不會爲全世界研究漢學的人所深切悼惜了。……」先生對德毅這一結論大加讚揚，並立刻補充說：「趙鐵寒先生因爲主編大陸雜誌，所以近年不斷有新的研究論文發表；楊家駱先生因爲主持世界書局，所以纔印中國學術名著，並刊印若干專論；都是研究與出版相結合的好例子。不出版鼓勵不起研究情趣，不研究也提高不了出版的水準，兩者相得益彰，關係密切，所以剛才德毅的這一結論真是好極了。」先生用這樣的方法鼓勵他的學生，令人感動。時德毅正努力搜集有關王國維材料，並着手編王氏年譜，先生也常常鼓勵，終底於成。

民國五十四年乙巳（一九六五） 七十一歲

門人陶晉生以出國日久，思親之念油然而生，有意返母校服務一年，就便侍親。先生極表贊同，並各方設法以促成之。二月二十五日先生與晉生寫一長函，詳談此一事情



的經過和希望。原函要點如下：

台大近兩年來，歷史系的事務由余又荪先生負責主持，劉先生改任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執行秘書，現只在台大兼教美國史而已，余先生北大出身，留學日本，很想做事，他是傅校長時代的總務長，事中事務也比從前活躍他了。系裏情形您是知道的，人已太多，但本校畢業同學在國外成績好的，仍是要設法邀請的。您的信我已讓他看了，他對您的宋史論文認為很好。他最近與我談，已與沈院長商量過，同意請您回校任課。

下學年又輪到我開遼金元史了，我已告訴余先生，金史部分擬由您分任，這是多年來我的希望。這一課程的內容您是知道的，請考慮如何講法，萬勿客氣。去年我與杜維運兄合開歷史方法論，開學時我講導論兩禮拜，上學期由他講，下學期由我講，我們一致的希望和目的是：「共同努力，把這門功課教好。」內容方面，他介紹英文方面的新理論，新方法，我注重講述我的經驗及德文方面的新論說。一年過去後，我們從新檢討，看如何改進；我已七十多歲了，一兩年下去。這門課程，即可全部由他担任。我想遼金元史一課，也仿照這種辦法去處理。今年您先教金朝部分，若是暫時不赴美，再下學年您即可教遼金史。再過幾年，我即退休，即使尚能開課，也怕只能教一種專題研究了，我想我能與您、與啓慶及延煊合寫一部遼宋金元史，或分開寫遼朝史，兩宋史，金朝史，元朝史，再寫若干種社會史，文化史，能這樣做，真是治史的無上的樂趣。從前在德國讀書時，他們的每一朝代都有很多部歷史，我們正可效法呢！關於這一方面，您回來後，我們可以詳細的談一談。

我一生無專長，為才能所限，只想按步就班對國史研究有所貢獻，今能得諸兄之助，先把遼宋金元史一段做好，再擴及其餘。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我們的研究室弄的更好一點，最近三年來已比從前好多了，快意之事，實無逾此。我現在仍擔任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研究教授，待遇是每月補助四千元，可以用兩個助理，每人每月一千元。另外，每年有兩萬元的購書費，我盡量用它購書。請您留心收集有關書籍的目錄，以便分期購買。

您願意回來的消息傳出後，上上下下無不歡迎，同輩尤一致贊成。目下同輩在系中，有杜維運、王曾才、許倬雲、孫同勛、張忠棟、王德毅、劉景輝等。令尊下禮拜二來台大歷史系任專題講演（四至五禮拜），我也將親往聽講，他講北大同人對國史研究的貢獻。我始終念念不忘，我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第一班學生。

在這封長信裏，先生表達了自己的希望和對學生的期許，並且說：「我自己能做多少就作多少，能將上面的理想實現就夠稱心快意了。」這實在是崇高的精神表現。歷史



研究是持續的，棒子總要交下去，能儘早培植幾位後繼者，對學術文化畢竟是有益的。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台大歷史系主任余又蓀不幸以車禍身故，年五十八。余主任任職不到兩年，對於本系教學研究的策進，印行文史叢刊，成立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皆全力以赴。使系中一切，表現出活潑而有生氣的樣子，繼此以往，歷史系的前途將不可限量，所以先生對於余的不幸，尤深致哀悼之意。

是月於大陸雜誌三十卷七期發表聖宋各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對宋史研究的貢獻一文，指出這是一部奇書，代表宋代中上層社會人士的生活。是研究社會史的直接材料。

民國五十五年丙午（一九六六） 七十二歲

四月，中央研究院依法選舉該院第六屆聘任評議員，先生當選人文組評議員，呈請總統聘任之。

五月，先生偕夫人與友人李安夫婦共遊阿里山，高雄澄清湖及台南安平古堡。

六月二十八日，友人趙鐵寒自美來信，述及美國青年漢學家研究我國文史的情形，云：「小婿荆允敬在此與中西部十一所大學之東方語文學系合辦東方語文暑期研究班，此種研究班已連續舉行四年，今年由明尼蘇打大學主辦。十一所大學志願參加學生將近二百人，二年級以上者均能寫流利通暢之中文作文，直接聽華語講課毫無困難。教授陣容相當堅強。抵此第三日，班主任畢克爾先生（明大東方語文系主任）請吃晚飯，遇到美國青年漢學家數人，各個對我國文史有高度修養，每人專攻一經，或一階段，有專治呂氏春秋者，又有專治世說新語、淮南子、孝經或論語者。全部世說新語暨呂氏春秋已譯成英文，昨晚有持新語文學篇英文譯本來乞指正者，個人對此書所知不多，不敢深談。……美國人此種幹勁，較國內學術界強多矣！」先生覆信云：「兄述美國青年學人研治中國專書專題一段，尤令弟讀後為之神往。似此，我們真的非努力不可了！」先生雖年逾七十，然研究精神視青年人並無遜色。

八月十九日，友人趙鐵寒與先生信，談及美國漢學研究，有云：「外國人做中國學問，看起來比我們專，其實底子不夠。依我們的看法，通史不夠不能弄斷代史，斷代史不夠不能弄專史，治文學也是如此。我們文化悠久，資料太多，所以我們同學很容易走上由博返約的路線，外國人就不容易做到這一點了。所以他們只好捉到一部份就深入專攻了。固然彼此各有利弊，不過他們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是很值得佩服的。就拿此地的中國語文暑期研究班專治淮南子、世說新語的兩位專門漢學家說，其專深的程度在弟之上是不成問題的，但涉及縱廣的部份就嫌不夠了。」先生對此亦有同感。

九月十八日，中國歷史學會召開第三屆會員大會，由先生擔任主席，討論會務，並改選理監事。選舉結果，先生仍以較高票當選為理事。理事會又推舉先生任常務理事，

另推方豪任理事長，陳捷先為總幹事，其他理事尚有沈剛伯及陳奇祿二人。

秋，先生增訂舊作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並附簡註，用善因作筆名，送書目季刊陸續刊之。自序云：「這是一篇舊稿，作於讀書柏林大學時期。民國十七年初次在北平輔仁學誌創刊號中發表，原名紙的西遊記，當年師友如援菴，逸先、亮丞諸先生均認為不够鄭重，改用今名。出版後，流傳稀少。……數年前一度有友人商請增訂再版，余重閱一過，雖覺材料尚少新增，而出版時日究嫌過久；且在台西文書籍設備簡陋，個人研究興趣轉變，從事修訂，亦頗不易。因是種種，又復擱置。今書目季刊編輯委員會諸友，以原書三編，六萬餘字，敘述吾國造紙技術經由阿拉伯，轉輸歐洲，尚屬首尾完備，且一時中尚有若干地方應刪未刪，乃改署筆名善因，以存歉意。」（書目季刊一卷二期）。

十月二十日，先生到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借閱清宣統二年陽湖陶氏涉園影刊洪武本程雪樓集，前曾看過，便想替程鉅夫作一新式的年譜，藉以認識他的一生，並可以把忽必烈統治南中國的情形有關資料歸集一起，以便研究。文集卷首刊的程世京所編雪樓年譜，共九張，約四千餘字，據先生考察「程氏生年月日時均詳，可作為年譜的基石，其長一。先世遷徙情形及族姓來源，頗為明白，其長二。諸子生年及子孫傳流情形亦明白，其長三。師友淵源，為學與仕歷，均記載詳確，其長四。至於得君之故，易代為南人呼籲的影響，今當補充說明，以示功力與重點的所在。」後先生寫成「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問題」一文，刊於台大文史哲學報十七期，即在闡述此觀點，遺憾的未能完成程氏年譜。

張其昀倡議結合海內外先進學者，創組中華學術院，聘先生為人文學門的哲士。據該院創立旨趣說：「本院之組織，以哲士與議士為基本，兩者並無嚴格分野，大體言之，哲士年事較長，成名較早，聲望所歸，羣倫嚮慕。議士大都亦為學界中堅；羣策羣力，同為本院事業的骨幹。」「又中外偉人，對政治社會卓著聲望者，本院因應時機，致其崇敬，稱為弘士，即孔子所謂弘毅之士，任重道遠之意，相當於各國大學授予榮譽博士的義旨。其對本院發展在物質上有重要之支援者，則聘為保士。」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開成立大會，先生因患傷風未癒未克出席。據先生私記云：「台大文學院沈剛伯先生因開會，余因傷風，均未出席，只是子水去了。吳康在香港，羅志希也未參加。所謂議士劉崇鋐等也多未參加，蓋倉猝召集，略如抗戰時期政府的選派參政員，那是不會十分圓滿的。今午（十月三十日十二時半）我們（大部分為邊疆歷史語文學會的負責人）在心園公宴日本歷史家島田正郎，即聽到對私立中華學術院不同的批評。蔣慰堂是社會賢達派，他對曉峯此舉深表贊許，並說：『南港把門關的緊緊的，路子越走越窄，寫的

文章大家都看不懂，還是張曉峯大方不拘的好。』楊家駱、陳固亭（二人均議士）先生亦表示滿意。余十二時赴心園前，遇子水，問他對昨天的印象如何？他說：『到的人也不少，但是敷衍的成分多，不是專心學術。』先生的觀感也是如此。

十一月十二日，為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百晉一周年誕辰紀念日，總統特明令規定以這一天為中華文化復興節。

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廣播電台為響應政府新定的中華文化復興節，特邀請國內著名史學家蕭一山、沈剛伯及先生等二十餘人舉行座談會，並錄音向大陸廣播。座談維護中國民族文化問題，並聲援大陸被迫害的研究歷史文化人士。先生作如下談話：「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在三四十年前即不信中共能為歷史所容納。現在大陸紅衛兵騷動，表明了中共反歷史、反文化的作風。他呼籲史學家們應指明中共邪說完全違背歷史。」又說：「歷史是走曲線，共產邪說走直線；歷史基礎在中產階級，共產黨仇視中產階級；歷史求真，共黨說謊，因此在歷史的反映下，注定中共敗亡的命運。」（聯合報、55年11月14日）

案：先生在剪貼簿中自注云：「一、各教授談話，台北諸大報所載均有出入，有時差別很大。例如沈剛伯教授曾講殷有三人焉的故事，用於此一場合甚有意義。余所見之報，只有徵信新聞記的較好。二、各人所說，只留了若干影子，其餘都是記者隨影臆造的。赫格爾說：『普通的通史，只是反映的歷史。』信然」。上引聯合版，因先生在所刊自己的談話下注曰「尚可」，故全錄之。

十一月十六日，中華學術院擬在翌年召開首次世界漢學會議，乃舉行第一次籌備會，決議約請二百人參加，包括我們旅居海外學人及東南北亞和歐美地區學者。二十日上午，蔣復璁來訪，即談到世界漢學的事情，談了約一小時，先生略記當時談話如下：

一、據蔣慰堂說：他這次被套上是無法推辭的。人家說，曉峯是我的朋友，那還能否認嗎？不過，曉峯好作事，他要找人；找到你，你也只有酌量着幹了；劉壽民不也是被動的嗎？不過，漢學會議可以再延一年。

二、我的責任祇有給他說：要辦，就辦的好一點；不然，還是不辦的好。你要說，不辦，那是緣木求魚，作不到的。他問我：「你看他可與中央研究院合作嗎？」我說：「很難，但非絕不可能。你能讓許倬雲與曉峯談一談，他與少壯派說過了也許有些希望。」他答應請許等與張會面。

二十一日，中央日報副刊方塊欄刊出仲父撰脫節一文，提到「三十年代文藝論叢」出版後，年輕作家看了覺得非常隔膜。但是這部論叢的出版仍是必要的，不然，脫節的地方就永遠接合不起來了。先生認為我們應努力從事編輯一種「民國文選」，將民國以

來的好文章，盡量選錄，保存下來。歷史上的昭明文選、宋文鑑、元文類、古文辭類纂、百家雜鈔、經世文編諸集，即有為時代選文的意思，也正是符合時代的要求。因此主張現在應及早約集學人，從事選輯，先從「三十年代文藝論叢」作起，一集一百萬字，擬選十集，每集分為上下兩冊，每冊約五十萬字。先生的這一主張，完全就歷史上前賢所成就的若干時代文選價值來衡量，說明編選「民國文選」的必要。這一工作，可以持續下去，只要規模建立，後起者即可仿此續編，不止使三十年與六十年代，或六十年代與九十年代不脫節，而且保存文獻，對歷史也有交待了。足見先生的史學眼光。

十二月五日，中央日報刊出駐紐約特派員湯德臣特寫「美國大學重視漢學研究」，先生非常注意這篇特寫，曾把它剪下來貼在記事簿中，上面盡是朱筆圈點。該特寫中指出：目前美國的中國研究可以分成兩大類，(1)研究經典與學術方面，如歷史、語文、哲學、文學等；(2)研究現代中國的發展，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可以分為四大類：(1)只會說，不會閱讀；包括以前在中國的傳教士和在中國生長的美國人。(2)只會閱讀，不會說；早期在美國訓練的漢學家屬之。(3)既不會說又不會閱讀的人，僅對中國文藝美術有興趣。(4)既會說又會閱讀的人，乃指近年主修中國語文的年輕美國人。先生認為過去美國的中國專家，會說中國話的並不多，能認識幾個中國字的就很了不起。造成這種原因的，一是由於中國語文的特殊，不容易學習。二是歐美人不肯學習，受了優越感的支配。但近年來已有逐漸改變的趨勢；台灣大學中美國學生的增加，和我們的青年一同上課，就是一個好例子。這樣他們自然也可以有像我們了解美國一樣的學人了。該文中又提到美國學者對於現代中國問題的研究，是一種把社會學、心理學以及經濟學等應用於種種已知事實的綜合研究。先生認為這一點很值得注意，主張我們應當慎選通人，與這一派人誠意合作，努力實現下列三事，以期求大同世界的實現，對於我們，對於美國朋友，對於世界人類，均有利益。(一)限制我國人口過分膨脹，(二)提倡我國舊有王道哲學，學會科學技能之後，不去為害世人。像以前發明火藥只做煙火一樣。(三)影響美國和世人，生活安祥，不再加速發明，使生活享受與發明工作，彼此平衡，互相調劑。這一點，是很合乎我國傳統文化美德和立國精神，足見先生治史所受儒家思想影響頗深。

民國五十六年丁未（一九六七） 七十三歲

元月十六日，友人趙鐵寒致先生長函一通，報告趨車往克里夫蘭探望先生女公子大良經過，並述其生活情形。信云：

西留大學在美國中西部小大學裏，是個有名的學校，克市為俄亥俄州第一大城，緊靠在伊略大湖之濱，滿城都是喬木蒼松，古意盎然。若到夏天，定如置身仙境，



今則白雪皚皚，氣候嚴寒，另是一番情趣了。

大良這孩子性情溫和安詳，名副其實。內向型的青年，一定能讀書有成。聽她講起來，自己很能照顧自己的。美國人到處都不歧視外來人，最樂意幫外來人的忙。克城又是有名的社會安定的城市，生活環境方面一切沒有問題。

此信於二十二日上午寄達，先生數讀後，既高興又安慰。乃記感想如下：

鐵寒兄五十六年元月十六日的信好極了，閱後爲之大慰。(1)這是報告良兒在校生活情形的第一封信，使我們知道克城的大環境及一般情形。如說：「滿城都是喬木蒼松，古意盎然。」「冬則白雪皚皚，夏日則如置身仙境。」(2)它也是記述良兒生活的最佳記錄。如說「性情安詳，一定能讀書有成」，「聽她講來，自己很能照顧自己。」這些都是大良沒有說到，而我們非常想知道的。原信詳明親切，數讀之後，至爲欣慰。特記感想於餘紙，以示不忘。

先生念女之切，愛女之深如此，不覺地真情流露於片紙隻字之間了。

元月二十七日，先生即覆信表示誠摯謝意，所謂天下父母心，原是一樣的。此信尤足見先生的真性情。云：

元月十六日手示長函，同月二十二日午刻收到，讀後至感欣快，並謝謝兄嫂與荆先生夫婦對於小女大良的厚愛。這封長函，真使弟夫婦如獲至寶，數讀不厭，不忍釋手。信中所說克里夫蘭的一般景色，如「滿城都是喬木蒼松，古意盎然」，「若到夏日，定如置身仙境」。又如「所居是女子公寓，一棟樓房，離大街很近，一切很方便。」又說：「聽她講起來自己很能照顧自己」，「克城又是有名的社會安定的城市，生活環境方面，一切沒有問題。」又說：「大良吃的白胖」，這一點嫂夫人務要兄寫明「好讓姚太太放心」等等，都是我們所久想知道，而年輕不達世故的女兒不知道寫的，這真是一書抵萬金了。

長途冒雪代友訪問異旅中的女兒的盛情，真令弟夫婦衷心感激，永矢弗忘。看了兄嫂的長函，愚夫婦私心爲之大慰。但願良兒真能如兄嫂所說「讀書有成」，這一點對於安慰親心事小，對於自己的前途則所關甚大。惟願她好自爲之耳！凡兄嫂獎勵好意，當一一轉達，作爲鼓勵與開導。……弟希望她規規矩矩考一碩士學位，不一定要考 Ph. D.，但中國書則應當補充一些，以免「粗俗」與「忘本」。能有機會結婚應即於就業後準備結婚。這一點，尚望兄嫂與荆先生夫婦隨時留意，多作協助，我們這裏「以天下父母心的殷切希望」拜託你們了。

先生對子女的關懷殷切如此，這封信真是相當感人的。

元月，先生所撰余玠評傳在清華學報慶祝李濟先生七十論文集下冊中發表，這是先



生歷年研究余玠的總成績。余玠的軍事天才和幹略，向不爲治史者所注意，先生研究元史，深知當蒙古初起時，鐵騎所至，無不夷滅，獨受創於四川合州的釣魚城下，因而想到依山涉險的功臣——余玠，其軍事眼光，實是超時代的。經數年的廣搜博採，乃成此一評傳，余玠的歷史地位，至是益穩固而不能動搖了。

三月十一日，門人蕭啓慶奉書先生，報告他撰寫博士論文的計劃。說：「生於一月間通過了學位資格考試，這兩個月來，一直以跑野馬的方式涉獵一些史學以外的書籍，希望能在本行之外，拓廣自己知識的範圍，在國外幾年，常常感到社會科學的訓練不够好，因而分析問題的能力不及外國同學，因而想在這方面多多充實自己。生的論文題目，初步決定爲元代軍制研究，這一工作可能分爲兩部分，一爲譯註元史兵志的前兩卷，二爲參照元朝祕史，黑韃事略，國朝文類中經世大典序錄，元典章，通制條格及文集等，討論元代軍隊的組織成分，社會及種族分析，其功能，文武關係，軍隊的經濟基礎，軍政與社會的關係，以及軍隊與政治勢力消長的關係等問題。希望老師及札奇師能多惠予指教。柯先生對我的這一計劃頗爲讚許，遺憾的是蓮生先生舊病復發，住院治療，至今還未能向他請示。蓮生先生表面看來有燕犴健兒的爽朗慷慨，實際上却不十分想得開，這些年來，他在事業上，前年他榮任哈佛燕京講座教授，在西方漢學界可說已登峯造極，不能算不得意，但因其他一些問題，如兒女教育之類，縈擾於胸，以至精神上負擔過重，終至成疾。像他現在正是五十盛年，學問成熟，精力未衰之時，因病不能常事著述，實在是學術界的憾事。」先生於了解啓慶論文寫作計劃後，欣喜不已！

三月，國家安全會議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正式成立，總統特聘吳大猷爲主任委員，閻振興、蔣彥士爲副主任委員。吳對記者說：該委員會是一決策性的機構，今後的工作是根據國內各方面情形，加以配合檢討後，擬定一發展計劃，經過總統核准後，再交由行政機關去執行實施。吳返國時，先生曾往迎迓，並於二十六日晚宴請他，飯後又到皇后飯店吳寓所閒談，次日先生在記事簿中記述所見所聞及感想如下：

(一)據大猷先生所說，他們二人與俞大維先生談，俞表示悲觀，吳慷慨的說，連他都悲觀了，還有什麼希望！子水代爲解釋，認爲從另一方面看，大維的話也有道理。但是天下那有一一切都安排好了，等着你來成名的道理，從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方終見真本領。

(二)大猷先生到寓所後連打許多電話，應對明快，有條有理，甚爲老練，是一位有學有識有才很理想的領袖人才。副主任委員蔣彥士精明幹練，再經若干年，定能輔導大猷先生把我國科學界文化界弄好。就表面看起來，前途甚有希望。

(三)安全會副秘書長阮毅成是大猷先生的內兄，這次處處體貼，對吳先生說自然增加不少方便。正談間，他來了，他一進門即說：「一切都安排好了，後天開了第一次會議，你即可回美國了。」又說：「今天上午打了一上午電話，總算都妥當了。大猷先生因居美關係，得的是『聘書』，不是任命，因為吳先生有美國公民籍，不能任外國官吏。阮先生說：對你是沒有問題，對副主任委員閻部長用聘書不方便了。後來想出來一個辦法，這次閻部長出任副主委是以學者身份，不是屬員，也就沒有問題了。」

(四)吳先生喜歡參加同學會與青年學子接近，不喜歡官式的應酬。三月二十八日西南聯大同學會春季聚餐，吳先生答應參加，南開同學會二十九日午間聚餐，也應允前往，這些都顯示了吳先生的書生本色，自然也為國家吸引了大部分的青年，多給他們一些希望。這些都是我們這羣書呆子，終日在熱望國家富強，早日把國家弄好，以便早日收復大陸，復興中華的想望中，所樂意知道的。吳先生是廣東人，有學、有識，有熱心，又在壯年，熱愛國家，為國際間第一流學者，肯為國家犧牲，希望他能為國家再服務十年二十年，把國家民族文化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更提高一些。

先生關心國家民族前途，希望科學技術能在國內紮根，把我們的歷史文化充實起來，好與世界共進，從上引幾則記事裏，不難看出先生熱烈的程度。

先生篤於慈愛，由於愛女赴美深造，遠隔重洋，對她的學業、工作和婚姻，內心無時無刻不在繫念中，特函託友人趙鐵寒和嚴文郁就近照顧，尋找工作，介紹朋友。四月五日，趙來信報告先生愛女近況。信云：「上星期五（三月卅一日），大良姪來此住了兩天。……她現在兩處工作，週薪近四十元，維持生活沒有問題。來哥城的目的，一為與趙燕盤桓，一為面託嚴文郁先生設法另找工作。嚴允稍緩函告。當時沒得具體結果。經兩日觀察，良姪個性內向，屬於閑靜類型，與美國青年及我國青年在美久住之好說好動活躍進取者不同。在這競爭激烈的社會，此種生活態度與方式亟有改進之必要，請常來信『打氣』，鼓勵她活躍起來。良姪情緒似乎偏於憂抑，此或由於下列幾項因素所造成：(1)工作不理想。因為現在的兩個工作都是臨時工作，沒有保障，待遇又低。(2)女孩子太了沒有男朋友，不免有孤獨之感。(3)也可能父母期望太高，愛護過切，也加重了孩子的責任感，一時不得意，便倍增情緒的不安。」這些分析，先生認為極切合，所以覆信有「分析小女心理，實與弟夫婦所見不謀而合」之語。

十一月十一日，先生以「余玠評傳」及「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與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之貢獻」兩文，獲中山學術著作獎，獎金新台幣伍萬元正。

民國五十七年戊申（一九六八） 七十四歲

三月十六、十七兩日，中國歷史學會假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第四屆年會，到會的專家有兩百多位，熱烈討論復興中華文化，歷史教學及史學研究的發展諸問題。又選舉理監事，投票結果，先生以衆望所歸連任理事。

四月七日，先生應孔孟學會之約，發表講演，講題是「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先生認為孔孟學會出版學報，多年來成效顯著，對儒家經典的解釋，微言大義的發揮，長篇短記，數量已多。惟對於孔學的效用一方面，如邊疆民族侵入中原，長期統治中國，對於儒教大同文化態度如何，影響如何？似少報導。因此先生選擇此一問題，提出討論。這篇講演稿後來刊入孔孟月刊第六卷第九期，原刊未作結論，後增訂刊入史學彙刊第二期，乃補一結論如下：「從歷史的觀點衡量元世祖崇行孔學與尊崇孔子的得失，大體上他是十分成功的。他安定了廣大的中國，同時也安定了蒙古帝國，從安定的觀點衡量他的成功。進行的步驟是從北而南，完成的順序由近及遠。（一）阿里不哥集結蒙古守舊的勢力與他抗衡，但當他於中統五年平定內亂阿里不哥來歸的時候，他即與他的弟弟等重新和好，宣布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止誅戮若干叛臣而已！（二）西北諸王海都等遣使質問何以逗留漢地，採行漢法，他即選有學識的高智耀等前往解說，力求和解。決戰則以漢兵代替蒙古軍，操得勝算，綏和則聽其自歸自主，以示兼容。這是他安定北邊，綏靖蒙漢區域的政策。」皆就歷史觀點分析，至為正確。

六月十九日，以「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中所列五十四人行事考」一專題，向國家科學會提出研究教授申請，此一研究計劃敘述詳實明白，非某些人的研究計劃如空中樓閣者可比。茲特引述如下，俾後生晚學知所取法。

一、專題研究的緣起與它的重要性：（1）緣起：元太宗窩闊台即位後的第四年（一二三二年）春，蒙古南伐軍與金朝女真主力決戰於河南鈞州（今禹縣）的三峯山（今禹縣黃輪店的附近。）金兵大敗。三月蒙古主帥速不台等進圍開封（金朝的南京）。劇戰十六晝夜，速不台知不可驟下，乃自四月八日起改採長期包圍的戰略。翌年（一二三三）正月金人不支，叛將崔立以汴京降於蒙古，四月蒙古兵正式進入開封。時避兵居城中者有一百四十七萬人（元史一四六耶律楚材傳），而金國財貨、人才、寶物珍品，咸集於此。速不台初欲屠城，耶律楚材（一一八九—一二四三）力爭，以為不可。元太宗始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赦免。耶律楚材又奉詔馳至開封，協助大軍辦理善後。這時候金大臣元好問（一一九〇—一二五七）以名詩人負一代清望，有天下重名，困居圍城。耶律楚材到汴後，傾心結納，禮遇甚隆。元氏感念身世，認為保全人才即所以保全中國傳統的文化，乃於是年四月二十九日離汴渡

河北上編管山東之前七日，寫了一封長約八百字的手書，於四月二十二日送呈耶律楚材。這就是我所要研究的「癸巳寄中書耶律公書」的緣起了。(二)這封書不但救濟了金元之際的知識份子，也保全了中原傳統的儒教文化，極具歷史的價值。第一、書中開列了當時金朝各方面有學識有地位的社會賢達五十四人，請耶律楚材加以援引與選用，作為蒙古新朝的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以維繫並保全中原傳統儒教的文化。第二、元氏保證這些人都是懷道有為之士，一定各有建樹。即不然，亦必能立言立節以報答知遇，不會默默無聞。第三、這些人被收容後果然各有所樹立，或在太宗時代即出任耶律楚材的收稅官吏與重要助手，如楊奐、楊果、趙著一般人。有的當了元世祖在金蓮川所邀集的潛邸舊侶，如張德輝、李治、王鶚、高鳴、商挺、李謙、杜仁傑、魏璠、程思遠等人。有的著書立說，不再出任新朝，專意揚名後世，如王若虛、李獻卿、劉祁等人。這些人的行事，對於挽救我國傳統文化，維繫民族歷史於不墜，都有很大的貢獻。此一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 二、上述研究工作的內容與說明：(1)研究工作的內容。這一專題，依據上述的性質將研究的內容分下列四部份：第一、元好問的原書在歷史上的價值與所發生的影響。第二、這五十四人中有些人在太宗憲宗時代有重大的貢獻。第三、有些人對忽必烈的建立元朝統一中國有很大的貢獻。第四、有些曾著書立說，對元代的學術文化有重大的貢獻。(2)上述專題的概括說明。(一)元氏原書的主旨在勸說耶律楚材利用自己的地位與機緣，以一寺觀的用費來收養金朝百年來所培植的賢士大夫，且可引為新朝之用。(二)元遺山在當時的文章名望都較耶律楚材為高，兩人年歲相若（遺山生於章宗明昌元年、一一九〇年，楚材生於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年），志趣相同；遺山為當時諸賢請命，乃自稱門下士，誠心懇託，故耶律楚材也當仁不讓，竭力進賢，虛心接納。因此，原書送達耶律楚材後，反應甚佳。這五十四人中最大部份都得到了安排。(三)一二三三年蒙古人接受開封後，不但未再大事屠殺，而且有計劃的將亡金朝士以及三教九流醫卜星相技藝工匠等人安置於山東河北等處，分別集中，免遭迫害。迨喘息安定之後，再徐圖各安生業。這樣的遭遇，在外族入主中原之際，實破題第一次，歷史上不常有的福音。金元之際中原知識份子獲得保全的經過是應當珍惜的，而且是有歷史意義的。(四)這五十四人對於元初元世祖中統至元耶治的貢獻，更是有聲有色。(1)張德輝（元史一六三）、李治（元史一六〇）是元好問的密友，他們曾合力邀請元世祖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悅而受之。這件事在當時可以資號召，正視聽，影響之大，自不必說。(2)王鶚、高鳴、李謙、李昶（四人元史一六〇有傳）都是忽必烈的翰林學士，也都是能言敢諫的侍從之臣，他們對於蒙古王朝在漢



地恢復漢法，實行漢唐制度，均有重大的貢獻。(3)商挺（元史一五九）、徐世隆（元史一六〇）都是忽必烈的潛邸近臣，參與軍國要政，商曾勸忽必烈嚴立軍中符信，粉碎阿里不哥作亂的奸謀；又勸忽必烈定朝儀、立太廟，由是文治得以建立。這些行動，不但是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簡直是協助推廣與提倡儒教文化了。這些都可以看出元好問推薦這五十四人，對於維護中原文化的貢獻與影響，是值得加以細心研究與寫出專著加以表揚的。還有一點應當在此特別作一聲明，即是：此一專題，從吾著手研究已有多年，惟問題中牽涉人數過多（五十四人），一時不易結束。且有若干工具書如「金史語彙集成」（三鉅冊）「元史語彙集成」（三鉅冊）（日本東京大學東洋史研究室出版，昭和三十八年）等近年方始買到，因此到今年纔作綜合研究，使我具有信心，為此專題，試作結束。

三、預期的結果：綜合上邊的述說，希望於一年之內寫成論文四篇或五篇，以說明此一專題所顯示的成果。(1)元好問所舉五十四人中在太宗憲宗時代有貢獻者。(2)元好問當年所舉人才對於中統至元郅治的貢獻，(3)元好問所舉五十四人現存著作考及這些著作的評價，(4)從五十四人的貢獻與行事看元好問上耶律楚材書在歷史上的意義。這四篇文字可能有六萬字到七萬字，各人材料的鈔集尚不在內。

由中華學術院院長張其昀所發起並籌備召開的第一屆國際華學會議，於八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在陽明山華岡舉行，參加會議的代表，來自二十個國家和地區，二百餘人，會中宣讀論文一百七十多篇，先生亦被邀請出席，並宣讀新著「元世祖忽必烈汗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說明世祖對溝通漢蒙關係與統一中國之貢獻。

十月六日，應教育部文化局之邀，在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講演「從歷史上看東亞儒家大同文化的立國精神」，指出從歷史上看來我中華民族傳統的立國精神有四：一、傳統的無逸論與習勞日新的人生觀，二、東方式的民本主義，三、惟材論的歷史觀，四、憂勞與國的深慮論。儒家大同文化在東亞能站得住腳，即歸功於上述四種立國精神所奠立的基礎。（中華文化之特質）

十一月，宋史座談會與教育部中華叢書委員會簽約編印宋史研究集第四、五、六輯。先生是本會的發起人，於會務的推動，貢獻最多。友人趙鐵寒追記說：「我們幾十個對宋遼金元史有興趣的朋友，組織了個不成團體的團體——沒有組織，也沒有立案，是真正的『烏合之衆』——叫做『宋史座談會』，每月集會座談一次，到現在六年多了，談了四十幾次，他和我都是經常參加的。他對於這個會興趣很高，不只是每會必到，而且到必發言，以他的地位聲望，對宋元史的高深研究，充分發揮了示範的領導作用。這個會已經編印了五輯一百六七十萬言的『宋史研究集』，負責的編輯五人小組是方杰人、宋



旭軒、王德毅、石文濟和我，由我担任對外的代表人，他並未負什麼責任，但每次齊稿以後，擬好目錄，我必請他過目。有一次我收錄了一篇馬叔平（衡）先生談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宋本書的舊文章，他認為不妥，理由是我們會員的文稿既然够用，就不必擴大範圍取稿。再說，只要在台學人能湊够篇幅，也不必用馬的文章。又一次有會員送來一篇研究成吉思汗西征的文章，也編入目錄了，他却主張要先寄到美國，請專攻元史的蕭啓慶先生代為審閱，然後決定去取。理由是成吉思汗西征是世界史的問題，不能只憑中國史料的『一面之詞』來論，蕭在哈佛所見的別國史料多，比較多知事實真象，所以有請教他的必要。總而言之，他怕示人以寒儉，所以反對用馬的文章湊數。又怕示人以疎陋，有損宋史座談會的觀聽，因為宋史座談會是與德法美日四國宋史研究機構有聯繫往還的。他對宋史會，對我個人真正做到『愛人以德』了，他的熱心可敬處可見一斑。」（見先生哀思錄）這段記載，非常真切感人，全是德毅親見親聞的。

民國五十八年己酉（一九六九） 七十五歲

元月三十日至二月廿三日，先生兩函門人陶晉生，促其回國服務。一云：「國史研究是我們的事，也是我們的責任，應在國內樹立基礎，展開工作。至於如何解釋，如何研究，理論與方法，方可與人看齊？國內安定，經濟方面日有起色，文史之學，亦當竭力追隨。弟私心實深盼你們均能常歸，從整理國史方面有所盡力。」又云：「我有一個小小願望，就是兄等對於西方治史方法，經驗、史實等了解以後，大家應輪流回來，以國內為主，整理我國的歷史，這應當是檢討我們祖先遺產，復興文化的正當途徑。」（姚師從吾的教學和研究生活二三事，傳記文學十六卷六期）先生對研究學問的熱忱，對國史研究的關注，蓋終始以之。

三月二日，與門人蕭啓慶函，關心其博士學位獲得後出路問題，並希望其回國任教。原函如下：

(一)接讀本年二月十八日 手函，至為欣慰。得知 兄論文已將成功，多年努力所得成果，竟有六百多頁，成了一本厚書，實在可喜、可賀。單就序論一百五十頁說，已是一冊新的「蒙古史發凡」了。希望你完成，並稍事休息以後，再將牠（序說部分）寫成中文，使國內同好也分享這一份的快樂！

(二)你已經接受明尼蘇達一個大學的聘請了，也為你祝賀。在你的信寄到之前，我於兩旬左右曾接紐約一大學遠東研究部的主任Dr. A. Caswell 來信：查詢你在台大的成績。我近年仍經常與耕莘文教院的德國神父們合作，（大約每週一個下午，約三小時。）與他們中的一位（英文好者），商議後即回覆了。自然是鼓勵他能把你請去，自可證明你是中、英文極為卓越的青年學者。你若接到Dr. C.

的信時，可以酌量答覆。關於這一點（在美大學教書），我認爲勞延煊兄的話是對的。希望你們在美能朝着實際求學這一方面奮鬥，並好自爲之。好大學有機會，自然不應放棄。我並希望你們能經常回國講授，並且等到能以自活時，回國任教，以便把我們的這一部豐富的歷史，從各種觀點整理出來，以期與世人共見。我認爲：至低限度要用我們的立場，把我們的國史，從各種觀點寫下來，供世人閱讀。這是我們的責任，別人——尤其外國朋友——是不能，也不配越俎代庖的。

(三) 令尊病中，未能親往訪問，念之爲悵。當時我極力主張，不能讓你中途輟學回國。曾令王德毅兄向府上轉達鄙見。到現在看起來，知道你所作是對的。人到老，終有一個死，與兒子在身旁不在身旁，毫無關係。再者，令堂住令姊處，自很合適。你逢年過節，寄些東西回來，上慰高堂，下助姐姐，也就够了。以情勢與理論衡之，即令你與國璽回國，母親仍是跟女兒同住的好些。（歐美的習俗，即是如此。）

(四) 我的研究工作大致如恆，無大變改。只是年來記憶稍差，工作效率，似不如前。我有四句話，視爲「座右銘」：「飯吃八成飽，覺睡十分好。按步就班幹，聽其自然老。」這是六十歲時作的，六十五歲方正式宣布，至今奉行不懈；只是前邊兩句，遇到好吃的中國菜時，不能嚴格的實行吧了。我自任講座教授以後，薪津以外，每年有兩萬元台幣，由我買書；所以我們原來研究室的書已放滿了，將來還須擴充。只是買新書不容易；我雖每年付一百元（美金）。請陶晉生兄代我買歷史理論及有關歷史學的新書，但仍嫌不足。這一點，仍要請你與延煊、晉生等兄幫忙，期望我們的研究室小有規模，並能繼續保持下去。

(五) 年來研究蒙古史，雖已由四大汗時期，朝着忽必烈所建元朝（陳述所說「元」即是「玄」、「大元」即是「北方帝國」的中譯，很對。）向下伸展，但進行十分緩慢。快三年了，忽必烈統治北中國時期的「南人」問題，尚未全部結束。前年的研究報告，總題目是「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就中包括了三篇，第二篇，「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南人問題」，已在文史哲學報第十七期發表。另一篇在印刷中。柯先生所見，當係文史哲學報十七期中的那一篇，當與孔學論文，不日寄上，並請轉贈送柯先生。去年（五十七年）的研究報告，總題目是「鄭思肖與所謂南人問題」，這是接受你的建議。也作了三篇，(1)「鄭思肖生平事雜考」，(2)「鐵函心史中的南人與北人問題」，(3)「鄭思肖與鐵函心史關係的推測」。有兩篇正在印刷中。此外另有一篇是我在孔孟學會的講演稿，後在孔孟學報第十六期發表。因爲有許多註解沒有來的及印入，所以不打算送給柯先生。

。這一篇我已另交他處。再印全文，等到那時候印出了，當即贈送。

(六)「國史舊聞」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即已收到，當時使我意外的感到欣快。我立刻即意識到，這本書是你寄給我的。因為除了兄之外，只有香港的一二友人，知道我研究鄭思肖的問題。但也沒有你知道的詳細呵！謹謝謝你的好意。國史舊聞的其他幾本我也想買，不知龍門書店尚有該書否？鄭思肖的研究，現在也成了一種熱門，竟有一二人也跟着研究。目下除了國史舊聞以外，又找到余嘉錫氏的「心史辨正」：（即四庫提要辨證下卷，卷二十四，集部的「心史七卷」）我的論文，雖幸所作結論尚站得住；然因執筆時，未用余氏的書，不免多有遺漏，所以仍須加以若干修正。在國內研究問題，因圖書設備不夠，常遇到上述的困難，頗感不快！」

信末又附筆云：

倬雲有才，但心眼太多，眼光與氣度不夠遠大，所以一年以來，毀譽參半，作的不够理想。現在他結婚了，你們應當向他祝賀，也希望他有所改進。他的褻謗，大概由於事業心太重，攬事過多。以他殘廢的身體，終日坐汽車到處開會，甚麼事都想管，自然作文粗心，上課馬虎，因而內外夾攻，缺點暴露。一言難盡，我所知道也不多。內部因有老人們扶愛，尚可維持一時。外邊招來徐復觀、徐高阮、羅綱們的痛罵，那就有些不合算了。

先生之言，甚為中肯。

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一日，中國歷史學會第五屆會員大會，在台中私立東海大學舉行，先生在會中宣讀論文，題目是「轉手記載不如原書的舉例」，對後學多所啓迪。當進行改選理監事時，先生仍以高票當選為理事。

案：方豪云：「去（五十八）年四月一日夜，當我們從台中開會回來，大約是一場誤會，我們三輛遊覽車，到了新竹突被某單位攔阻；我和總幹事陳捷先先生因為職責所在，是應該下車去交涉的，因為內政部核准我們開會的文件等等，都在我手頭。不料姚先生一躍而下，衝入某單位，拿出自己十全大會的出席證等證件，並嚴正的告訴某單位主管，車上還有外國會員二三十人，務請勿鬧笑話等語。後來也就平安無事的放行。」（方豪前揭文）此正代表先生當仁不讓的精神。

中國國民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三月二十九日假陽明山中山樓舉行，會期六天，先生為出席代表。會後，先生受聘為本黨中央評議委員；親友門生紛往道賀。

六月，先生為友人李安新著岳飛史蹟考撰跋文一篇，對此書深致推崇之意。先生平生不常為別人著述作序跋，此乃破例，蓋先生以李是業餘研究者，其精神心力都不可多

得。足見先生獎掖後學之熱忱。原跋如下：

民國三十五年抗戰勝利後，從吾奉命承乞國立河南大學校長，前後兩年，旅汴時期，得識本書著者李子平先生。先生名安，湯陰人，時任河南省參議會議員，對鄉邦文獻，素具熱心。避難來台，同寓台北市和平東路大安區，且常一同出席國民大會歷次會議，時相過從。每談及湯陰先賢岳飛、武穆氏的言行、史實，子平輒窮源竟委，侃侃而道，興致勃然。從吾久在大學任遼宋金元史講席，即取架上常用書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等書假之，輔助研究。子平閱後益喜，因亦隨時購置，收藏益豐。自是對岳武穆的言行、事跡，論著日多。常在國內外刊物如大陸雜誌、新天地、出版月刊、國魂等相繼發表。每一篇出，輒持以相贈，並上下其議論。五十五年五月，從吾與內子陳絢，偕同子平伉儷，共遊阿里山、高雄澄清湖、台南安平古堡；五十六年八月又同在野柳金山海濱梅影別墅渡假，多承子平照料，晨夕快談，又大半以如何尋覓岳武穆史事，研討金與南宋之際的國際情勢為主題。每見子平治學態度的誠懇，心志的專一，探討的深入，論述的勤敏，使人衷心起敬，欽佩有加。

岳武穆精忠報國，治軍治學均有專長，為我國歷史中罕見的異才。國人為之作年譜、評傳、歌劇者，為數甚夥。然就從吾與子平所知，時賢論著最佳者當推李漢魏氏的「岳武穆年譜」（民國三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鄭烈氏的「精忠柏史劇」（民國三十七年出版）、與彭國棟氏的「岳飛評傳」（民國四十三年正中書局出版）三書。但就從吾個人所瞭解，上述三氏書雖各有千秋，實均不如子平所著史蹟考討論的廣泛與精博。現在略舉數例，以資比較。（一）宋紹興十一年（西元一一四一年）武穆為奸人秦檜等所害，家屬流徙嶺南。當時四子岳震，五子岳霆（原名岳霽，孝宗代改。）因稚齡（時震七歲，霆三歲）仍居江州（今九江）故宅，家人得耗，乃潛引二子逃居九江對岸的黃梅縣；又易姓鄂氏，以期能保全忠良的後裔。此事，一般述武穆事者，皆不甚注意。子平依據辭源「岳」字下的偶然透露，乃在台北尋覓黃梅縣志，從事研究。黃梅縣志，南港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國防研究院、國立台灣大學等，均無其書。子平乃輾轉訪問，歷久不懈。皇天不負留心人，最後乃於師大國文系東北大學寄藏圖書中得之。乃據以寫成專文，詳述原委，然歷時已半年有餘。此事不僅為上舉三書中所不詳，也是自來研究武穆事跡者所未注意的，這是子平治史勤毅有恆最可稱許的一個例子。（二）岳珂所著金陀粹編三十卷，為人人所習知的書。但是「佗」字，有誤寫「陀」者（國立中央圖書館所編書目及辭源「金陀粹編」條，即係以陀代佗）。子平認為一書不應有二名。乃依據嘉興府

志卷四十二：「名宦」篇及岳珂金佗粹編自序：「先生佩佗綬於鄂」，及著作人岳珂作此書時，實居嘉興府的「金佗坊」，故以金佗名書。乃綜合多種直接史料，改定爲佗。一字千金，可以見子平治學的不苟，這是子平考史勤敏有恆的又一個例子。(三)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列傳卷一二四岳飛傳說：「嘉定四年（一二一一）追封鄂王」。今經子平詳細考定，武穆「追封鄂王」實在寧宗嘉泰四年（西元一二〇四）。年代是歷史學的眼睛，不應當錯誤，尤不應在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飛傳中錯誤。今經子平專文考定，加以改正，這是子平考史勤慎有恆的第三個例子。其他如考註宋高宗對武穆賜死的原因，萬俟卨、秦檜、張俊、韓世忠諸人對於武穆的恩恩怨怨，以及宗澤、張所、劉韜等對於武穆的種種關係等等，子平對之，均有專文，並有詳明的論斷，這裏不能一一列舉，那就要盼望讀者在研讀是書的時候，自己多去領會了。

台北有一個宋史座談會，是旅美劉子健先生數年前回國時，與台大歷史系方杰人、王德毅、從吾並聯合其他宋史專家如趙鐵寒、宋旭軒諸先生有興趣的同人組成者。李子平先生也是會員之一，經常參加討論。五十七年五月子平曾約請旭軒、鐵寒、從吾會談所撰有關武穆研究各編集的問題。後來大家建議定名為「岳飛史蹟考」，作為七十餘篇專題研究岳武穆往事及有關問題的總名。去年（一九六八）十一月初最後編排完畢，子平並約從吾小住近郊，以全文相示，先睹爲快，欣幸何似。胡適之先生曾說：「要怎樣收穫，先怎樣栽。」傅孟真先生也說：「研究歷史沒有其他捷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罷了。」這兩位哲人的話，也就是李子平出版「岳飛史蹟考」的註脚，子平常以上邊的話自勉，今爲表而出之，也可以見子平這一部史蹟考的寫成，實在不是偶然的。

民國五十九年庚戌（一九七〇） 七十六歲

三月，友人俞大維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李濟之邀，講述陳寅恪治學方法和經過，講詞發表在本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副刊上。此講稿，俞曾與先生往返討論改訂數次乃定。月之二十七日，先生與中央日報社長曹聖芬書云：「前日（三月二十二日）所談俞大維先生近作『陳寅恪先生的治學方法與經過』，刻已清鈔完畢，並由俞先生校閱。……寅恪先生逝世後，中央日報副刊、香港時報、傳記文學等，已有多篇悼念文章，惜均語焉不詳，遠不及大維先生此文之精博親切，能見其真。得此文之是正，則寅恪先生對國史的研究與貢獻，自更顯著。若能由先生即轉中副發表，相信對於青年學子治國史的啓導，當有深遠影響也。」（傳記文學叢書——談陳寅恪）。

案：曹聖芬云：「來台以後，與姚從吾先生相識近二十年，每有疑難請教益，



開導詳明，如幽得燭。上月杪，本黨二中全會舉行，從吾先生為評議委員，與之朝夕相見者四日。俞大維先生談陳寅恪先生一文，因校對及添印單行本，姚先生在會中，場中面囑數次，又來書一次，其謀人之忠，任事之謹，於此細節，可以概見。從吾先生與寅恪、大維二先生係留德同學，其所以不辭奔走之勞，既愛老友，而尤愛學。(衛也。)(同上)此正先生的讀書人本色。

是月杪，先生參加本黨二中全會，甚受感動，會後對友人說：「總統訓詞所講的『開拓破敵之勢，立不敗之地，策無缺之謀，操必勝之權。』應該特別研究發揮。」

四月十二日，應台南成功大學之邀，前往講學三日，日三小時。至十四日始北返。歸來未暇休息，次日早餐後，仍如往常一樣到台大研究室工作，並無異狀。十一時許，門人陳捷先進研究室，向先生請示第三屆東亞阿爾泰會議紀錄問題，十二時，陳甫去，先生突然心臟病發，倒在坐椅上昏迷不省人事。十二時二十五分，經學生入室發現，疾速送往台大附設醫院急救，終因心力衰竭，與世長辭。一位終生致力於史學研究的人，死在自己最喜愛的研究所裏，先生可謂死得其所了。十六日下午，成立治喪委員會，公推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谷正綱為主任委員，台大校長錢思亮與前河南省政府主席劉茂恩為副主任委員。二十五日，假台北市民權東路市立殯儀館舉行公祭，往弔祭者除嚴副總統及全體治喪委員外，尚有黨政軍首長及各學術團體故舊門生一千餘人。總統特賜輓額「續學揚芬」四字。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陶希聖、陳雪屏，常務委員郭驥、郭澄為先生靈柩覆蓋中國國民黨黨旗。六月二日，安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友人陶希聖為撰墓誌銘。

先生卒後，治喪會以先生畢生從事教育、學術及青年黨務工作，均有特殊勞績與貢獻，特輯印哀思錄并臚陳生平事蹟，恭請總統明令褒揚，以彰忠勤，而示激勸。九月三日，褒揚令下，原文說：「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中央研究院院士姚從吾，性行誠篤，文史淹通，執教北京大學、西南聯大、台灣大學三十餘載，其間並出任河南大學校長，近年由國家科學會聘為研究教授，誨人不倦，足式士林，著作專精，貢獻宏遠。復倡研邊疆語文，開治學之新城，見愛國之深衷。綜其生平，洵為儒林彥宿，史學名家，國步多艱，時聞議論，詎意遽逝，悼惜殊深。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耆賢之至意。此令。」

綜先生一生，忠黨愛國，熱誠過人，對青年子弟，尤諄諄善誘。先生教學認真，尤注意於使學生深植根柢，不發空言，常以身教，起頑立懦。先生治學，素稱勤奮，嘗言「不怕慢，就怕停」，實先生一生盡瘁學術之精神所在。而治學態度，尤稱謹嚴，雖一字之微，必求出處，一事之敘，必明原委，每開卷有得，輒廢寢忘食。雖年逾七十，猶

黎明即起，深夜始息，每日到研究室看書，著述，習以爲常。今之士林，無有出先生右者。而又生活樸實，習勞耐苦，嘗說：「國家多難，吃苦守正原是讀書人的本色。」先生實身體而力行之。德毅侍先生十五年，所受益於先生與所以欽敬先生者，尤在文章學問之外。先生嘗勉德毅說：「你是吃過苦的，當益奮勵。」今先生雖云已亡，而言猶在耳，敢不勉力以求進取，以慰先生在天之靈。至先生著述，德毅另編有「姚從吾先生著述目錄」，載在書目季刊四卷四期及姚師從吾先生紀念論文集。親友門生著手爲先生編印全集，由正中書局陸續出版。友人陶希聖爲撰墓誌銘，盛讚先生「在台大主講史學方法及元史，並創辦研究室，網羅圖書、資料，擴大研究範圍，致力於譯註蒙古秘史及匈奴史，進而尋繹北亞及中亞沙漠草原地帶諸民族歷史文化盛衰興亡所加於亞洲及世界史的影響，尤注重此廣闊區域諸民族在中國儒家大同思想之下政治共存與文化交融之偉大業績。先生抱一大志願，願以此觀點搜集資料，整理文獻，重修一部眼光遠大胸襟遼闊的國史。」甚惋惜先生大志願未得全酬，竟中道謝世而去。銘云：「襟懷淵渟，德教巍峨，遠宗斑馬，近紹屠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朝溘逝，多士依依。勇士之志，裹革沙場，守死善道，哲人之常。葱葱鬱鬱，是惟汝屋，歸葬中原，惟待光復。」

原配趙夫人，早離異，生二子：長瀛航，次瀛艦，均陷大陸。繼配陳夫人，原任台灣省立台北商業職業學校英文教員，民國五十四年退休家居。子大湘生於湖南，民國四十八年台大地質系畢業，現任職國家科學會。女大良，生於雲南宜良縣，台灣省立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美國俄亥俄州西方儲備大學圖書館學碩士，現服務賓州圖書館。

民國六十年辛亥（一九七一） 卒後一年

門人札奇斯欽、李守孔等和友好谷正綱、錢穆五十餘人於先生忌日趨車往陽明山先生墓前弔祭，憑弔良久始返。該日並以治喪會所編印之哀思錄及門生札奇斯欽、李守孔、杜維運、閻沁恆、王民信、陳捷先、陶晉生、王德毅、蕭啓慶等九人集資所編印之紀念論文集分贈與會者。

先生全集第一冊歷史方法論出版，該冊僅一百多頁，門生多感意外。案計先生自民國廿三年從德國返國後即在北大講授歷史研究法，並排印有歷史研究法導論一書，十六開本，二百九十八頁，此後在西南聯大、河南大學及台大亦主講此課，曾油印部分講義分發諸生研習，前後刊布文字亦在十數萬字以上，雖有若干過時之作，然亦應彙而刊之，以存其業績。要之，先生介紹德國史學方法給國人，其功自不可沒。而今所印之書，恐不及其三分之一，殊爲遺憾！

十月二十七日先生七十七歲冥誕，台大歷史系特敦請門人蕭啓慶作紀念講演，講題是「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以宏揚先生倡導研究邊疆史的心志。會後共

議爲先生募集紀念獎學金，以募集六萬元爲基金，存入銀行生息，即以每年所得利息，獎助研究邊疆史的青年學生。

民國六十二年癸丑（一九七三） 卒後三年

四月十五日，先生逝世三週年，台大歷史系恭請先生北大老同學陶希聖講演，講「古代的史官與史學」。前言云：「希聖今天爲紀念姚從吾先生逝世三週年，應該說幾句話。大凡一個學校的一個學科出身的學生，常常可分兩類：一類是天資高的，一類是功力深的。例如孔子門下，八派之中，孟子是天資高的，荀子是功力深的。孟子開了後世性命之學的門徑，荀子開了後世經世之學的道路。荀子的學術，及身就有影響，及於當代，孟子學說的影響，却發生在一千年之後。從吾先生是我們同學之中功力深的學者，他畢生教學，他坐逝於他自己創立的研究室裏。他對於中國史學界，及身就發生大影響。今天是從吾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日，他及門的學生心喪是期滿了，他的同門與同輩的師友也不復在他的忌日紀念他了。但是從吾先生治學的精神永遠在大家的中間，治學的方法及成就永垂於中國歷史學界。」誠如斯云。先生的治學精神、方法與成就，將永遠垂範於後世了。

會後討論關於紀念獎學金事，雖然同學們紛紛繳款，以距離預期數尚遠，且章程未立，職責不明，無法繼續集募，乃決議分別退還給原捐獻人。又決議遺集繼續整理出版，用遺著整理委員會名義。現遼史及金史講義已出版，均由門人陶晉生整理彙編。又元史講義由門人蕭起慶和洪金富二人整理，近日即將出版。

## 附 錄

### 姚從吾先生著述目錄並序

受業王德毅恭編

晚間翻閱論語，讀至述而篇，有：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

借用這段話來說明姚先生的爲學與做人，實在是相當切合的。先生熱愛我國的歷史文化，用數十年如一的好古敏求之精神，去探討歷史文化中的精義真理，「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和「從歷史上看東亞儒家大同文化的立國精神」二文，便是探討所得的收穫。先生特別強調「一部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儒家大同文化的發展史。」他相信以我中華民族特有之擇善而從的美德，和見賢思齊的雅量，歷經憂患，而常能屢仆屢起，且經一次考驗，必增一次信心，而涵容之，因創之，每又有優於前人的成就，是以文化益見卓越，歷史更形發皇，我民族之堅忍性與創造力乃亘古而彌新。時至今日，雖艱危困厄，然未來的前途仍是光明的。先生曾自道其述史的目的，是想說明我國歷史悠久與沒有間斷的真實原因所在。德毅侍先生十五年（自民國四十四年九月至五十九年四月），每當或在上課或在閒談中聽到先生說：「我們的歷史，五千多年，是大家畢生探討不盡的寶藏，……」便不禁爲先生的真情所融化。在這個寶藏裡，誰肯鍥而不捨的鑽研，誰的收穫就最大。先生窮其畢生之力，研究「我們的歷史」，著述之多，貢獻之鉅，爲近三四十年所僅見，已久爲學術界所公認的了。

先生早年自北大卒業後，曾追隨泗陽張相文先生辦地學雜誌，任編輯工作（自民國九年四月至十一年六月），喜談輿地之學，兩年間發表論文達十五篇之多（包括譯述在內）：其中歷代地理志評議和述大輿劉獻廷先生之地理學說，都是很堅實的巨著。當其時，先生曾有志「年遊一省，以廣見聞。」與其師書云：「鰲雖生崑崙間，若試言所志，寧爲顧寧人、劉獻廷，不願師程門立雪人，一切胥託諸空談，除獨善其身外，對自然對人生毫無辦法也。」（地學雜誌第十四卷一、二期合刊）顯然是有志爲實學的。此爲先生治學的第一期。民國十二年留學德國，乃專攻史學方法與蒙古史。二十三年回國，任教母校，授歷史方法論及遼金元史二課，後又講述匈奴，亦喜談鮮卑，遂廣泛爲邊疆史之研究，四十多年來，蓋未嘗一日脫離過工作崗位。此先生治學的第二期，論成就當以此期爲最大。德毅忝列門牆，屢蒙先生獎勉，今先生往矣，然恩意情誼，依然猶新，獨愧無以報先生，願假一二年工夫，爲先生編一年譜，介紹其學術貢獻，以及處世之道，立言之旨，使後生晚學知所矜式。今謹先編次先生著述目錄，公之於世，藉表哀思；然二

# 臺大歷史學報

• 88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 第一期

十多年前之學報期刊一時不易獲致，僅就各家史學論文索引及台大教職員著作目錄所載，益以毅搜訪所及者，按發表年月先後，恭列於左，幸海內外師友及博雅君子補正之，又豈僅毅一人之所感激而已！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受業王德毅恭識。

從歷史觀察地理變遷與人生之關係 地學雜誌第十一年五至六期（民國九年五月及六月廿五日）

地理與文化 地學雜誌第十一年十一期（民國九年十一月）

歷代地理志評議 地學雜誌第十二年一至三期（民國十年一至三月）

地球及生物之進化 地學雜誌第十二年一至四期（民國十年一至四月）

近代地理學之起源 （節譯自紐畢金〔Miss Marion I. Newbigin〕近代地理學之第一篇）地學雜誌第十二年第三期（民國十年三月）

地震之研究 地學雜誌第十二年四至五期及六、七期合刊（民國十年四至五月及七月）

黃河之概觀 地學雜誌第十二年第八及九、十期合刊（民國十年八至十月）

地理學之解釋 地學雜誌第十三年一期（民國十一年一月）

文明與氣候 地學雜誌第十三年一期（民國十一年一月）

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水利 地學雜誌第十三年第二期（民國十一年四月廿八日）

中國地質學會第一次常會演說彙錄 （輯譯）地學雜誌第十三年第二期（民國十一年四月廿八日）

何為地理環境，地理環境與人類生活有若何之關係 地學雜誌第十三年第三期（民國十一年六月廿八日）

美國建設政府時代地理方面的種種困難 地學雜誌第十三年第三期（民國十一年六月廿八日）

歐人經營北美建設合衆國之回顧

地學雜誌第十三年四、五期合刊（民國十一年八月廿八日）及第十四年三至六期（民國十二年三至六月）

歐人經營北美洲建設合衆國之經過 地學雜誌第十三年六、七合刊（民國十一年九月）

述大興劉獻廷先生之地理學說 地學雜誌第十三年八、九期合刊（同年十一月）

中國造紙輸入歐洲考（原名紙的西遊記） 輔仁學誌一卷一期（民國十七年十二月）

後改訂並附簡註轉載於書目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至第四期（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五十六年三月及六月）

蒙古史發凡 輔仁學誌一卷二期（民國十八年九月）

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 國學季刊二卷三期（十九年九月），四十三年改訂收入東北



史論叢上册。

匈奴史研究 民十九至廿五年，三册。

歷史研究法導論 北平排印，民國二十三年。

說阿保機時代的漢城 國學季刊五卷一期（廿四年三月），又收入東北史論叢上册。五

十一年十月增訂刊入第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論文集中。

德國佛朗克教授對中國歷史研究之貢獻 新中華四卷一期（民國廿五年元月）

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 治史雜誌第二期（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又收入東北史論叢下册。

契丹君位繼承問題的分析 台大文史哲學報二期（民國四十年二月），收入東北史論叢上册。

契丹漢化的分析 大陸雜誌四卷四期（民國四十一年二月），轉載宋史研究集第三輯。

金世宗對於中原漢化與女真舊俗的態度 文史哲學報第四期（同年十二月），收入東北史論叢下册。

女真漢化的分析 大陸雜誌六卷三期（民國四十二年二月）

成吉思汗的智囊團 中國一周一五九期（民國四十二年五月），收入東北史論叢下册。

金朝上京時期的女真文化與遼燕後的轉變 邊疆文化論集上册（民國四十二年），收入東北史論叢下册。

契丹人的「捺鉢生活」與若干特殊習俗 邊疆文化論集上册（民國四十二年）。

後改訂為「說契丹的捺鉢文化」，收入東北史論叢下册中。

阿保機與後唐使臣姚坤會見談話集錄 文史哲學報第五期（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收入東北史論叢上册中。

十三世紀蒙古人的軍事組織遊獵生活倫常觀念與宗教信仰 邊疆文化論集中册（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

遼金元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地理遼金篇（民國四十三年七月）

蒙古滅金戰爭的分析 中國戰史論集（民國四十三年八月）

說遼朝契丹人的世選制度 文中哲學報第六期（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收入東北史論叢上册中。

富弼 中國一周二六〇期（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宋余玠設防山城對蒙古入侵的打擊 大陸雜誌十卷九期（民國四十四年五月），收入東北史論叢下册及宋史研究集第一輯中

忽必烈對於漢化態度的分析 大陸雜誌十一卷一期（民國四十四年七月），收入東北史

# 臺大歷史學報

• 90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 第一期

論叢下冊中。

六盤山賀貴獻金 中國一周二八〇期（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五日）

楊繼業保衛國土 中國一周二八三期（同年九月廿六日）

唐客卿高麗高仙芝遠征怛羅與中國造紙術的西入歐洲 中韓文化論集第一冊（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收入東北史論叢上冊中

遼金元時代的長城 國立台灣大學十週年校慶專刊（民國四十五年三月）

匈奴爭奪東亞霸權的檢討 學術季刊四卷四期（民國四十五年六月）

黑韃事略中所說窩闊台汗時代胡丞相事跡考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廿八本下冊慶祝胡適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民國四十六年五月）

元邱處機年譜 中國學術史論集內（民國四十六年）。收入東北史論叢下冊中。

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 大陸雜誌十五卷六期（民國四十六年九月），收入東北史論叢代序。

宋釣漁城戰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與合川獲得保全考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廿九本下冊慶祝趙元任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轉載宋史研究集第二輯。

遼道宗宣懿皇后十香詞冤獄的文化的分析 文史哲學報第八期（民國四十七年七月）

漫談元朝祕史 大陸雜誌十七卷十二期（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

東北史論叢 上下二冊 台北正中書局排印（民國四十八年九月）

漢字蒙音蒙古祕史新譯註釋 札奇斯欽校補 文史哲學報第九期（民國四十九年元月），十期（五十年），十一期（五十一年）

說元朝祕史中的蔑兒干 大陸雜誌第廿一卷一、二期合刊（民國四十九年七月）

從阿蘭娘孃折箭訓子說到訶額倫太后的訓誡成吉思汗 大陸雜誌廿二卷第一期（民國五十年一月）

元朝祕史中所記「忽剌安·迭格列」人（紅襖軍）助金守潼關並抗禦蒙古入侵事跡考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種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民國五十年六月）

耶律楚材西遊錄足本校注 大陸雜誌特刊第二輯（民國五十一年五月）

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注 文史哲學報第十一期（民國五十一年九月）

舊元史達魯花赤初期的本義為「宣差」說 文史哲學報第十二期（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

說舊元史太祖紀與畏答兒傳中的按答 文史哲學報第十二期（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

- 說舊元史太祖紀中的「布渾察兒」和由它引起的王汗與成吉思汗的決戰 文史哲學報第十二期（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
- 由四部叢刊本元朝秘史中「抓馬」「從馬」的譯文略談對於蒙古秘史翻譯的心得和困難 文史哲學報第十二期（民國五十二年十一月）
- 從宋人所記燕雲十六州淪入契丹後的實況看遼宋關係 大陸雜誌第廿八卷十期（民國五十三年五月）
- 說蒙古秘史中的推選可汗與選立太子 文史哲學報第十三期（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
- 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對宋代史研究的貢獻 大陸雜誌第三十卷七期（民國五十四年四月）
- 元初封龍山三老之一李治與關於他的若干問題 陳百年先生執教五十周年暨八秩大壽紀念論文集（民國五十四年教師節）
- 元憲宗（蒙哥汗）的大舉征蜀與他在合州釣魚城的戰死 文史哲學報第十四期（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
- 成吉思汗信任邱處機這件事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之貢獻 文史哲學報第十五期（民國五十五年八月）
- 余玠評傳 清華學報慶祝李濟先生七十大慶論文集下冊（民國五十六年元月），轉載入宋史研究集第四輯。
- 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漠地的歧見 文史哲學報第十六期（民國五十六年十月）
- 遼金元時期通事考 文史哲學報第十六期（民國五十六年十月）
- 元世祖忽必烈汗他的家世，他的時代與他在位期間的重要措施 蒙古研究特刊（民國五十七年二月中國邊疆歷史學會出版）
- 遼朝契丹族的捺鉢文化與軍事組織、世選習慣，兩元政治及遊牧社會中的禮俗生活 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一集（民國五十七年三月）
- 程鉅夫與忽必烈平宋以後的安定南人問題 文史哲學報第十七期（民國五十七年六月）
- 鄭思肖與「鐵函心史」關係的推測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特刊慶祝蔣慰堂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
-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前後的南人問題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一期（民國五十八年三月）
- 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 史學彙刊第二期（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原載孔孟月刊六卷九期（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及孔孟學報十六期（民國五十八年九月）
- 金元之際孔元措與「衍聖公職位」在蒙古新朝的繼續

# 臺大歷史學報

• 92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 第一期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民國五十八年十月）

從歷史上看東亞儒家大同文化的立國精神 東方雜誌第三卷五期（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又載教育部文化局編印中華文化之特質內。

近代歐洲歷史方法論的起源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二期（民國五十九年四月）

元好問癸巳上耶律楚材書的歷史意義與書中五十四人行事考 文史哲學報第十九期（民國五十九年六月）

以上已發表之著作總計八十種，未發表的尚有日記，遼金元史講義，歷史方法論講義等專著，先生門弟子正爲其籌編文集，可望在一二年內出版。

案：以上是民國五十九所編，時尙未編印全集。先生全集，均爲由門弟子所組成的遺著整理委員會編輯，交正中書局排印。預計出版十冊：第一冊爲歷史方法論，第二冊爲遼朝史講義，第三冊爲金朝史講義，現在均已出版。以下各冊將陸續付排。六十三年元月德毅補識。